

第十四屆發展研究年會

發展、韌性與復甦： 後疫情與戰爭下的 臺灣與區域研究

Development,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vid and War

2022

11.18 - 20



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主辦單位： 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承辦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參與中心

協辦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育部標竿計畫「策論亞太安全治理」贊助）

目次

一、台灣發展研究學會介紹	1 -
二、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介紹	2 -
三、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參與中心介紹	3 -
四、年會主題介紹	4 -
五、主題講座	5 -
專講：全球與在地交織的臺灣研究	5 -
專講：合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談永續發展的跨領域研究典範	22 -
專講：流域，作為區域想像與研究的單位	23 -
六、議事規則	24 -
七、大會議程	25 -
八、論文摘要	31 -
第一場	31 -
第二場	46 -
第三場	79 -
第四場	97 -
圓桌論壇	127 -
第五場	135 -
第六場	159 -

一、台灣發展研究學會介紹

發展研究 (development studies)，起初以國家為主的經濟發展考量，近年來逐漸轉移到個人、社區、參與以及平等，強調發展是要符合人民需要、與環境和平共處。為實現發展的永續性，除借鑑前人的經驗更需結合現今資源網絡，我們期許能夠找到一條可以實現永續的發展道路。

發展研究是全球化浪潮中受到矚目的重要議題之一，而作為「發展研究」學者交流管道，「台灣發展研究學會」(Taiwanese Association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TADS) 於 2013 年在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成立，成為全台灣第一個發展研究的全國性學術社團，並由政治大學前副校長、國家發展研究所講座教授王振寰當選創會理事長。臺灣發展研究年會從 2009 年至今 (2021 年) 每年舉辦不間斷集合各相關領域學者，如此廣泛而多元的組成，使臺灣發展研究學會已成為具規模的新興學術社群。

在王理事長就任期間，不僅成功讓「發展研究」在 2017 年 9 月被教育部承認為「中華民國學科標準分類」的單獨細學類，更出版了台灣首本發展研究的專書—發展研究與當代臺灣社會 (Development Studies and Contemporary Taiwan Society)。自 2017 年開始，前理事長湯京平老師以及現任理事長簡旭伸老師也在這樣的成果下，持續透過年度會議，深入探討發展研究相關議題，積極建立國際網絡，開拓臺灣學界在國際發展研究中的影響力。

早於學會成立之前，2009 年第一屆發展研究年會就已經在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舉辦。歷年來分別由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以及佛光大學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籌辦歷年的發展研究年會。歷年的年會均有百餘篇學術研究發表，累積眾多國內發展研究成果，形成極具規模的新興學術群體。

因此，台灣發展研究學會與年會期盼建立跨學科、跨領域的學術交流平台，進而激發國內學界探索國際間亟需關注的發展議題，分享研究成果，並提出解決的方案。期望各界的持續熱情參與，促使發展研究社群日益壯大，也能夠在理論和實務上對社會發展有所貢獻！



二、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介紹

臺灣文化學系（含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是建立在臺灣及區域研究為核心的跨領域知識建構，培養具有跨領域視野及關心臺灣本土發展的專業系所。師資陣容包括人文地理學群、歷史文化研究學群及人文數位專業領域，以培養臺灣文史研究、文化導覽與推廣、社區規劃及地圖繪製等人才。此外，本系也是國內臺灣研究相關科系中，課程結構唯一同時獲教育部認定為具中等學程社會領域地理主修（包含高級中學地理科）及本土語言（閩南語）的師資培育科系，研究所課程除臺灣區域研究組外，更有全英文授課的亞太區域研究組，培育兼具臺灣主體與國際視野的人文社會領域人才。



三、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參與中心介紹

為實踐本校連攜帶動東部地區的责任、落實本校社會及地方參與實踐的责任、培育跨領域人才，協助推動區域性人文與環境等社會參與相關教學、研究與實務工作，特設立社會參與中心。「比鄰共好—在地韌性之永續培力行動計畫」為東華大學社會參與中心執行之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以花東縱谷為學習場域，結合鄉村學習、環境永續、產業加值等議題，以在地連結為核心，培育學生參與在地發展，學習實踐公平永續生活的方式，成為具有韌性的實踐力生活者與好鄰人。

貼近在地呼吸的地方教育-駐地教育家推動鄉村教育的創新系統變革

花蓮縣人口結構老化，單親隔代教養比例高；面臨教育資源城鄉落差與代理、代課教師比例偏高問題。計畫以地域連攜的概念，與在地中小學共同合作，接應弱勢學生學習的需求，如辦理大學生閱讀培力團隊、駐地教育家等，開創在地學生與東華大學的多元共學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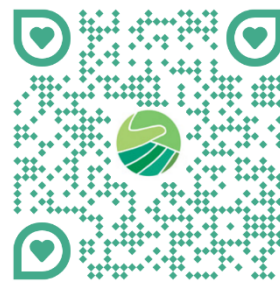
綠色療癒中看見人文關懷-發展多元諮商的生態陪伴系統

鄉村因資源相對弱勢，導致孩子成長過程中面臨更多的風險與困境，為此團隊與社區、社福團體合作，結合生態療癒、藝術治療、動物輔療以及環境食農教育，將花蓮的自然資源與鄉村生活型態轉化為綠色療癒，締造社區支持照護的網絡。

合作經濟創造共好價值-建構社區型態的微型互助經濟模式

東華、慈濟大學與黎明向陽園，以動物福利雞蛋為媒介，2019 起陪伴紅葉部落長者照護與地方產業孵化，透過深耕社區、實地關懷等學習，串聯大學專業與在地實作，推動在地社群創造微型互助經濟，實踐共享與共好的價值。

社會參與中心之願景為鼓勵學校師生組成跨領域、跨校團隊，結合地方政府或產業資源，建立社會責任實踐平台，促進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活絡區域人文發展，將計畫執行成果反饋回大學人才培力與創新教學機制。



四、年會主題介紹

2020 年後，全世界面對疾病以及戰爭的威脅，短短幾年、甚至幾個月間，許多地區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毀滅以及重構。在面臨這些挑戰時，人類社會如何在各層面抵禦、吸納、以及承受各類災難的影響，發展所謂的「韌性」(例如，韌性研究中最經典的韌性城市議題)，並進一步從中尋找生路以求從災難中復甦，恢復各地方原本的日常生活以及關係，成為近年來人類社會面臨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議題。

故，本屆年會主軸將環繞在此三個重要的關鍵字：發展 (Development)、韌性 (Resilience) 以及復甦 (Recovery)，探討在 COVID-19 看似即將終止的時代，以及近期全球地緣政治衝突競合此一時空背景下，臺灣的經濟與在地知識與區域研究迸發出甚麼新的火花？臺灣社會又如何在眾多的挑戰中，從中找到新的道路持續行進？並且深入探討在新的區域以及全球時空背景下，臺灣與不同尺度的區域之間的關係又有甚麼新的變化與可能。

本屆年會誠摯邀請不同學門領域學者及博碩士生共同參與研討。



五、主題講座

專講：全球與在地交織的臺灣研究



第十四屆發展研究年會
2022
11/19(六)
09:15-10:45

主題講座
全球與在地交織的
臺灣研究

國立東華大學
人社三館
元瑾講堂

主講人：陳東升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系)

主持人：湯京平 教授

主持人：湯京平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暨國際合作長)

主講人：陳東升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陳東升教授研究領域跟隨著台灣社會變遷而形成，涵蓋組織社會學、經濟社會學、都市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曾出版「金權城市」與「積體網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社會學分析」等兩本社會學的重要著作。近年更著重於社會創新、社會企業、社會設計、跨科際 (trans-disciplinary) 教育，藉由跨學科的交流與對話，共同思考來解決社會問題。強調社會學不是只有在實踐、在互動的層次操作，同時要能面對結構的改變。

全球與在地交織的台灣研究

陳東升¹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¹ 本文為 14 屆發展研究年會專題演講稿，舉辦地點：花蓮，東華大學。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或流傳。

一、台灣研究對於台灣的意義

1.1 研究者的學術生命史與社會史的連結來闡釋台灣研究的意義

解嚴前台灣歷史與生活經驗是被禁止的，因此在這樣的政治與文化條件下，台灣研究是被很隱諱的定位或是呈現。台灣第一位社會學家陳紹馨在他的論文(1979)，「台灣是中國實驗室」就是必須要隱藏在中國國族主義下來闡釋台灣研究的意義。一方面，台灣是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外國學者無法進入中國進行研究的代用品，而且因為台灣保存文化大量破壞的元素，研究台灣就是研究中國核心的文化資產。另外一方面，台灣過去數百年因為南島文化連結、移民的跨群體互動、殖民統治者強制輸入的經驗、全球貿易體系的交易所創出的獨特台灣主體文化是被徹底忽視的。解嚴以後，研究台灣是建立台灣主體素材的並且發展出台灣認同的一項必要工作。這是一種從權力壓力壓迫和扭曲造成文化或本土知識欠缺而必須要對台灣的研究理解。

從我個人的學術生命史來反省，威權統治的戒嚴時期是沒有研究台灣的自由，也沒有以台灣為主體性的台灣研究的選項。對於許多人來說，有限的研究台灣空間代表著一種對於壓迫的抵抗，無奈的抵抗。在來自政權統治者對於台灣生命主體經驗的貶抑，研究台灣變成是一種自我的啟蒙，打造新的能動主體性，將負面的經驗轉化為積極主動的經驗。對我個人來說，解嚴後能夠隨心所欲的研究台灣就是一種解放，具有無法取代的意義和無可衡量的價值。在鉅視層次，研究台灣就是一種政治結構的革新和政治動員，改變不平等的權力壓迫關係，以及重新詮釋和轉換過去的貶抑經驗發展出一種具有民主自由內涵的想像共同體。這是研究台灣在歷史發展過程對特定一個世代的獨特意義，顯現出台灣研究在地的重要性。在台灣民主發展逐漸展開，台灣研究也採取比較積極的策略，透過台灣研究(行動與研究結合)創造一種台灣獨特但是具有重視人類尊嚴民主生活方式的理想目標。從欠缺轉向主動開創，這也是一種台灣研究典範重要的改變。解嚴之後被壓抑的台灣研究主題蓬勃發展，其中包括族群、勞動與工會、性別和社會運動。1987年以前有關族群研究只限定在原住民，閩南、客家和外省人的關係是一個無法被討論的議題。至於挑戰威權政體的政治反抗運動和社會運動也不是一個在缺乏言論與結社自由的體制下可以進行討論的題目，長期過度的政治壓抑使得這四個議題在台灣社會學領域在解嚴後廣泛地受到重視，也成為主要的研究議題(陳東升，2010:6)。

台灣研究經常也常從全球學術典範的角度來討論台灣研究的價值，這當然是無可比避免的。全球學術角度看待台灣研究，會因為全球學術社群的特定國家所主導的研究興趣來決定台灣研究與其他特定社會研究的意義。而這些主導性的研究興趣通常和全球政治經濟結構是關聯在一起的。1980年代歐美國家決定將中國整合到全球經濟體系，搭配中國的開革開放，中國在全世界的位置受到重視，而中國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視。相對而言，台灣的政治地位岌岌可危，而台灣研究也極端的被邊緣化。1972年美國的領導者，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當時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暗示中國準備放

棄台灣，由中國單方決定台灣的命運²。後來因為水門事件尼克森下台，以及美國國會對於行政部門過度傾中，而推動台灣關係法相當程度承諾美國保障台灣安全(若林正文, 2016)。在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台灣研究很難在全球取得受到關注的位置。21世紀的情況並沒有太多改善，因此 Alsford(2022)指出 21 世紀初期關心台灣研究的外國學者認為台灣研究在中國研究的主導下居於邊緣的位置，並沒有受到歐美學術界的重視和肯認。甚至於 2009 年 Rubinstein 在歐洲台灣研究年會聳動的提出“台灣研究滅亡了嗎?”³這個重要的問題。Sullivan (2011:717)則是指出台灣研究沒有邊緣化但是分裂化，不過作者提到不要因為中國研究在全球學術社群蓬勃發展就嘆息，而是在這樣的結構限制下是可以讓台灣研究國際能見度更高。

當然也不同的論點來倡議提升台灣研究在全球的地位，而主要的考量是強勢的中國研究和全球學術社群的知識興趣。所以有些學者提到台灣研究要連結到中國研究才能受到國際的重視，而研究的主題和方法就是要成為中國研究的補充品，或是整合到中國研究，很顯然就不是以台灣當成主體來建立研究典範。例如，Schubert 在杜賓根宣言就提出中國研究補充品的觀點³，後續他(2018:198-200)提出更具體的論證，認為台灣研究具有自主性，不過和中國是交互關聯的，透過台灣對照中國的差異性和相似性，並探究這些異同發生的原因，就可以促使中國研究的學術社群更深入瞭解中國，進而彰顯台灣研究在中國研究的重要性。這樣的做法無論在實務上可以創造出更多歐美大學的教職，或是理論上可以充實中國研究的知識內涵。而 Perkuhn and Chien(2022)⁴也呼應 Schubert 的論點，建議台灣研究整合到中國研究或是更寬廣的華人世界研究的研究系譜。

無論全球學術社群是如何評價台灣研究，台灣研究對於台灣的研究者和台灣的社會就是有其無可取代的意義和價值，對於世界也是有其獨特的價值(Wang and Achen, 2022)⁵。有些重要的研究基本上無法引起外來研究者的興趣，也不是外來研究者從休戚與共的角度來推動的研究課題。接著將以台灣的直接民主倡議和研究當成一個重要案例來說明，一個國家必須要建立自己豐厚的在地社會現象研究能量和理論觀點。

² <https://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22/10/10/china-has-chilling-plans-for-governing-taiwan>

³ <https://international.thenewslens.com/article/103701> Schubert also suggested that only by “intellectually engaging a rising China” and posing Taiwan studies as a complement to China studies, arguing that the discipline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synergistic, can academics make an effective argument for Taiwan studies.

⁴ <https://taiwaninsight.org/2022/04/19/shared-but-particular-a-proposal-to-pitch-taiwan-research-in-sinology-and-beyond/>

⁵ <https://taiwaninsight.org/2022/05/03/a-dialogue-about-situating-taiwan-research-within-academia/>

1.2 台灣的獨特歷史經驗

從台灣的民主發展與成果來理解台灣與台灣研究

台灣民主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價值的選擇，是生活在這個土地上的公眾所做的選擇，是別人無法幫忙決定的。民主生活在台灣就是一種無可替代的，也只有生活在這個土地共同體才能夠進行的選擇。同樣的道理，台灣研究或是研究台灣並不是完全從國際學術社群的學術標準或視角來評估或決定其重要性，而是對於生活在這塊土地民眾的意義。自由的選擇和自我群體的認同，建立台灣在全球的自我定位和主體性，任何一個國家是一個開放系統，必然會和外部連結，但不能在這樣的動態系統中，缺少對於自己的定位，了解我或我們是誰；我們共同生活的利歷史經驗有甚麼樣的意義，在這樣歷史經驗和社會條件，我們如何去創造更有尊嚴和人本價值的生活方式。當然主體性的出現如果過度凸顯，是會有排他性的，但透過民主自由的方式所形成的主體性，是一種具有共和內涵的主體意識，相對的排除其他群體的可能性是比威權政體低的。

台灣民主發展是在 1987 年，而不是 18 或是 19 世紀，發展的時間晚不代表就是民主落後，而是特定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所部分造成的，因此理解台灣的案例可以挖掘出更異質多樣的全球民主發展的模式，而不是只有以歐美經驗為主導的單一普遍的軌跡。台灣就如同其他 20 世紀其他民主發展國家，必須要面對自己社會的特殊歷史和社會情境，艱辛的去推動民主體制。不同歷史時期的民主發展經驗是重要且具有參考價值的，尤其是有類似社會、文化或是經濟結構的社會卻是選擇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時，兩種社會的比較政治研究就更顯得重要。當然非歐美國家的民主化，政治體制的參照基點因為有台灣或是其他 20 世紀民主發展國家的經驗，就不必依循著歐美的民主形態和路徑，將比較參考的軸線移往非全球主導性國家。雖然這樣的調整對於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來說是相當困難的，但是有不同參考案例的選項是非常緊要的。

更重要的是這一軌的台灣民主研究也清楚地在規範層次提出一種理想的民主模式，希望創造符合自由與尊嚴的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方式不但保障台灣人民的基本權力，也讓台灣的民主經驗可以變成守護台灣國家安全的憑藉；並在受到極權專制國家武力威脅下，毫不畏懼地繼續深化民主體制，對全球展現出普世的民主價值和生活方式。全球民主國家選擇支持與協助台灣展現的是在民主制度與極權制度對抗下的一種價值立場。台灣是站在民主陣營的最前線，受到極權體制無法理基礎的持續威脅，台灣民主體制被毀滅就是全球民主制度瓦解的前兆。

美國眾議院議長 Ms. Pelosi⁶在 2022 年 8 月 2 日說明訪問台灣的理由，可以來印證上面的論點：

We cannot stand by as the CCP proceeds to threaten Taiwan — and democracy itself.

Indeed, we take this trip at a time when the world faces a choice between autocracy and democracy. As Russia wages its premeditated, illegal war against Ukraine, killing thousands of innocents — even children — it is essential that America and our allies make clear that we never give in to autocrats.

By traveling to Taiwan, we honor our commitment to democracy: reaffirming that the freedoms of Taiwan — and all democracies — must be respected.

接著，美國學者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22)發文指出台灣民主發展與理論的重要性在於擺脫文化決定論的限制，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不適合發展民主顯然是錯誤的假設。台灣一方面有深刻的儒家文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卻又是蘊藏著許多由下往上的民主運動，透過學生和意見領袖組織的社會運動、學術社群所倡議並推動的審議民主公共討論、公民團體運用網路科技積極開創的數位民主平台、以及政府部門透過參與視預算、公共論壇或是黑克松等開放創新的公民參與政策等，這些不同的行動者持續深化台灣的民主制度。如果台灣在既有文化體系的限制下，能夠成功地進行威權轉型的動作，這也對世界其他國家無論在甚麼價值體系或是社會結構下都有可能成為民主國家。特別是目前全球政經局勢劇烈的轉變，面對民主體制和威權體制路線的選擇，就可以理解台灣民主成就來說明台灣為什麼對於全球是重要的，這是台灣過去爭取民主制度實現是為了保障台灣民眾自由權利無法預測到的一個視角。台灣研究具備甚麼樣的意義，是可以從外部政經結構的轉變來進行審視，並且賦予台灣民主研究對台灣與對全世界新的定位和新的意義。

民主自由的獨特生活方式，是要放置在華人社會，以及獨裁政權的中國武力壓迫下來理解的。一個四百年來是專制統治的台灣社會，能夠透過普選且沒有發生軍事政變政權和平移轉，就是一個稀少且獨特案例。台灣的代議民主與選舉研究，可以理解台灣民主發展的軌跡。

此外，台灣民主研究的另外一個審議與直接民主的軌道，不但在方法上採取行動與研究結合，進入倡議與實踐後，累積研究的素材，再深化研究的內涵和理論發展。這樣的研究取徑透過對台灣的民主實作來深化與鞏固台灣的民主制度，這是只有根植於台灣的研究者具備台灣社會的使命且深度了解台灣社會行動的策略才可能推展。

⁶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2/08/02/nancy-pelosi-taiwan-visit-op-ed/>

2001 年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組成的研究團隊透過二代健保的改革計畫，引進審議民主的理論和各種操作模式，藉由實驗性的演練考量台灣社會文化的特殊條件修正這些模式的流程，並且與公民團體(例如，社區大學、社會福利團體、環境保護團體等)和政府部門(青輔會、研考會、教育部、文化部等)單位合作，全面性的推動審議民主的公共參與(Chen, 2021)。從 2002 開始到 2008 年政權第二次輪替，公民會議在每一年頻繁舉辦。2004 年台大社會學系團隊辦理 7 次公民會議，討論的主題包括地方溫泉博物館的定位、環境保護、所得稅改革、都市更新、代理懷孕、纜車的環境影響等。2005 年則舉辦 12 次公民共識會議，主辦單位除了大學外，也加入非政府組織，討論的議題涵蓋面更為廣泛，勞動權益、全民健保、動物權保障、基因篩檢等。2006 年又舉辦六次的公民共識會議，仍然是由大學或非政府組織來推動，水資源、農業政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與社區營造等是歷次討論的議題(林國明，2009)。無論是在公民共識會議討論的次數和討論主題的多樣性，台灣在審議民主推動的進展相較於南韓和日本是顯得更為持續和充滿活力(Kobayashi 2007:141-155)。但是更重要的是參與者進行公民審議的討論後，在公共事務參與的意願、政治效能感、政策的素養都有所提升，且都表達未來繼續參與的意願(林國明、陳東升，2003)。

審議民主實作的推動所造成的影響不僅是在非政府組織的培力、審議民主理念和實作的公眾傳播、以及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意願和能力的提升，也對於台灣學術研究的發展和累積有相當顯著的貢獻。根據國家圖書館的台灣論文索引，以審議民主當成關鍵詞所有欄位的搜尋，從 2002 年到 2022 年其中期刊論文 232 筆、博士論文 64 筆、專書 16 筆、專書論文 25 筆⁷；發表在英文期刊和專書的也超過 15 篇以上，這樣的統計資料顯示審議民主在台灣的研究已經有相當紮實的基礎。社會倡議與社會實踐是可以開創出重要的研究素材，在推動民主鞏固與深化的同時，也對於學術研究新領域的拓展有很大的助益。

2009 年開始，審議民主與直接民主進入一個低潮，主要是因為執政的國民黨對於審議民主和直接民主有相當的疑慮，且在行政和立法部門都在其掌控下，也沒有必要利用公民參與的機制來進行與公民團體的政治結盟來鞏固政權的穩定性(林國明，2009)。不過審議與直接民主過去所建立的基礎並不因為被國民黨政府相當程度排除而失去下一次展開的能量，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創造了一個絕佳的政治機會，讓審議與直接民主的推動有一個良好的切入點。因為黑箱政府的爭議，展現民眾要求公民參與的訴求，所以審議民主和社會運動在台灣第一次全面性的結合，推動街頭審服貿的公民審議活動，在連續十天的舉行共有超過 400 以上的公民討論小組與 4000 人次以上的參與，並且在最後提出一個公民版的兩岸服貿條例的建議書(施聖文，2014)⁸。

⁷ 瀏覽日期 2022/11/9，https://tci.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Bwh8f/tcisearch_opt1_search#result。

⁸ 瀏覽日期 2022/11/9，<https://www.hisp.ntu.edu.tw/news/epapers/16/articles/9>

後續太陽花社會運動和審議民主實作的結合，也促成新一波審議與直接民主的推展，2014年中，青平台邀請一些學者專家討論倡議參與式預算的公民參與模式，並資助經費邀請北投社區大學進行實驗性操作，推動成果相當良好且累積台灣第一次的實作經驗。在完成實驗性操作後，學者專家和非政府組織積極遊說縣市長候選人將參與式預算納入選舉政見，其中台北市與台中市長候選人接受這樣的提議。從2016年開始，台北市透過參與式預算的舉辦提出300個提案，其中277個具體執行，而動支的經費超過七億台幣(台北市民政局，2020)。而台中市則是舉辦八場次分布在五個區級的參與式預算。2018年桃園市政府則是全面推動主題式和鄉鎮層級的參與式預算，透過每個月的顧問會議與配合研考會的人力培育和管考來進行，每年度舉辦的參與式預算超過10項(桃園市政府研考會，2022)。

在中央政府的層次，因為政黨輪替開創出審議民主推動的有利政治機會結構，文化部將社區營造3.0定位為審議社造，鼓勵社區營造申請案結合審議民主的公共討論模式或是參與式預算來推展。從2016年到2022年超過20個鄉鎮申請審議社造案，通過後加以落實。2019到2020年，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委託學術團隊，進行地方社會公眾參與科技政策的討論，來自不同縣市的35個社區的1500位以上民眾參與討論。而2020年教育部針對學習歷程檔案分別邀請台大社會系和清華大學社會所的團隊舉辦全台灣各地公民審議的討論。其中台大團隊舉辦50場由大學教授、高中教師、家長和學生參與的公共討論⁹。

將近20年倡議與推動審議民主的努力展現出一個台灣研究無可取代但又是非常獨特的模式，主要是針對台灣社會最重要的民主資產加以保存和強化，所以先行動倡議審議民主的公共討論模式，學術研究是發生在實作之後，而不是先有社會研究素材透過理論框架來解析。其次，選擇這項議題考量主要不是國際學術社群知識興趣來加以迎合，提高全球出版的機會；而是以對台灣社會的重要性來決定社會實踐和研究的優先順序。不過這個從台灣出發，並不會缺乏向世界連結的機會，台灣審議民主的外文出版數量也逐漸增加當中，累積的經驗資料和研究成果將可能變成跨國比較(直接)民主研究的重要案例。

二、台灣研究對於區域、全球的意義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定位台灣研究，日治時期的歷史人類學者伊能嘉矩是最主要學者。以最近增訂出版有關伊能嘉矩的自傳研究來討論，伊能嘉矩從日本人類學之父坪井正五郎學習到英國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特別是Tylor的進化主義人類學和科學研究方法(陳偉智，2022:271-272)。伊能有很強烈的意圖透過日本人自己的研究來逐漸發展日本的人類學知識，因此非常強調科學方法的應用，這樣生產的知識才能和歐美國家並駕齊驅，但理論上採取和英國人類學類似的科學普遍主義的人類進化一元論。對於台灣漢人與原住民研究，放在進化人類學的知識框架下，就會從世界史和各

⁹ 瀏覽日期 2022/11/9，<https://www.108epo.com/>

界各國文明進化的階序來看到漢人和原住民的位置，相較於日本和歐美各國，台灣漢人和原住民分別處於前現代和野蠻的文化狀態，因此位階比較低。但是這兩個族群是在進化當中，主要是因為台灣透過海洋的連結和其他各國產生交流，影響其文化的進程。另外一方面，島嶼內部不同族群因為資源競爭和生活方式的交互影響也造成這些群體風俗的轉變。但台灣漢人和原住民在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與教化下是可以朝向文明之路發展的，這也合理化日本統治台灣的正當性。這也是黑格爾歷史哲學時代精神論述的一種展現，以國家和種族為單位終究會朝向文明最高狀態的結局(陳偉智，2022:285)。

伊能嘉矩對於台灣第一位社會學家陳紹馨有相當程度學術上的影響，他在討論台灣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研究時，也曾引用伊能的研究論文(陳紹馨，1979:534)。陳紹馨就讀東北大學時期精研黑格爾的哲學思想，對於他的歷史哲學¹⁰論述有相當程度的了解(黃柏誠，2018:234-239)。陳紹馨對於台灣社會從過去到現在的變遷採取一種演進的觀點應該也是在當時理論知識環境下所形成的。

陳紹馨先生是 20 世紀中期對於台灣研究應該如何定位提出重要論點的代表人物，他以中國與台灣的對比來討論，台灣是歐美學者因為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無法進入中國進行研究的代用品，或是台灣是與中國社會文化有關連性，但是因為與中國隔離相當長的時間，受到原住民、荷蘭、西班牙、日本的文化影響後成為華人社會自主現代化的實驗室(陳紹馨，1979:6)。透過現代化階段的論述來顯現 20 世紀中期中國尚未現代化，而台灣已經進入現代化，台灣和中國具有明顯的差異，因此台灣不可能是代用品，而是要了解中國未能現代化的原因、如何進行現代化、以及現代化後可能有什麼樣的社會影響，一個參照分析的重要對象。而研究台灣對於中國現代化有所啟發，且更進一步得以精煉普遍的社會科學現代化理論。

根據陳紹馨實驗室的論點，徐正光(1991)指出台灣就是一個自足且重要的研究對象，可以彰顯台灣文化的主體性，發展本土學術研究典範。不過徐正光和陳紹馨台灣研究的立場，還是將研究對象實體化，並且透過進化階段的比較分析，而不是從台灣、中國、東南亞、歐美等交織連結、相互影響的關係性視角來探究台灣(湯志傑，2016:97)。

1945 年二戰結束後，日本學者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進行思想上的反省，建立在日本發動戰爭侵略中國的罪惡感，以及避免奠基在社會演化論的國家文明位置上下區隔的評價而發展出來以日本當成亞洲救世主或是領導者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極端政治主張，因此對於文化進化論有相當深刻的批判，這是一個日本中國學學術社群相當重要的理論轉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竹內好、溝口雄三和子安宣邦，雖然他們並不一定是日本中國研究的主流。這三位中國或是亞洲研究的日本學者，對於中國(或台灣)的理解不是從歐美國家的知識或是文明標準出發，而是從這個研究對象的歷史變遷經驗來探究中國或是台灣可能會是甚麼，而不是將中國或台灣就是歸類為

¹⁰ “現代化以前的情形已經消失。這是歷史哲學家黑格爾所指明的事理。” 陳紹馨，1979:6。

落後且不文明。台灣或是中國的發展在其獨特的歷史條件下，並在與歐美各國的交織互動，有可能採取不同於文化進化論的路徑。

竹內好(2007)指出中國和日本在二十世紀初社會變遷的差異在於日本放棄自己的歷史文化特色，採取脫亞入歐的作法，造成後續的軍國主義。而中國則是依照自己文化特色，透過內部的革命來進行改變，雖然速度比較緩慢，但是有其堅持，沒有在現代化過程失去自己的文化根基而全面西化，進而成為侵略者。溝口雄三(1999)則是主張中國當成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透過一個社會和其他世界不同社會的物質、文化和政治的交織，可以理解整個世界體系的運作，這樣的理解不是普遍主義或是進化論的，而是充分的認識到世界當成一個整體的變動是受到整個世界組成的社會或國家相互作用的影響，而不是依循著一個固定的軌跡在推進的。這樣的探究世界的方法追求的不是同一性，而是異質性或是差異性，以及差異成員彼此間的作用都被涵蓋與理解，不是只有資源或是政治地位優勢的主導國家採取的策略才是重要的。子安宣邦(2008:158)則是批判二戰期間軍事政府所建構實體化且高度政治化的東亞，主張使用東亞細亞的概念，而且是一種關係性的概念，是在社會行動者或是物質可以在不同面向進行交流，而持續發展的廣域關係。這要將國家、構成一個國家種族在跨邊界交流相對化，多邊交互成為構成作用的主體，但是沒有主導者，而使得東亞細亞是一個開放且流動(液態)的概念。

這個批判的日本中國學研究社群，強調地域間連結的重要性，並主張透過關係性分析進行研究。無論是對文明進化論或是世界體系理論都有所質疑，主要的理由這兩個流派的理論都將構成世界的國家實體化，並且指出的運作機制同一且普遍化。如果世界體系理論受到批判，那麼一種具有批判與建設性的從屬者理論要如何建立呢？

這個批判的日本中國學研究社群過度美化中國或是對於中國的理解，在 20 世紀的中國是被列強所侵略的，但是忽略中國有更為長遠的歷史是建立在大中國主義而侵略兼併其他周邊國家。其次，在沒有系統的分析構成東亞或是世界各個不同成員的權力關係或是壓迫支配的現況，就將國家和種族相對化可能造成的結果，因為缺乏對於既有不平等政治權力關係的批判和具體的改變，而可能強化已經存在的的不平等。

20 世紀日本的中國研究社群提出的反省有一個重點就是中國或是台灣研究和世界的交錯關係，可以重新理解非歐美中心的世界史。而台灣的學術社群，也有主張從世界史(全球)的角度來理解台灣，以及分析台灣和世界的交纏關係。例如，台灣史學者曹永和(1965；1972；2000)就具有前瞻性的提出立足世界的台灣島史研究框架，而其中台灣(島嶼)透過海洋對外的連結促成對於台灣各項變化的影響，以及台灣對於海域串連的社群和地區的作用是較少被討論的，而這是理解台灣相當重要的一個面向。Shi(2018:211)提到透過歷史和地理學研究的影響，她提出方法論上關係性比較的概念，強調不是將一個社會或地方當成孤立的個案，而是和其他單位在時間和空間上關聯的場域，比較進行兩組關聯性場域的探究。她引用地理學家 Hart 的論點指出”台灣不是一個個案，也不是一個普遍作用過程的變異體。台灣是一個在全球歷史地理交互連

連結情境下，對於串聯但具有獨特差異性的節點，她也是一個製造全球化過程的場域，而不只是全球化的接受者。”，既然台灣是作用者也是接受者，就顯示台灣是一個變動的存在實體，對外的連結持續對於台灣產生作用，而也因為台灣發生的事情對全球產生影響，交互串聯造成的相互影響。兩種論點都是站在世界的角度來理解台灣，台灣多面向連結的觀點就不會只聚焦在權力核心國家的影響，忽略其他連結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本文也是採取類似曾永和或史書美的觀點，世界史和全球地理學的角度來說明台灣(研究)和全球的關聯性而核心的概念是海洋島嶼。以下將論證海洋島嶼的意涵。

第一、海洋島嶼就是台灣最為地理環境最寫實的關係性描述，卻也是兩種不同物質性混搭在一起的組合，可以用來說明台灣與其他地方的連結。島嶼暫時是固定的，具有固態的特性；而海洋覆蓋在整個地球，海洋是液態的，不斷地的流動，既分割不同的島嶼和陸地空間，但同時又串連著不同的地域。多數運用海洋的行動者不會是一直處於漂流的狀態，停泊的終點就是港口，且經常是擁有港口的島嶼，所以海洋透過載體(船隻)的中介可以連結島嶼和其他的地域，海洋和島嶼的連結具有高度的漂移(游牧)性或開放性。海洋是持續運動且液態的，流動是海洋運作的基本動作，固定的運動也會侵蝕島嶼固態的邊界，這是一種物質性造成另外一種物質性的改變。更進一步來說，海洋流動帶來資源，促進貨品、人物和知識的交流，也將改變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和認同的邊界，因此海洋島嶼比起大陸區塊更可能會是持續進行地域化、去地域化與再地域化的動作。

雖然海洋是不斷地在流動的，並促進連結，但是這樣的交流不必然是對等的，可能是宰制的。史書美(2016:62-64)就提到台灣的理論是移植引入的，但是因為全球冷戰結構下，台灣依附在美國主導的陣營，知識的引介多數透過美國的仲介，因此從歐陸發展出來的批判性理論進入美國已經去政治化，再引入台灣則是更欠缺對於既有權力關係的挑戰，這是一種海洋中島嶼對外連結但受到支配的案例。這也顯示對於一個海洋島嶼的探究必須要將外來的影響納入，探討東南亞島域的歷史變遷就必須要將西亞、印度、中國和近代歐美帝國主義的作用當成關鍵性的影響因素(陳國棟，2021:16)。而對於台灣當成一個海洋島嶼，這樣的關係連結的世界史分析架構也是適用的。

第二、海洋島嶼同時也可能因為海洋自然作用(暴風雨)和人為的干預(海禁)限制島嶼向外連結的可能性，長時間讓島嶼處於孤立的狀態。由於島嶼腹地狹小，相較於大陸地塊無法形成多數量的不同社會或國家，如果經歷長時期的孤立就可能發展出島嶼特有的文化或生態體系。

第三、海洋島嶼的一個重要的關係者是大陸地塊的國家組織，海洋島嶼相對於帝國是處於邊緣的位置，且因為有海域和大陸隔絕，會被視為是治權外而危險的地方，常常會對於大陸帝國造成威脅，或是因為帝國要建立朝貢體制(湯志傑，2016:113；廖

咸浩，2016:307；曹永和，2000:12-13)，因此大陸帝國對於海洋是採取禁止以達到孤立島嶼的目的地。來自大陸帝國對於海洋串流的禁止是為了保衛政權，但是壓制不會是完備的，就會出現一個破口或是孔洞空間。新型態的行動者(海盜)與新型態的組織(海上貿易網絡)在陸權壓迫下，反而透過海洋島嶼的連結而建立起來。其中以鄭芝龍和顏思齊為首建立的顏鄭海盜(商)集團，到明朝末期控制日本到東南亞的海上貿易(鄭維中，2021；曹永和，2000:26;46;125；廖咸浩，2016:294-295)，並且對於明朝帝國產生相當大的威脅。明朝的海禁使得部分漢人逃離中原到東南亞，他們在寓居地和海盜(商)集團連結形成通商據點建立東南亞海上跨域貿易網絡，提供海上帝國重要的經濟基礎。

清朝政府為了切斷鄭成功來自於福建內的資源補給，將沿海 30-50 公里的居民遷往內陸，並且所有漁業捕撈和海洋貿易都全面禁止。清朝政府為了切斷鄭成功來自於福建內的資源補給，將沿海 30-50 公里的居民遷往內陸，並且所有漁業捕撈和海洋貿易都全面禁止(蔡石山，2011:68-69)。但是鄭成功如同鄭芝龍再一次以台灣為基地建立海上王國，不但驅逐荷蘭人(曹永和，2000:26)，也持續對於清朝政府產生武力上的巨大威脅。反抗清朝的漢人逃脫到東南亞各地，後續也成為鄭成功的海上貿易據點(蔡石山，2011:70-71)。逃離中原而寓居東南亞的漢人，雖然逃離但是開創了新的生活機會、政治體制和經濟活動的可能性。海洋島嶼是具有一種中間位置的特性(廖咸浩，2016:305)，他是逃離者的寓居地，他也可以是串聯水域間寓居地而建立跨域網絡發展出新樣態的節點(廖咸浩，2016:298)。

第四、海洋島嶼和大陸型帝國進行比較必然是邊緣，且土地面積的完整性低無法生產大量的食物供給數量龐大的人口，以及比例高的專業技能工作者，因此社會功能分化程度和政治組織層級化的程度比較低。再加上水域的隔離，要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統一管理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島嶼國家歷史資料的檔案紀錄是不完整。這也顯現出海洋的島嶼社會政治權力的集中度比較低，是一個相對去中心化的社會(鄭維中，2021:22)。對於海洋島嶼的統治，國家權力穿透到地方的程度相對是比較低的，因此地方的仕紳或是意見領袖有一些對國家權力緩衝的空間，協商治理規則或是創造出新的運作模式。柯志明(2021)清代有關熟番與奸民的巨作有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台灣漢族強人在面對清朝帝國統治，可以創造出蕃外墾地就是一個代表性案例。換句話說，海洋的島嶼去中心化的權力結構是具有鼓勵創新的可能，如果搭配來自外部的文化和知識串流，則創新更有可能發生。這也呼應湯志傑(2016:99)的論點，他指出”我認為，位處邊陲的台灣(島嶼)因為是不同文明遭逢與諸帝國勢力重疊較勁之處，故能成為創新的前沿”。

缺乏性統性文字歷史的社會就如同 James Scott(2010)所提出的看法，極端的國族主義和對外侵略的帝國比較不容易產生，畢竟沒有一種具有本真性的國族起源的史料基礎，要排除任何的部落或是群體都是困難的，要建立一種高度認同的國族主義門檻會比較高。且歷史的傳述和紀錄具有高度的彈性，可以調整集體記憶和經驗，彈性

的整合或是被整合到所接觸的群體，社群邊界相對來說比較開放，是一種液態的社會邊界。

海洋將不同的陸地透過載具相互連結創造出去中心化的樣態，不同的位置彼此相互參照，也是彼此歷史和變動的一部分，因此使用一套以特定中心社會所建立的普遍標準要來衡量所有的社會就變成不必要。任何一個社會都可以當成出發點來理解整個世界各個成員的關係，但是這個出發點也意味著必須要環顧周遭的其他成員，而不是從上往下的觀看。這符合所謂的亞洲當成一種方法或是台灣當成一種方法的論點，但是海洋島嶼的認識框架則是更為流動彈性。

第五、海洋往外拓展是無固定方向，或是多方向的，而且可以環狀連結不同島嶼，或是島嶼與島嶼可以直接連結，串流的網絡是充滿著各式各樣的可能性。海洋的島嶼網絡是可能沒有佔據中央位置控制通路和資訊的節點，而是所有的點可以在沒有太多阻礙可以直接連結，是一個德勒斯所說的平滑空間。

第六、海洋島嶼的概念所指涉的不會都是正面的特質，海洋也存著在波濤洶湧的挑戰，海洋是變化無窮不可預測的，海洋有著深邃黑暗且吞噬著挑戰者的能力。這也就是說特定的社會要往外連結，很有可能是透過武力介入，造成慘烈的衝突和對抗，建立的關係不是合作而是鎮壓。海洋所連結的不同社會成員，很可能具有高度異質性，無法發展出合作關係。

我再一次引用湯志傑的假設，”位處邊陲的台灣(島嶼)因為是不同文明遭逢與諸帝國勢力重疊較勁之處，故能成為創新的前沿”，對於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歷程研究結，這個假設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必須要搭配其他海洋島嶼的其他特質進行討論。我不應用全球化的概念，而是立基於台灣做為海洋島嶼在物質上和文化上所綻開的海洋串流與開放的特質，來探討台灣半導體產業建立和進展。

海洋島嶼所展現的串流與交織性發展出來的必定是行動者關係性的分析方法，而不是將任何一個行動主體以類屬且實體化的方式來理解，就如果日本中國研究社群所主張。在我們從未後進過的論文我也引用林文源修改自行動者網絡理論發展出來的相關性思考方法和實作本體論來探究技術研發的動態過程，行動者可以在網絡多重連結中移動，並找出可能轉變或中介的機會。這樣的動態深度描述網絡行動者的運作，並指出轉變的可能性，就不是固定區分先進或是技術後進者，而是在技術網絡中萌生的混雜技術、情境性技術模式(陳東升, 2016:392)。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組織網絡、人際關係網絡等多重連結，建立一個動態的場域，新的連結、多地點、中間狀態、混雜技術持續生成，所以台灣半導體技術持續修正與轉變。

在一個全球經濟和產業製造體系處於邊緣位置的台灣，經歷過勞力密集的經濟發展奇蹟，但是在下一個階段必須要克服技術上的劣勢，否則仍然可能退縮與再邊緣化，這是一個沒有擁有技術的小型國家，在大國環伺的壓迫下必定會遭遇到的問題。就如同對於小型國家台灣的台灣研究，在全球主流的市場不會受到重視，長期被邊緣

化。這樣的結構性限制，並不是沒有打破的可能性，這是台積電產業發展案例所帶來的啟發。如果要打破這樣的限制就要善用流動液態的社會邊界和潮流串連的特性，匯集不同可能的元素，組合成為一種獨特且效能的生產模式。台灣半導體產業生產網絡，除了在台灣內部的協力生產外，有 50% 的組織合作關係是在台灣以外，呈現高度的在地與全球的交織性。

海洋島嶼的經濟資源生產和資源分配結構是比較去中心化的，即便統治者通常是集權政治體制。以經濟生產方式來說，從清朝開墾、日治和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主要的經濟部門是農業，而台灣是一個移民開墾的社會，農地的持有是一種分散的小地主，而不是全部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制。這樣的經濟生產結構是有制度慣性，促使台灣在 1960 年代的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是轉換成中小企業的協力生產網絡(陳介玄, 1994)，而不是以大企業為主導的模式。1990 年代的技術與資本密集轉向半導體，基本上也是在這樣的框架下展開，以生產的垂直分工而不是垂直整合的模式，就建立一種晶片設計、晶片製造、晶片封裝與測試的協力生產網絡，而不是日本和韓國的財團主導的廠內全部生產的高度決策權力集中的複雜科層制(陳東升, 2003)。此外，在垂直分工體系中，最核心的晶圓製造是代工為主，而不是品牌，透過技術和不同生產者進行深度且開放的連結，因此不是以品牌的建立提高附加價值來排除其他的經濟行動者加入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生產網絡或是供應鏈。

技術發展與製造卻是要連結民主自由世界的各種不同資源，是在全球經濟連結下所創造出來，並且維持穩定運作，並且動員台灣外流的國際遷徙人才和國際人才所造成的。1960 年代台灣許多大學畢業生前往美國就學且定居，這些寓居的人才(離散)但是和原鄉的關係不是完全斷絕的。透過同學和同事等社會網絡關係的動員，以及台灣垂直分工的生產體系降低半導體創業的門檻有機會吸引那些寓居者的固定寓居地和原鄉的往返。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從業者就是有寓居者和原居者的合作所推動的技術研發與生產製造。就如同明清的鄭氏海上貿易帝國的建立是透過移居在東南亞各地的寓居者所形成的物資買賣流通據點。

五、結論與討論

關於台灣研究的定位必定遭遇的理論問題就是獨特性與普遍性、主體性與寰宇涵納性、封閉排除性與開放交織性。在討論台灣民主發展，本文主張民主政治制度的實作與研究對於台灣社會來說是極端重要，對內是保障人民基本權益與自由，對外則是彰顯極權與民主制度兩條路徑的可能性，因此結合理論與實作深化台灣的民主制度是在地學術社群的使命，即便全球學術研究社群對於這樣的議題沒有太高的學術興趣，仍然是必須去探究和推動的，而國外的學者是不會承擔這樣的責任。

在當前國際地緣政治的結構中，台灣面對中國的巨大威脅，卻也因為民主體制的發展而成為自由民主國家的盟友，顯現出政治權力結構是影響前面提到三個理論問題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換句話說，討論主體性與寰宇涵納性的議題必須要將政治權

力關係當成核心來討論，集體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在既存的政治結構下不是對等的，且因為這樣的權力差異，過去的歷史經驗指出權力擁有者經常以征服和侵略的手段來達成其政治目的，而不是要建立一個平等互惠的世界。處於權力被支配的集體行動者，面對侵略者，如果希望維持其基本權利和自由就必須主張其主體性，透過維持主體性才有機會朝向下一個階段的環宇涵納性推進。以德國為例，”作為世界市民主義的德意志，在短期間之內，轉變為對於國民的統一國家之熱烈要求的意向....由於征服者拿破崙的緣故，普魯士失去領土的大半，軍備被限制，賠償金的支拂，與英國的貿易被禁止。面臨這樣的狀況，德意志人對於如此的世界主義之誇讚以不復存在。”(陳紹馨，轉引自黃柏誠，2018:228)，這樣的轉變驗證政治權力的支配使得德國世界主義徹底轉向民族主義。本文的主張並不是朝向一個封閉或是支配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但要指出主體性相當程度必須被尊重和保障，在對等且有尊嚴的條件下，發展出具有交織性的政治體制(聯邦制或是歐盟等)，才能夠逐漸建構寰宇主義。另外一方面，並不是忽略真實世界的權力關係而主張一種抽象的開放交織性。

從世界史角度與海洋島嶼的討論，著重在開放性與寰宇主義，而貿易與經濟資源的交換構成交織全球網絡是相對容易的，也有機會建立與大陸帝國不同的政治組織，但是要達到全球的開放性，仍然是有一些基本前提存在。經濟貿易和政治間的區隔是越來越困難，造成經濟要影響威權政治體制的轉變是不如如民主國家的預期，而平等開放、和平互惠和保障基本人權的全球連結難以達成。20世紀的世界經貿組織(WTO)組成後，同時納入台灣和中國，提供後者廣大的經濟市場，從而促進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但是中國與全球經濟的連結並沒有歐美國家所期待透過經濟影響中國政治體制的轉型。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對於市場的干預，造成跨國公平貿易的障礙，以及進一步的威權國家與民主國家的經濟衝突(Chu et al., 2022)。另外一方面，全球市場的擴大提供中國發展軍事武力的豐富資源，並搭配隱而未見的模式干預其他國家的民主政治、經濟與文化體制來提高中國全球影響力(吳介民與黎安友，2022)，並確立威權統治的優越性。21世紀的地緣政治因為中國與俄羅斯而產生巨大的改變，再一次進入到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的對抗態勢，並發展出乾淨供應鏈的經濟型態，顯然全球經濟與貿易的連結並沒有促成更多的連結性和交織性。

- 史書美，2016。“理論台灣初探” 頁 55-94，收錄在史書美等編，*知識台灣：台灣理論的可能性*。
- 若林正文，2016。*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竹內好，2007。“作為方法的亞洲”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6:231-251。
- 林國明、陳東升。2003。“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全民健保的公民參與經驗。” *台灣社會學* 6: 61-118.
- 林國明，2009。“國家、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在臺灣的發展經驗。” *臺灣社會學* 17:161-217。
- 吳介民與黎安友(鄭傑憶譯)，2022。*銳實力製造機* 台北：讀書共和國。
- 柯志明，2021。*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陳偉智，2022。*伊能嘉矩：台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陳東升，2003。*積體網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組織網絡分析* 台北：群學，2008.
- 陳東升，2010。“六十年來社會在臺灣的發展：制度建立與研究領域的變遷。” 頁 1-28，曾熾芬等編，*台大社會學文選：回首五十年* 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 陳東升，2016。“台灣科技產業與技術研究的自我後進化之探討” 頁 379-402，收錄在史書美等編，*知識台灣：台灣理論的可能性*。
- 陳國棟，2021。“季風吹拂下的海洋東南亞”，頁 15-18，收錄在*風之帝國*，台北：聯經。
- 鄭維中(蔡耀緯譯)，2021。*海上傭兵：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戰爭、貿易與海上劫掠* 台北：衛城。
- 鄭維中，2021。“尋回東南亞的歷史圖景”，頁 19-23，收錄在*風之帝國*，台北：聯經。
- 溝口雄三(林右崇譯)，1999。*做為方法的中國* 台北：國立編譯館。
- 子安宣邦(陳瑋芬譯)，2008。*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蔡石山，2011。*海洋台灣：歷史上與東西洋的交接* 台北：聯經。
- 湯志傑，2016。“現代性的實驗室：從多元現代性的觀點詮釋台灣在世界史的意義之嘗試。” 頁 95-140，收錄在史書美等編，*知識台灣：台灣理論的可能性*。
- 廖咸浩，2016。“華人海洋與台灣：海盜、另類現代性、後中國動能。” 頁 291-335，

收錄在史書美等編，*知識台灣：台灣理論的可能性*。

黃柏誠，2018。“陳紹馨的黑格爾市民社會的成立一文與作為中國社會文化研究實驗室的台灣。”頁 205-257，洪子偉與鄧敦民編，*啟蒙與反叛：台灣哲學的百年浪潮* 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曹永和，1972。“十七世紀作為東亞轉運站的台灣” *台灣風物* 48:91-116。

曹永和，2000。*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 台北：聯經。

Chen, Dung-sheng. 2021.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ociology: A Case Study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Engagement in Taiwan."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ublic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Pp.133-143.

Chu, C.Y.C., P.C. Lee, C.C. Lin, and C.F. Lo. 2022. *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 London: Routledge.

Kobayashi, Tadashi. 2007. "Technology Democracy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Japanese Experiences After 1990." Pp. 141-155, edited by Liao Jin-Guei and Wang Shing-Chun. *The Light of Public Discussi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Taipei: Taiwan Think Tank.

Rubinstein, Murray. 2009. "Is Taiwan Studies Dead? The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of a Sub-field,"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Madrid.

Schubert, Gunter et al. "Linking the Taiwan Studies and China Studies Fields: How to Argue for the Faculty Recruitment of Taiwan Scholars at Wester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1:193-208.

Scott, James C. 2010.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us Press.

Shi, Shu-mei. 2018. "Linking Taiwan Studies with the Worl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1:209-227.

Sullivan, Jonathan. 2011. "Is Taiwan Studies in Decline?" *The China Quarterly* 207:706-718.

專講：合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談永續發展的跨領域研究典範

第十四屆發展研究年會

2022
11/19(六)
13:00-14:30

國立東華大學
人社三館
元瑾講堂

主講人:戴興盛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主持人:李明安 教授

主題講座
整合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
談永續發展的跨領域研究典範

主持人：李明安 教授

(國立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特聘教授暨副校長)

主講人：戴興盛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戴興盛教授研究領域包含永續發展、自然資源經濟學、共有資源治理、社區保育、保育與發展，以及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整合治理，在媒體中常可見其對於環境議題的評論。長期投入東臺灣永續發展議題，透過跨科際整合研究，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共同路徑如何可能，並進一步推動韌性導向治理，探討其中制度所扮演之角色。

專講：流域，作為區域想像與研究的單位

第十四屆發展研究年會

2022
11/20(日)
09:00-10:30

國立東華大學
人社三館
元瑾講堂

主講人：黃宣衛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主持人：簡旭伸 教授

主題講座
流域
作為區域想像與研究的單位

主持人：簡旭伸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教授暨臺灣發展研究學會理事長)

主講人：黃宣衛 教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暨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合聘教授)

黃宣衛教授研究專長為文化人類學，關心主題包括族群、宗教與認知。著有《阿美族》、《國家、村落領袖與社會文化變遷：日治時期宜灣阿美族的例子》、《共築蓬萊新樂園：一群池上人的故事》，並於近期出版《成為池上：地方的可能性》。長期在東台灣做研究，並以區域研究的眼光，跳脫原住民研究與漢人研究的分野，探討在變遷中，個人、社會以及文化與環境之間的互動與關係，並且探尋學術研究與地方社會共謀發展的可能。

六、議事規則

感謝各位主持人在議程進行上的協助，以下提供原則性的議事規則，供參考。

壹、專題演講：90 分鐘

議事流程	專題演講
主持人引言	5 分鐘
演講者演講	70 分鐘
綜合問答與討論	10 分鐘
主持人結語	5 分鐘

- (一) 出席演講者若需提問，請以舉手請求發言，並說明服務單位與姓名。遇有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由主持人決定發言順序。
- (二) 出席演講者同一場次發言以一次為限，但如無其他出席者發言，經主持人同意得再行發言。

貳、論文發表

每場次以 3-5 篇發表論文不等。原則上，每篇論文發表以 15 分鐘為限，每篇論文問答與討論以 5 分鐘為限。

議事流程	論文發表
主持人引言	3 分鐘
發表者發表	15 分鐘
每一問答與討論	5 分鐘
主持人結語	3 分鐘

3-4 篇論文發表場次：80 分鐘

4-5 篇論文發表場次：100 分鐘

一、發表人規則：

- (一) 每一發表人發表以 15 分鐘為限。
- (二) 工作人員於發表時間結束前 2 分鐘時，按一聲鈴，請發表人於 2 分鐘內準備結束發言。工作人員於發表時間結束前 1 分鐘時，按二聲鈴，請在 30 秒內做簡短結論。時間到時按 3 聲鈴，請停止發表。

二、綜合討論規則：

- (一) 出席者若需提問，請以舉手請求發言，並說明服務單位與姓名。遇有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由主持人決定發言順序。
- (二) 出席演講者同一場次發言以一次為限，但如無其他出席者發言，經主持人同意得再行發言。
- (三) 議程流程進行的順序與形式，例如即問即答或綜合討論，在時間許可的範疇下，由主持人或與發表人彈性應用。

七、大會議程

11月18日(五) 13:45-17:00

場次	第一場論文發表 (人社三館) 13:50-15:10		
1A	政大國發所 X 國合會「政府開發援助」01		場地 B125
	主持人：張鑫隆 發表人： • 洪士軒 政府開發援助計畫之碳盤查分析-以我國於海地執行之稻作計畫為例 • 曾晴婉 改善農業價值鏈對於促進經濟活動之影響：以印尼茂物農企業經營計畫（2011-2014）為例 • 汪宗濤、曾建堯 淺談我國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之實踐-以我國援外機構國合會之公私夥伴關係為例		
1B	原民性的多重視野與想像 花東經驗 01		場地 B130
	主持人：潘繼道 發表人： • 李宜澤 從「傳統領域」到「基礎建設」：南勢阿美族人都市化祭儀地景的空間轉換 • 賴淑娟 我們織不同的故事：臺灣泛文面族群編織文化復返的揉雜與解殖反思 • 林素珍 高雄市都市阿美族新世代文化實踐的歧異性之探究		
1C	香港與東南亞的華人社會組織：在地發展與臺灣連結		場地 C108
	主持人：藍逸之 發表人： • 寇氏美源 異域求生-越南政權的轉變對華人社會的影響 • 黃新洋 馬來西亞霹靂南海會館的風俗儀式傳承與發展:以耆英會、七夕節為例 • 鍾嘉晉 冷戰時期親臺香港僑務團體發展研究：以「救總」及「港九救委會」為例 • 崔鳳堯 香港道教聯合會的發展及其社會功能		
1D	USR 與教育現場		場地 C112
	主持人：陳新豐 發表人： • 吳忻如 USR 計畫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研究初探 • 張力亞、朱俊彥 大學協力鄉村小學教育的行動設計：社群治理分析觀點		
場次	第二場論文發表 (人社三館) 15:30-17:10		
2A	USR，然後呢：USR 計畫的成效評估和政策倡議		場地 B125
	主持人：王信實 發表人： • 江書宇、鄭力軒 在管理主義與住民賦權之間：興隆公宅的治理與日常生活 • 蘇昱璇、王信實 高中生參與服務學習成效之個人背景、服務動機與核心素養 • 翁曼婷 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訪視評估之研究—以臺北市社工人員為例 • 洪怡如 USR 計畫的中長期成效評估		
2B	從 USR 到 USSR		場地 B130
	主持人：陳啓東 發表人： • 陳新豐 大學社會責任深化評估實踐與反思的歷程—以朱雀先驅屏東偏鄉三師共學模式為例 • 張茹茵、陳姝希、黃玉枝、陳楷翔 心智障礙成人健康賦能跨域專業整合行動方案之成效--以彈力 i 健康為例 • 黃露鋒 屏東前堆客庄經濟服務藍圖暨商業模式之研究 • 劉育忠、曾嘉民、呂雅琪 如何親近陌生的自我與他性：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參與學習者的置身學習與反身性思考—一個 USR 種子型計畫實踐的行動研究 • 黃芃尋、葉晉嘉 制度與業家推動地方創生過程之研究		

2C	<p style="text-align: center;">民族誌研究與全球南方跨領域探索</p> <p>主持人：何浩慈 發表人： • 費司樑 在臺離散藏人生命經驗初探 • 匡佑倫 網路民族誌—虛擬社群中草根文化之探討 • 洪嘉音 臺灣公辦民營學校的實踐與理想-以南部某國小為例 • 何浩慈 創傷與療癒：再思跨族群互動之挑戰與整合 • 林汝羽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erspective on post-conflict borderland development: The Monpas in Eastern Himalayas</p>	場地	C108
2D	<p style="text-align: center;">USR 與地方連結</p> <p>主持人：李建霖 發表人： • 宋世祥 USR 課程成果節慶化策略的效益與挑戰~以中山大學《鹽夏不夜埕》與《街頭玩童》為例 • 張力亞、許祐蓁、林芳慈 建構地方學習型社群組織的行動模式初探：以暨大的行動個案為例 • 陳仲沂 教育部 USR 計畫之大學定位與社區連結之關係：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USR 為例</p>	場地	C112
2E	<p style="text-align: center;">社會與區域發展</p> <p>主持人：王佳煌 發表人： • 林玟妤 論地方文化館政策發展二十年及政策轉型與展望 • 王佳煌、詹傑勝 臺灣文化消費階層化之研究：以參觀博物館為例 • 王昱翔、紀宗利 BTC、NFT、DeFi 指數、VIX 指數與黃金指數之關聯性研究 • 吳冠頡、鄭祖睿 以多層次觀點探討自行車通勤政策轉型過程利害關係人參與情形-以高雄市為例</p>	場地	C116

11月19日(六) 09:15-17:45

主題講座：全球與在地交織的臺灣研究 (人社三館 B113 元瑾講堂) 09:15-10:45			
主持人：湯京平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特聘教授暨國際合作長) 主講人：陳東升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場次	第三場論文發表 (人社三館) 10:55-12:15		
3A	政大國發所 X 國合會「政府開發援助」02	場地	B125
	主持人：吳奕辰 發表人： • 林義鈞、羅頌民 民國初期的環境治理 • Asma Amina Belem Reflecting on Hans Morgenthau's Thoughts on Aid Effectiveness in h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60 Years Later • 劉曉鵬 中非合作論壇的演變		
3B	原民性的多重視野與想像 花東經驗 02	場地	B130
	主持人：宋郁玲 發表人： • 陳毅峰 文化資產、認同政治與自然資源：太魯閣地區原住民生態旅遊的變遷 • 林俊偉 從疫情中的 Podcast 聲媒教學談分散式原民在地發聲：CDIO 觀點 • 黃盈豪 從「部落照顧」到「部落發展」的距離：部落文化健康站的觀察與反思		
3C	做花東：地方發展與韌性	場地	C108
	主持人：李宜澤 發表人： • 張鑫隆 GAYA 才是法律的原點：亞洲水泥公司新城山礦場租用原住民族土地真相調查過程中的發現 • 郭俊麟 數位時代下的地方志撰修與大學社會實踐-吉安鄉案例研究 • 林子新 通貨膨脹物價不上漲：臺灣戰後幣制改革的前因後果(1945-1960)		
3D	地方與韌性 02	場地	C112
	主持人：王素芬 發表人： • 吳蘇庭 屋頂光電與地方文化的裝配：以淡水忠寮社區公民電廠發展為例 • 賴子儀 從水利襲產保存到社區動態維護：屏東檳榔聚落的個案研究 • 謝玉玲、李明安、蘇琬雅 環境敘事與區域文化變遷初探—以雲林口湖為例 • 黃仁志 國家的數位轉型：丹麥的數位化發展歷程		
主題講座：整合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談永續發展的跨領域研究典範 (人社三館 B113 元瑾講堂) 13:00-14:30			
主持人：李明安 教授 (國立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特聘教授暨副校長) 主講人：戴興盛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場次	第四場論文發表 (人社三館) 14:40-16:20		
4A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之建立與永續發展	場地	B125
	主持人：戴興盛 發表人： • 王素芬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_彰化(LTSER_Changhua)介紹 • 藍逸之、王素芬、林惠真、宋郁玲 長期社會生態研究平臺概念回顧與在臺展望：跨域治理之觀點 • 宋郁玲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之社會面向資料建置與議題整合 • 陳毅青 自然環境和人為活動對彰化海岸潮埔地形變遷之研究 • 盧沛文 以海線為名：臺灣離岸風電開發與其空間影響		

	氣候變遷因應與永續能源發展	場地	B130
4B	主持人：曾聖文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郭雅婷、周桂田 Manufacturing sector based on TCFD recommendations in Taiwan • 黃慧慈、施怡君 離岸風電與漁業之衝突與調和：日本和韓國的利益共享與協調機制之案例分析 • 黃偉任、王奕陽、王涵、林木興、許志義、周桂田 建構數位轉型下的臺灣永續能源生態系統新經濟 • 林木興、劉華美、周桂田 氣候調適治理及其法律整備：歐盟、英國對臺灣組織法與作用法之啟示 		
	產業發展與空間 01	場地	C108
4C	主持人：遲恒昌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林介士 四川西北羌族地區旅遊開發政策之研究 • 徐胤承 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之思考 • 劉佳蓉、賴思廷 以情感氛圍之角度探討大型旗艦建築物對周邊土地使用之影響—以花博公園圓山園區為例 • 陳季呈、祝家蔚、李俊鴻 Integrating communities' importance-performance aspect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towards sustainable indigenous tourism • 陳偉恩 Institutions, collective action, and adaptive co-management: Analyzing the problem of social fit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 governance 		
	能源與治理	場地	C112
4D	主持人：林子新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周禮邦 Gogoro Network 換電站佈建的公私協力模式：從能源轉型治理理論的多層次視角途徑檢視 • 陳興芝、李俊鴻 Incorporating citizens' importance-performanc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acceptance of renewable energy management in Taiwan • 李崇睿 離岸風電能不能-臺灣離岸風電產業的創建、落地與著根 • 麥傑米 臺灣的利害關係人問題：切入離岸風力發電產業 • 鄭以萱 永續發展管理人才培育之探究 		
	性別, and beyond	場地	C116
4E	主持人：孫嘉穗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Manasse ELUSMA, Thung-Hong LIN, Chun-Yin LEE Climate change through a gender lens: Examining farmers' perceptions and coping strategies in Haiti • 張哲源 我在花蓮做同志：逃離臺北的性別實踐 • 魏玫娟 Masculine development and gender equality: The case of Taiwan 		
場次	圓桌論壇（人社三館 B104） 14:40-16:25		
論壇主題：XPlorer 探索者計畫—走入大學的疫後新課綱世代：文化世代衝擊與再適應 主持人：彭心儀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許書銘、李佩玲 大學入門課程支持系統之建立-以東海大學 Alpha Leader 為例 • 許輝煌、包正豪、蔡宗儒、黃瑞茂、李長潔 「探索」作為行動方法：以「探索永續」、「素養導向」課程為例 • 陳柏宇、陳佳慧、王皖佳、張舒斐、詹雪蘭 素養的接力賽-以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新生轉銜課程為例 • 杜瑞澤、朱谷熹、蔡旺晉、李傳房 後疫砌兵—色彩學基礎素養課程的創新教學模式研究 • 周德嫻、曾明怡、劉紀雯 外語人才科技賦能與永續議題初探 - 以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為例 與談人：焦傳金、林崇熙、吳明錡			

場次	第五場論文發表（人社三館） 16:30-18:10		
5A	中國（綠色）科技治理與發展		場地 B125
	主持人：陳虹穎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劉秋婉 以代碼化拼裝體概念初探中國綠色金融科技在一帶一路與數位絲路的發展 • 林峻達 中國科技企業與跨國治理：以綠色金融科技分類架構的成形為例 • 黃彥誠 一帶一路下的孔子學院-以東南亞為例 • 黃兆年 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規範擴散與極限：一個世界體系論的觀點 		
5B	解析遷移：流動/無法流動		場地 B130
	主持人：盧沛文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宋郁玲 留不住，走不了一臺灣人才回流的多重空間經驗與資本積累 • 許嘉文 學術資本主義下臺灣學生跨國留學流動性的建構 • 遲恒昌 移居花蓮的農業實踐 • 黃紫翎 我能在鄉村找到身心平衡嗎？返土歸農女性在另類農食網絡裡的自我關照與健康福祉 • 林姿萱 回鄉？創生？宜蘭青年返鄉與地方藝術季發展 		
5C	產業發展與空間 02		場地 C108
	主持人：林政逸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高甫承 都市多樣化產業群聚—以內湖科技園區資訊系統整合產業為例 • 曾聖文 能源轉型中的技術學習：臺灣風能產業的快速跟隨與產業聚落 • 鄭安廷 從空間經濟之視角分析產業韌性 • 施柏榮 美國關鍵供應鏈政策對臺灣產業的影響：以半導體產業為例 		
5D	公民與行動		場地 C112
	主持人：魏玫娟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李天健、邱星威、錢克璋 當代臺灣地方型公民社群的形成--璞玉田的抗爭、韌性與創生 • 李俊鴻、陳興芝 Integrating citizen's multiple preferences on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n Taiwan • 向明珠 吃貨萬歲？：在民主社會追求美食的正當性 • 王梅、黃錦山 餐桌上的社會運動：從「慢食」拿回原住民族「食物主權」-花蓮縣「原住民族野菜學校」實例探討 • 曾子睿 青年群體的社會參與-以花蓮 193 縣道拓寬爭議為例 		

11月20日(日) 09:00-12:20

主題講座：流域，作為區域想像與研究的單位			
(人社三館 B113 元瑾講堂) 09:00-10:30			
主持人：簡旭仲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教授暨臺灣發展研究學會理事長)			
主講人：黃宣衛 教授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暨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合聘教授)			
場次	第六場論文發表 (人社三館) 10:40-12:20		
	人與非人	場地	B125
6A	主持人：林潤華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應尚樺 「照顧人，照顧土地」：園藝治療下的多元照顧經驗 • 林潤華 旅行的拼裝體：同伴動物、旅行與治理 • 陳品嘉 「雞」本代謝：新竹市都市養雞的物質分解與社會重組 		
	認同、文化與關係	場地	B130
6B	主持人：黃盈豪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Betty Betharia S. Naibaho Agency and Culture in the Traditional L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Lake Toba Area, North Sumatera, Indonesia • Pakorn Phalapong Milk Tea Alli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of milk tea in the Asian context • 吳柏毅、賴淑娟 店舖、人與地方：以「關係性」論述探究雜貨店的地方意義 • 林冠妤 A World Project：國立東華大學外籍生的跨文化組織參與 		
	新冠疫情下的社會與區域發展	場地	C108
6C	主持人：賴昀辰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戴瑜慧 Another Man-made Virus Besides Covid-19? Discourse and Sentiment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edia's Statements on Taiwan During the COVID-19 Period • 許源派 後疫情與戰爭下國家發展的重新審視 • 柯雨瑞、鐘太宏 新型冠狀肺炎 (COVID-19) 疫情影響下之相關應變體系規劃及執法作為之問題與對策 		
	國際發展與合作	場地	C112
6D	主持人：張瓊文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曾建元、詹佳宜 中國劇變與臺灣對策 • 林仲慶、楊名豪 WTO 漁業補貼談判：當前成果與待解決課題 • 葉思妤 以跨國倡議網絡探究香港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之成效及臺灣扮演之角色 		
	邊緣與危殆	場地	C116
6E	主持人：蔡侑霖 發表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裴浩哲 助人的方式與原因？從社 • 工和實業家們的個人觀點出發，了解「後復仇之都」的臺北市無家者服務，如何在後新冠肺炎時代的三尺度空間動態中，不斷的產生與再造。 • 林秉賢 跳島效應：脆弱家庭兒童的社會空間習得經驗 • 林嘉男 從豐腴之島到邊陲離島-近代蘭嶼發展歷程的政治經濟分析 • 蔡侑霖 是轉變還是消逝：工業化及都會區擴張下的當代都市客庄 		

八、論文摘要

第一場

- A. 政大國發所 X 國合會「政府開發援助」01
- B. 原民性的多重視野與想像花東經驗 01
- C. 香港與東南亞的華人社會組織：在地發展與臺灣連結
- D. USR 與教育現場

政府開發援助計畫之碳盤查分析- 以我國於海地執行之稻作計畫為例

洪士軒*

本文旨在系統性建立我國政府開發援助計畫之碳盤查機制，並分析碳排放結果，做為未來碳調適類型計畫介入之依據。前言：Li、Lee 及 Wang 等人研究指出，當增加 1% ODA 時，將會增加約 0.23% 之碳排放量，進而增加其環境影響風險，顯示政府開發援助計畫雖能對當地經濟產生正向影響，卻也可能直接增加受援國碳排放量。另外，近年來環境與氣候變遷對全球所造成極大影響，發展援助領域除積極提升環境及氣候領域之投入外，亦運用評估機制掌握所執行之計畫對受援國造成之影響，並於計畫內納入調適做法降低相關危害。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作為我國專責援外機構，長期協助夥伴國家推動環境永續發展，本文旨在評估糧食安全類型計畫之碳排放情形。海地為我國位於加勒比海地區之友邦，氣候變遷已成為該國國家發展面臨之重大挑戰，據 UNDP 及 USAID 研究指出，該國碳排放量多半來自農業，惟農業除了為該國經濟發展之核心產業，亦為國合會於當地推動國際發展之重要領域。本研究首度將「碳管理」議題導入我國農業類型援外計畫，針對海地稻作計畫之種植階段進行碳盤查及分析，期能取得完整之碳排放數據資訊、找出其中排放熱點，並建立相關基礎線，做為我國農業援外計畫「減碳」精進方向及永續經營之策略依據。方法：本研究以「生命週期評估法」蒐集國合會在海地阿迪波尼河谷平原產區之稻作種植階段各項工作（含：整地、播種插秧、施肥、病蟲害防治、灌溉、採收及運送等）所需能源及資源投入量，並遵循國際 IPCC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指南等統計方法計算碳排放量（CO₂ 當量）。結果：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合會於海地執行之稻作計畫，每年於種植階段產生之碳排放約為 5,405 公噸 CO₂ 當量，約占該國稻作生產總排放 1.19%；此外，該計畫每公斤稻作排放 1.35 kg CO₂ 當量，以肥料施用所產生之碳排放量占比最高（97.76%），係排放熱點，其中又以湛水栽培所產生之甲烷（CH₄）及使用氮肥所產生之氧化亞氮（N₂O）係主要碳排放源。進一步將本研究數據與其他研究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該計畫碳排放量雖低於海地當地稻作計畫之碳排放量（4.11 kg CO₂ 當量/每公斤稻作），然 USAID 透過乾濕交替灌溉法及減少 50% 化學肥料等介入方式，將相關稻作計畫碳排放量降低至 0.81 kg CO₂ 當量/每公斤稻作。類似結果亦出現在 USAID 於孟加拉執行之稻作介入計畫（1.11 kg CO₂ 當量/每公斤稻作）；另，與我國研究比較，該計畫碳排放量略低於我國稻作種植所產生之 1.49 kg CO₂ 當量/每公斤稻作。結論：本研究依據國際規範建立我國農業類型援外計畫之碳盤查機制，相關結

*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研究發展考核處-助理管理師，s.h.hung@icdf.org.tw。

果符合國內外稻作碳盤查相關研究，肥料施用皆為主要碳排放源。此外，本研究結果將做為建立我國援外計畫碳排放數據之參考，除可發展我國援外計畫之碳管理及減碳意識外，亦可藉此擬定相關減碳策略，如採用合理化施肥/減少化學肥料使用、有機栽培、謹慎水分管理、節水灌溉等精進做法，做為回應夥伴國環境永續政策之重要依據，亦具體落實降低對環境之影響、減緩氣候變遷及維護糧食安全等永續發展目標，拓展我國符合國際趨勢之新興援助方法及影響力。

關鍵字：國合會、碳盤查、生命週期評估、稻作、政府開發援助

改善農業價值鏈對於促進經濟活動之影響： 以印尼茂物農企業經營計畫（2011-2014）為例

曾晴婉*

為檢視改善農業價值鏈對經濟活動之影響，本研究以實證方式檢視於印尼執行之「茂物農企業經營計畫」，藉由分析介入產業價值鏈之生產、銷售面向，對於計畫區域農作物銷售與家戶收入變化情形，進而釐清對經濟活動產生之影響。前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第 8 項目標為「促進包容且永續的經濟成長，讓每個人都有一份好工作」，其中子項目之內涵包含透過改善價值鏈促進經濟活動。近年來，我國農業發展從以往「生產型農業」轉為「價值鏈農業」，在國際發展領域上亦將農業價值鏈（Agricultural Value Chain）列為協助發展中國家農村經濟轉型之重要策略。透過產業價值鏈的加值概念，轉換過往以農作物生產為主的產業模式，納入具市場機制之加工、行銷等活動，除擴大市場面外，亦可增加農民收益、改善家戶收入。方法：本研究為橫斷式研究，採準實驗設計方法，以自編結構式問卷蒐集受訪者資料，問卷內容亦通過中央研究院研究倫理審查，取得核可證明書，案件編號 AS-IRB-HS-21048。資料分析則因應計畫介入內容，以受訪者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銷售價、銷售額及家戶收入探討計畫產生之經濟影響，並以反事實分析法確認計畫效果。結果：本研究共計回收 142 份有效問卷，對象包含 50 位計畫參與者與 92 位非計畫參與者。本研究結果顯示，計畫參與者之農作物單位面積產量、銷售價、銷售額及家戶收入相較於計畫介入前均有所提升，其中農作物銷售價、銷售額及家戶收入亦達統計上顯著之差異（ $p < 0.05$ ）；此外，反事實分析之結果亦顯示，計畫參與者之農作物銷售價及家戶收入亦顯著高於非計畫參與者（ $p < 0.05$ ）。結論：本研究以實證方式說明我國援外計畫之具體效果及永續影響。整體而言，該計畫透過提供「技術協助與加值服務」、「農民組織/機構功能強化」、「能力建構/培訓」及「產銷規劃與品牌建立」主軸改善當地農業價值鏈，綜合性地提升作物附加價值及市場競爭力，進而改善農民家戶收入，帶動當地就業機會與經濟發展，亦創造當地農企產業發展動能，顯示我國於當地推動之農企業類型計畫，不僅確實發揮永續影響力，亦落實 SDGs 之理念與意涵。

關鍵字：國合會、計畫評核、農業價值鏈、農企業計畫、國際援助

*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研究發展考核處-助理管理師，c.w.tseng@icdf.org.tw。

淺談我國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之實踐- 以我國援外機構國合會之公私夥伴關係為例

汪宗濤*、曾建堯**

本文採取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觀點來針對我國、美國和澳洲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機構之發展背景、發展策略和其各自的公私夥伴關係合作案例三面向進行比較，發現在國際援助的發展背景和歷程方面，與各國所面臨的國際政治局勢關聯性很高，並因應各自面臨之政治困境，以及擴展國際話語權之目的，採取特定的援助發展策略，另臺、美、澳 3 國政府在援外事務之預算及資源上有明顯落差，致各自援外策略不同，而透過分析 3 國於援外事務中的公、私部門夥伴關係，本文發現其關係之發展對於 3 國援外量能與成效均產生影響，然因我國援外資源和資金遠遠低於美國和澳洲，私部門資源與技術可挹注於援外事務公部門之不足，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的「創新與影響力中心」、「全球發展聯盟」和澳洲外交暨貿易部的「商業夥伴關係平台」，均為援外事務中專責負責統籌公私夥伴關係的整合平台，我國國合會首創援外行動加速器「2021 國合會發展 x 創新 x 永續實驗競賽 - 影響力先行者計畫」，其執行時間僅為一年，且相較美、澳推動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之量能不足，倘未來真正建立起專責平台，將能更有效的提升我國於夥伴國家執行援助計畫之成效，本文希冀能透過臺、美、澳 3 國間援外領域中公、私夥伴關係的分析，提供我國援外單位未來的發展建議，並提升我國執行國際援助的成效。

關鍵字：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國際合作與發展、國合會、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澳洲外交暨貿易部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研究生，tsunghao0628@gmail.com。

**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研究發展考核處-管理師，cy.tseng@icdf.org.tw。

從「傳統領域」到「基礎建設」： 南勢阿美族人都市化祭儀地景的空間轉換

李宜澤*

南勢阿美族群世居奇萊平原南端，日治時期以來部落範圍，尤其是受移墾者擠壓的生活空間，讓許多祭儀活動也或被迫偏離原來的執行場域。本文擬反思阿美族在當代處境下體現的現代化工作情境，並以「都市原民性」(urbanized indigeneity) 以及「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 的觀點討論傳統儀式行動的轉變。透過吉安鄉里漏部落阿美族人參與花蓮區域基礎建設的歷史爬梳以及當代仍然留存的多樣「生計儀式」，從更廣義的「環境變遷」——包括生計模式轉變與文化基礎建設——思考當代阿美族人參與生計與祭儀活動的不同需求，及其統領域的觀點。本文主要以里漏部落現有之歲時活動為分析案例，透過「祭儀地景」(ritual landscape) 以及基礎建設的角度，討論當代歲時儀式如何受到生計模式改變與都市開發等環境條件的影響；同時透過參與式紀錄與反思不同年代的儀式活動變遷，思考部落記憶維繫的生活與祭儀地景，甚至如何在都市化的情境下與特定物種持續連結。將村落生計活動與儀式變動，視為傳統領域的行動參與，討論祭儀記憶作為部落家族政治與社會行事等層面的動態表現。透過特定儀式相關的活動種類，討論在都會化環境的影響下，是否可能將傳統領域觀點轉為「文化基礎建設」。並且從部落活動的變遷紀錄反思基礎建設都會化，體現傳統領域，以及身體記憶與當代原住民生活環境的交互關係。

關鍵詞： 基礎建設，都市原民性，祭儀地景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我們織不同的故事：
臺灣泛文面族群編織文化復返的揉雜與解殖反思

賴淑娟*

本研究以宜蘭、花蓮地區泰雅族、太魯閣族與東賽德克族的編織團體為觀察對象。解析編織文化的女性知識在當代面臨現代化、殖民與解殖的歷史過程，其發展的形貌，這過程中女性知識的揉雜、多樣發展路徑與局限，以及性別界線的鬆動。研究發現文面族群女性面對殖民與解殖過程中，處在主流社會及族內社會這種居間（in between）的位置，透過選擇新舊的元素加以轉化，然因族人不同的位置與價值而有不同的選擇，因此產生多元揉雜，眾聲喧嘩的現象，儘管眾聲喧嘩，但重要的核心價值是能呈顯族人的認同與賦權。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weaving groups of the Tayal, Taroko and East Seediq peoples in Yilan and Hualie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weaving culture, the hybridity of women's knowledge,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paths and limitations, and the loosening gender boundaries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colon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e study found that facial-tattoo women faced the process of colonization and decolonization, and they were in a position in/ between the mainstream society and the intra-ethnic society. Weaving culture was transformed by selecting old and new cultural elements. However, these women encounter different choices due to different position and value. Thus, the hybridity of weaving culture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heteroglossia. In spite of heteroglossia, the important core value is to show the identity and empowerment of the tribe.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高雄市都市阿美族新世代文化實踐的歧異性之探究

林素珍*

處在後殖民情境中的原住民族，置身在一個含混的世界，有著與祖先和大自然的
特殊關係，也有在國家與市場脈絡下的生活世界，不同世代與祖先和國家有不同
程度的連結。這種混雜與異質共存的世界是原住民族面對後殖民情境時，必要的生
存策略，是一種複雜性與動態關係（Eric I. Karchmer 2022）。高雄市 移居都市
的 第三代 阿美族人 大多出生在都市，沒有長時段的原鄉生活經驗，對於本族
文化的實踐，絕大多數是經過認知 歷程 再選擇參與 與否而不同世代對本族文化
認識有不同主觀感受，大多 經歷 在 本族 群體和大社會的交流協商與轉譯的歷
程。新世代在都會區所展現的「原民性」總是忠實呈現原住民文化的多樣性、時間
變化與混合交流，在族群聚會、文化活動、生活樣態等，面對著物質性拘限和
創新可能。本研究以都會區最可能展現原民性的族群聚會，包括原住民社團（包括
臉書）、同族聚會、豐年祭觀察，以 James Clifford 分析的概念銜接、翻譯與展演轉
化呈現的進路，探討新世代的都市阿美族原民性顯著含混、複雜、多重與異質的
情境，以及他們 是如何展現自身 原住民對被承認、土地、文化權和主權的權利
要求總是假定一種根植於血緣與土地的連續性。我們很容易會把這種歸屬意識看
成本質上是往後望，是當代混合體中一種「殘餘」成分。然而，如果我們把它視為
歷史實踐和生活實踐，傳統和它的許多近義詞（遺產）將會是指一個互動、創造和
適應的過程（林徐達、梁永安譯；James Clifford 著，2017:36），它將展現出文化
實踐的歧異性。

關鍵字：阿美族、都市原住民、文化實踐、銜接、展演、翻譯、原民性

*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副教授林素珍。

異域求生-越南政權的轉變對華人社會的影響

寇氏美源*

在所有東南亞國家中，曾在歷史裡以漢字文化圈為首的國家，為數不多，其中漢化最深刻的就是越南。越南曾歷經千年被中國統治過的時代，因此受其影響深厚，故而成為華人移民東南亞主要國家之一。甚至華人在當地，至今亦成為當地民族之一的華族；然而在近代華人移民過程當中，在歷史大變局之下，越南曾經歷被法國殖民、日本佔領、南北越分治、統一等政權多次更迭。在此更迭中，由於政權的多次轉變，影響政策的變化，其中變化最大的便是我們所熟知的南越西貢（今胡志明市）。那麼南越在這個政權更迭變化下，其如何影響了華人的社會生活，對華人社會又產生怎樣的發展與限制，正是本文欲探討的問題。因此，本文將分成三部分探討，首先以越南的政權變化更迭進行概述，爬梳大變局時代下的越南歷史。其次，在此政權更迭之下，越南政權對於華人政策的實施。最後，透過這些政策實施的變化，來看到其如何影響華人的社會生活。也就是說，透過這三部分的串連，試圖還原及勾勒越南政權的轉變對華人社會生活的影響。

關鍵詞：越南、政權更迭、華人政策、華人社會

*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生。

馬來西亞霹靂南海會館的風俗儀式傳承與發展： 以耆英會、七夕節為例

黃新洋*

連義廟於 1905 年在怡保謙街 (Jalan Masjid) 成立，是馬來西亞怡保最早註冊的婦女社團，創始人為早年遠渡到霹靂州謀生的十位金蘭姐妹，其中 7 位為自梳女與 3 名一般女性，在高峰時期約有 100 名會員，大部分為番禺人，也由於該會多數會員為自梳女，被當地稱為「媽姐會」(粵語俗稱)，她們供奉曹主娘娘，據信與番禺婦女的勤勞與勇敢、不畏強權的性格有關，與其他廟會與社團組織不同的是該會只招收女性會員，並且能夠點名將會員籍傳位，如自梳女的養女或侄女。每年農曆五月廿三日為曹主娘娘誕辰，一連慶祝四天，她們在廟前搭起鐵棚舉辦粵劇，向曹主娘娘供奉葷食，會員一起聚餐、打麻將，在當日亦是理事會改選的日子，由「勝杯」最多的會員出任「大爐主」，第二多為「二爐主」，分別擔任主席與秘書，其餘三人出任理事，就這樣把曹主娘娘“任命”的理事名單呈交社團註冊局。會員在膜拜曹主娘娘時，兩人共握一支香，象徵「義結金蘭」，祭拜必須湊成一對是該廟獨有的傳統。令人惋惜的是，時隔 116 年後，由於耆老凋零、會員無幾，自梳女的蹤跡也已經不在，理事決定於 2021 年解散，並將祭祀的文物贈予霹靂番禺會館保管，本文針對最後一批理事以及會員進行訪談，挖掘關於番禺移民馬來(西)亞所帶來的民間信仰與風俗習慣。

關鍵詞：番禺社群、媽姐會、自梳女、怡保連義廟、曹主娘娘

* 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碩士，haobin1199@gmail.com。

冷戰時期親台香港僑務團體發展研究： 以「救總」及「港九救委會」為例

鍾嘉晉*

香港社會團體組織發展，具備多元化服務面向和背景，當中甚至有來自臺灣的團體組織，在香港進行救濟援助服務和僑務政策，香港地位獨特，在冷戰時期的香港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現今卻甚少有人提及和研究這些臺灣僑務團體發展歷史。親台香港僑務團體透過實際援助、緊急救助、一般救助及文化教育救助，增加僑居地居民對臺灣的歸屬感和支持度。1950年代初期，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中退守臺灣，國民政府為爭取民心、凝聚反攻大陸的力量，積極透過「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救濟香港的災胞。「救總」及九龍總商會組成「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簡稱港九救委會），在香港調景嶺營中設立駐營服務處，除接濟災民外，也與香港政府進行斡旋。可謂充分發揮民間資源。另一方面，設立港、九地區獎助金、辦理調景嶺中學，以及「香港中國文化協會」，則專門援助港澳自由文化人士、救助大陸逃港學生和在港清寒文人，體現了僑務工作多樣性及多軌外交的靈活性。

關鍵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
香港中國文化協會、僑務救濟

The Pro-Taiwan Hong Kong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rganization's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tasked the Affairs organization asked with the many refugees fleeing the Mainland in Hong Kong and Rennie's Mill Camp after the war since the Cold War.

On the other hand, "The 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Limited" is dedicated to assisting Hong Kong cultural figures, students fleeing from the Mainland, and intellectual, reflecting the diversity of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ee China Relief Association", and "The Hong Kong and Kowloon Relief Rennie Mill Refugees Affairs Commission", They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cline during the Cold War to 1997 Handover of Hong Kong . It is hoped that the discussion will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ffairs organization's.

Keywords: The Free China Relief Association(FCRA), The Hong Kong and Kowloon Relief Rennie Mill Refugees Affairs Commission, The 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Limited, affairs organization's

*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二年級研究生。

香港道教聯合會的發展及其社會功能

崔鳳堯*

在 1920 至 1950 年代前後,因當時的政令、戰爭等問題,有不少廣東的道侶南下到香港開設分壇,香港的道堂數量因而增加卻分散。然而,當時沒有一個組織統合整個道教界,在此背景下,促使「香港道教聯合會」在 1967 年成立,並成為官方與道教界聯絡的橋樑。作為中國本土宗教的道教,在西方思想薰陶下的社會,道教被定義為封建與迷信。香港道教聯合會作為香港道教界的聯合組織,以及香港道教的領袖團體,在面對以上的指控,以及謀求在現代社會的傳承與發展。因此香港道教聯合會在會務發展方面,除了加強各道派、道堂之間的聯繫與團結外,更致力弘揚道教、推廣道教文化,以及興學育才,並以舉辦社會慈善事業為宗旨,以服務香港社會為己任,關懷與融入現代社會,持續在香港社會發展與付出,使香港道教聯合會成為具宗教性的社會團體。因此香港道教聯合會對香港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程度的關係與重要性。

關鍵字：香港道教聯合會、利物濟世、道教在地化、社福團體、香港社會

Around the 1920s and 1950s, due to the government decrees and wars at that time, many Taoist from Guangdong, went to Hong Kong to open a Taoist templ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aoist temples in Hong Kong and the dispersion of any organization that united the entire Taoist organizations, the “The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67 and became an official bridge between the Taoist organizations. As a native Chinese religion, Taoism is defined as feudal and superstitious in a society influenced by Western. The “The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as a joint Taoist organization in Hong Kong and a leading group of Taoists in Hong Kong, is facing the above accusations and seeking to inherit and develop in modern society. Therefore, in terms of conferenc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and unity between various Taoist schools and Taoist temples, the “The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is also committed to popularize Taoism, introduce Taoist culture, and expend learning and educating talents, and with the purpose of organizing social charity, taking serving Hong Kong society as its own responsibility, caring for and integrating into modern society, and continuing to develop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society, so that the “The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has become a religious social organization. Therefore, the “The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relationship and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society.

Keywords: The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Overview Of Taoist Charitable Work, Taoism Localization,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 Hong Kong Socie

* 淡江大學歷史所碩士生。

USR 計畫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研究初探

吳炘如*

聯合國於 2015 年倡議 Transforming our world: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提出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及 169 個細項指標（Targets），鼓勵各國發展能滿足當代人類需求，而不損害後代人類滿足需求的永續發展模式。永續發展主題躍然成為國內外重要課題。

教育部身為高等教育主管機關,對於推動高等教育永續發展最具支持性措施即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兩期計畫每年執行金額約 12 億元,持續鼓勵大學落實社會責任並將其納入校務治理架構,加深國際連結的面向。使用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作為國際連結指標,並藉由呼應零飢餓、消除貧窮、氣候行動、性別平等、優質教育、減少不平等、良好健康與福祉、乾淨用水及衛生、永續城市及社區等共同主題,進行國際永續發展交流。

USR 第三期計畫徵件於 111 年 6 月份辦理說明會,計畫類別調整為「國際合作」與「特色永續」兩大類型,持續緊扣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SR 計畫是目前教育部推動大學校院補助計畫中,最能接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且涵蓋 SDGs 面向最為完整。本研究藉由分析 USR 第一二期計畫核定情形與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概況,瞭解並評估教育部 USR 計畫對於支持聯合國永續發展之貢獻,並與 THE 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進行比較,以瞭解我國大學校院推動永續發展之利基與可再強化項目。

關鍵詞：高等教育機構、永續發展目標、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博士生。

The UN proposed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2015, proposing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and 169 sub-targets to encourage countries to develop to meet contemporary human needs, and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that does not compromise future generations of human beings to meet their need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the most supportive measure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namely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 Plan (USR plan). And incorporate it into the universities' governance structure to deepen the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In June 2011, a briefing session was held for the third phase of the USR plan, and continued to closely adhere to the SDGs. The USR plan is currentl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subsidy plan for universities, which is the most in line with the SDGs. By analyzing the approval status of the USR plans and the overview of the corresponding to SDGs, this study understands and evaluat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USR program to SDGs,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World 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s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niche and re-enhancement projects of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E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大學協力鄉村小學教育發展的行動設計： 社群治理分析觀點

張力亞助理教授*、朱俊彥專案經理**

教育的創新與扎根是提升國家競爭力、永續地方創生的首要關鍵課題。在許多的鄉村地區教育現場，深刻了解到優質的教育系統，不僅涉及正式教育體制內的教學單位服務品質，體制外的家庭教育、社區教育等系統建置也同等重要。是以，如能透過一種整合機制，串聯起地方上不同的相關利害關係者與教育資源，不僅能夠編織地方教育協作的生態網，更能提升地方教育系統的韌性力。

位處臺灣地理中心的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身為南投的國立大學。近年透過社會參與的行動觀察，盤點地方上不同學區所面臨的地方教育課題，另一方面，則是藉由校內各項計畫資源整合，輔以社群治理途徑，與不同利害關係者進行合作，規劃並執行各項正式教育體制內外的創新教育性的實驗方案。在此，本研究將以三個案例作為研究標的，藉由參與觀察、個案研究兩項研究方法，探究大學協力地方教育發展過程中，如何與不同利害關係人進行議題設定、資源整合的方法，並藉由行動的階段性成果進行反思，繼而提供相關挑戰課題，作為後續相關行動者參考之用。總體而言，企盼這項研究可為大學協力地方教育事務，提供相關的對話與參考作用。

關鍵字：鄉村地區、小學教育、大學社會責任、社群治理、暨南大學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教育學院學士班及通識教育中心合聘教師，E-Mail：purdue3011@mail.ncnu.edu.tw。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 USR 計畫辦公室，E-Mail：marcochu@mail.ncnu.edu.tw。

第二場

- A. USR，然後呢：USR 計畫的成效評估和政策倡議
- B. 從 USR 到 USSR
- C. 民族誌研究與全球南方跨領域探索
- D. USR 與地方連結
- E. 社會與區域發展

在管理主義與住民賦權之間： 興隆公宅的治理與日常生活

江書宇、鄭力軒

誕生於 1970 年代的安康平宅，是臺灣少數只租不賣的平宅，並成為貧民窟的代名詞。近年在社會住宅的政策下，安康平宅由於產權單純而改建為興隆公宅，並以混居的理念引入其他類型的住戶以及社福機構。在這樣的脈絡下，本研究以興隆社宅 D2 區為研究對象，透過深度訪談法進行關係民族誌的研究，針對不同群體之間的界線、衝突與協商，探討地方政府對興隆公宅的治理以及住戶的反應。我們發現興隆公宅的治理呈現出三組相互緊張的機制：一個是地方政府上而下透過各種計點與獎懲的規範機制。第二則是在賦權住民的理念下所形成的住戶代表機制，第三個則是以契約原則進入社區的物業管理公司。我們發現上而下的國家主要是在管理主義的意識形態下，著重的是透過各種獎懲規訓手段打造「守規矩」的住戶，並將相關規則賦予物業管理公司執行的權力。另一方面，社區的代表機制則一定程度展現出住戶經營集體生活的企圖，但面臨住戶間差異以及與管理單位的緊張關係。本文希望透過這個案例呈現出呈現當代強調混居的社宅的權力關係以及住戶在這些機制下的經驗。透過這樣的探究，本文試圖指出賦權社區居民自主經營集體生活的理想在賦權不足以及管理主義機制下的挫折，以及可能的改善之道。

關鍵字：社會住宅、治理、管理主義、賦權

The historic Ankang public housing born in the 1970s, was the one of the few public housing that was not for sale, but for rent only. Due to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mismanagement, Ankang public housing has been known a synonymous with slum.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policy of social housing, Ankang public housing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Xinglong social housing due to its pure property rights, and under the concept of “mixed-income housing”, other types of households and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had been introduced to the social housing. This study takes the D2 area of Xinglong social hous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relational ethnography research through the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 this research aims at the boundaries,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and explor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of Xinglong public housing and the reactions of dwellers. We find that the governance of Xinglong public housing presents three sets of mechanisms that are mutually tense: first, the loc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through various normative mechanisms such as counting points and punishments; secondly, the residents’ representative mechanism formed under the concept of empowering; finally,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that enters the community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ntract.

We found that under the ideology of managementism, the local government had been trying to create households that obeyed the rules through various means of reward and punishment, and gave relevant rules to the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to implement the power. What’s more, the representative mechanism of the community had showed the intention of the residents to manage collective lives, yet facing differences between residents and tensions with the management unit. Through this case, this paper hopes to present the power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social housing that emphasize mixed-income liv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sidents under these mechanisms. Through this kind of researc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e setbacks and possible ways for improvement of the ideal of empowering community, in the case of insufficient empowerment and frustration under the mechanism of managementism.

Keywords: Soci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managerialism, empowerment

高中生參與服務學習成效之個人背景、服務動機與核心素養

蘇昱璇*、王信實**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即「108 課綱」)於 2019 年 8 月正式上路，條列三大面向、九大項目之核心素養，視之為未來公民所需具備之能力，嘗試突破過去以知識為導向的教學，強調以學生做為學習的主體，期望學生主動學習，開展與他人、與社會的良好互動，並將所學實踐於社會，促進社會的永續發展。而當學生成為學習主體，「服務學習」可做為學生學習的重要手段，使學生有機會與社區、社會接觸，並在服務過程中學習。了解學生個人背景與核心素養的關係，將有助於課程的設計與教學成果的評估；了解學生個人背景與服務學習動機之關聯，以及服務學習與核心素養之間的關聯，亦有助於服務學習的規畫與精進。

本研究與台北市一間女子高中合作，針對高一及高二共 207 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初步研究結果發現，三分之一學生過去一年有曾參加校外服務性活動，五成投入的時間在全年 10 小時以下，遠低於美國、加拿大青少年每年服務超過 30 小時之中位數。家庭背景方面，有哥哥的女高中生，其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較高，其餘手足數量則與素養無顯著關聯；其他家庭背景如父母年齡、是否為本國籍、父母職業，則幾乎皆與素養無顯著關聯。個人特質方面，學生的細心程度與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皆為正相關，但與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呈現負相關。

關鍵字：高中教育、服務學習、個人背景、服務動機、核心素養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社會救助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九款訪視評估之研究— 以臺北市社工人員為例

翁曼婷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會工作人員在進行社會救助法第 5 條第 3 項第 9 款訪視評估時，會觀察家戶哪些面向及評估時考量的因素，又社工人員會遭逢哪些挑戰。本文採用質性研究，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現職於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服務之社會工作者。

本研究有以下主要研究發現：(一) 社會工作人員評估家庭狀況的面向，大致可分為：財務狀況、親友支持情形、社區網絡資源協助、家戶支出之合理性與必要性及民眾積極性，以此五大面向綜合性評估家戶狀況。(二) 個人價值觀與生活經歷、組織內同儕協助互動、民意代表介入與當事人積極性，均會對社工人員評估造成影響。(三) 社工人員進行評估時遭遇的挑戰有：1.無統一評估標準；2.社工人員調查方式有限，難以查證；3.案件壓力雖不會影響評估結果，惟會影響到後續服務品質；4.民意代表介入在評估上產生壓力；5.擔憂個案產生福利依賴；6.雙重角色產生的矛盾與價值觀衝突。(四) 社工人員對實務提出以下建議：1.增加評估時間；2.統一評估標準；3.由同一群人做評估；4.其他相關人員先提供家戶相關訊息；5.訂定適用期限以減少福利依賴。

最後，本研究對社政審查單位提出「延長社工人員評估時間以增加評估全面性」及「蒐集其他相關人員的客觀訊息提供給第一線社工人員」之建議；對政策制定者提出「修正社會救助法或其相關法規，使實務工作者能有統一評估標準」及「重新檢視親屬倫理與扶養義務之關係」之建議。並說明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及對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字：社會救助法、低收入戶、539 條款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ich aspects of households social workers would observe when conducting review and evaluation as prescribed in Subparagraph 9, Paragraph 3, Article 5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what factors they would consider during the evaluation, and what challenges they have encountered. In this study,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was adopted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social workers currently serv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a) When evaluating the condition of a household, social workers considered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the level of support from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the aid from community network resources, the reasonableness and necessity of household expenditure, and the level of positivity of the applicants. Social workers mad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a household based on the above 5 aspects; (b) Personal values and life experience, peer assistance and interaction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involvement of legislators and

the level of positivity of the applicants will all affect the evaluation of social workers; (c)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social workers during the evaluation are: (i) Lack of a unified standard of evaluation, (ii) Difficulty in verification due to limited investigation methods, (iii) Although the stress from an excessive number of cases will not affect the evaluation result, it will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follow-up service, (iv) Stress from the involvement of legislators on the evaluation, (v) Concerns about the welfare dependency the case may develop, (vi)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of values caused by the dual roles of social workers; (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by social workers regarding their work: (i) Increasing the time allocated for evaluation, (ii) Unifying the standard of evaluation, (iii) Allowing the same group of people to conduct the evaluation, (iv) Enabling other relevant personnel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f the household in advance, (v) Stipulating the applicable period to minimize welfare dependency.

Lastly, this study provides two suggestions to social administration review agencies, namely, “extending evaluation time allowed for social worker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evaluation” and “providing objective opinion gathered from other relevant personnel to social workers serving in the front line.”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proposed two suggestions for policy makers, namely, “amending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and other relevant statutes and regulations to establish a unified standard of evaluation for social work partitioners” and “re-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thics of kinship and support obligation”. Moreover,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laid out.

Keywords: Public Assistance Act, low-income household, The 539 Clause

USR 計畫的中長期成效評估

洪怡如

本研究受全球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思潮之啟蒙，而無論是公私部門都亟需思考如何完成短中長期的成效評估，讓計畫更能永續發展。另一方面，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是繼企業社會責任（CSR）後，從高等教育為核心延伸的的另一股社會參與力量。過往大學以培育人才為主，利害係人主要為校內人士，然而當擴大其社會角色及社會責任，並納入多元利害關係人觀點，就可見除了傳道、授業之外，有更多值得被期許的社會實踐工作。政大 USR 計畫呼應教育部對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關注文山區弱勢族群及社區，透過培育青年人才，發展夥伴關係，建立網絡，並引進外部資源，展現其具學術底蘊的平台價值。

本研究旨在建構政治大學 USR 計畫之成效評估流程，並以社會投資報酬率（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為主要評估工具，期待透過評估流程建置，未來更能展現 USR 計畫價值。SROI 在計算過程中關注利害關係人參與、與利害關係人確認和議和其改變效益（Input-Output-Outcome），再將社會或環境價值貨幣化。本研究掌握其八大原則下，以預估型模式，聚焦於 SROI 的第一步驟，於計畫尚在規劃之初未執行前，先了解執行團隊預計的發展方向，初步建構出研究範疇，列出利害關係人並描繪事件鏈後制訂計畫成效指標；爾後經由訪談，產生影響力框架。而本研究結果期待成為未來政大 USR 共好文山計畫後續發展「打造木柵在地支持生態系統」的依據，同時回應政策環境，讓寶貴的公共資源發揮最大用處。

關鍵字：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社會投資報酬率、成效評估

This research is inspired by the global social impact trend.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to complete short-, medium- and long-term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s to make plans more sustainable. On the other hand,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afte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is another force for social engagement. In the past, universities mainly focused on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the stakeholders were mainly people within the university. However, when their social rol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ere expanded,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were included, there would be more social practice work worthy of expectation. The USR program of NCCU is people-oriented, starts from local needs, provides humanistic care and assistance to solve regional problems. By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 developing partnerships, establishing networks, and introducing external resources, it demonstrates its academic platform valu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truct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process of the NCCU USR program, and use the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SROI) as the main evaluation tool. SROI pays attention to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Changes in stakeholders need to be confirmed and engaged. At the same time, social or environmental values are monetized. Based on its eight principl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first step of SROI in a forecast model.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USR program, we first find the expecte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executive team, initially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scope, identify stakeholders and develop outcome indicators. Afterwards, through interviews, adjust the scope and outcome indicato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expected to be the basi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create a local support ecosystem in Mucha", and at the same time respond to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o maximize the use of valuable public resources.

Keywords: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大學社會責任深化評估實踐與反思的歷程— 以朱雀先驅屏東偏鄉三師共學模式為例

陳新豐*

大學的社會責任應具有顯著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影響，通過教學、研究、公共服務對所在社區和社會福祉作出貢獻，屏東大學省思大學所肩負的社會責任，除了在校內培育師資外，也看到屏東地區特性，因此本校教師走出學術研究框架，以協助在地偏鄉教師的專業成長為主要目標，希望透過多元、長期、專業的支持歷程，分析屏東偏鄉教師的教學困境與成長需求，能適切回應教師的成長與專業需求。因此本計畫朱雀先驅：屏東偏鄉三師共學模式即是希望整合大學負責任的教學、研究和服務活動，連結小學端老師與師資生的力量，強調包括教學能力 (Teaching)、共學模式 (learn Together)、科技資訊 (Technology)，藉由不同教師組成的團隊，建立起共學模式，將數位科技能力融入其中，精進彼此的專業知識與教學能力，創造實現大學的最大價值。計畫的實踐場域是以屏東偏鄉六所國小包括塹子、佳冬、玉光、東海、大成、地磨兒與佳義國小，期待藉由真實參與、真實場域與真實議題等三個層面，從規劃、實施歷程、實施成效等三個步驟，結合計畫 (Plan)、執行 (Do)、查核 (Check)、行動 (Act) 等實施內涵之深化評估機制進行成效的檢核，利用 SRS 社會責任報告標準，以達到本計畫大學社會責任-朱雀先驅：屏東偏鄉三師共學模式中以實證為基礎、突顯大學多元特色的計畫目標。

* 屏東大學教育學系，chensf@mail.nptu.edu.tw。

心智障礙成人健康賦能跨域專業整合行動方案之成效-- 以彈力 i 健康為例

張茹茵*、陳姝希**、黃玉枝***、陳楷翔****

「彈力 i 健康」是屏東大學「讓生命不同凡想-屏東身心障礙成人服務友善環境建置」USR 之子計畫，針對心智障礙成人「健康賦能」需求，跨域專業整合行動方案以達社會共融。行動的目標為：1.發展心智障礙成人健康促進模組化課程並進行服務。2.建構校園人才培育課程模式，並培力機構照顧人員。3.提升心智障礙成人健康，促進獨立及延緩老化失能。本行動方案結合證照制度課程創新模式，以跨 2 校 3 系所師生合作，開發彈力球運動課程模組，並至心智障礙成人服務機構的場域，透過實踐、檢討回饋與修正的行動歷程。以機構服務對象進行 12 週的課程導入，應用於共 12 位心智障礙成人課程，進行每週兩次、每次 60 分鐘（含暖身、緩和）的活動實踐，蒐集介入前後的心智障礙成人健康體適能表現數據，作為彈力球運動課程模組介入成效的基礎。並辦理機構服務人員培力，以達人才培育及心智障礙成人生理健康，促進自立、自尊與自信地融入社會群體。

*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 輔英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副教授。

***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 國立屏東大學大武山學院專案經理。

“HealthMeet with Theraband and Mini-Ball” is one of sub-projects of “Making the Disadvantaged Life Difference- Construction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in Pingtung”, which is a USSR program i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This sub-project focuses on the needs of health empowerment of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This project closely collaborates with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s across various faculties from different universities to achieve social inclusion by integrating action plans. This project aimed to: Develop practical health promotion class module for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Provide campus human resources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organizations’ care employee. Facilitate health of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by promoting independence and successful aging. The project innovated new action plans including: Functional movement training program for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ies. Regular assessment of health-related physical fitness as feedback mechanism for health empowermen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ssistive devices for service users within program module. The project main outcome including: Promotion the health empowerment module program for adults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o embed locality and employ social impact. Establishment of campus human resources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certification in disability care services and collaboration with working place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 Provision of educational program for care workforces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reduce working pressures.

屏東前堆客庄經濟服務藍圖暨商業模式之研究

黃露鋒*

本研究是一個探索性研究，嘗試從地方資源整合的角度來研究前堆客庄的整體經濟發展，並試著找出前堆未來的產業服務藍圖與商業的模式為何？透過研究流程來找出長治與麟洛的產業經營模式，以產業服務藍圖與商業模式的方式來呈現研究結果，以補充在學術文獻上的不足，並提供地方政府施政的策略建議。透過文獻收集與整理相關服務藍圖文獻、前堆產業經濟相關文獻、商業模式相關文獻。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以前堆地區之客家技藝職人、回鄉青年、重點產業、文資空間之所有人、產業類協會、文化類協會、觀光產業類協會為目的性取樣的對象（Purposive sampling），透過滾雪球（snowball sampling）與目的性（purposive sampling）的方法取得適合的研究對象，以進行深度半結構式訪談（in-depth semi-structure interview）與焦點訪談（focus group interview）以作資料的收集。研究結果顯示前堆麟洛與長治目前以地方生活產業為主的模式，目標客群為內需的消費市場，未來發展方向建議為地方莊園健康體驗經濟。從麟洛高速公路下方的綠色森林與長治農科園區及市中心為主要場域，加上鄰近的莊園為營業空間，發展出符合顧客喜歡的小鎮商街觀光、輔導餐飲美食、客家文化導覽與麟洛農業與生態的莊園體驗經濟，協助製造加工業開發伴手禮，結合屏東市的觀光亮點，推出行食宿遊玩購的服務，以符合顧客的需求。研究給予各界的建議：協調鄉公所積極執行地方創生計畫，尋求輔導資源介入；在產業面的執行面要找對的人，需要政策性的長期輔導陪伴成立地方產業協會組織做橫向整合、整合地方大學與專家顧問協力，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在研究面：分類六堆鄉鎮屬性的不同、擴大研究範圍，並以行動研究，作案例分析，以期能擴及到其他高屏六堆地區。

關鍵詞：前堆、客庄經濟、服務藍圖、商業模式

* 國立屏東大學黃露鋒 PhD PMP。

This study was an exploratory research. The context of this study was in Pingtung Qian-Dui Hakka Villages. Qian-Dui includes Chang-Jhih and Lin-Luo townships in Pingtung. Due to the academic documentation of Qian-Dui with historical and industrial literatures were not comprehensive, various, and continuous. The full understanding of enti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as not documented. The trends of rec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toward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six-grade indust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experience economy, and tourism industry. There are on-going integrations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Local industries are changing dramatically. These changings were not fully documented. The researcher of this study was teaching in Pingtung University (NPTU), which is located at Qian-Dui.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attending to find out the potential industry service blueprint and business model of Qian-Dui Hakka villages for enhance academic literature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local government. This study selected local tourism associations' leaders as the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target samples by purposive and snowball sampling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rest underneath the Lin-Luo high way and Chang-Jhih agricultural park and township center were the main areas to develop small town tourism, special local cousins, Hakka cultural tour, and eco-manor experiencing economy, to assist develop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to become souvenir, and to link Pingtung City tourism destinations to promote whole package tours for fulfilling tourists. This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conduct their place-making plans, find the right persons, provide with long-term supporting policy, integrate with local universities and professionals to develop local special industries.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nsider different types of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xpand research areas to conduct action case research for generalizability.

Key works: Qian-Dui, Hakka Economy, Service-Blueprint, Business Plan

如何親近陌生的自我與他性：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參與學習者的置身學習與反身性思考—
一個 USR 種子型計畫實踐的行動研究

劉育忠*、曾嘉民**、呂雅琪***

本研究根植於研究者在執行國立屏東大學大學社會責任種子型計畫「大學作為地方場域創生的引動點」身為研究主持人的行動經驗，並通過採集擔任計畫助理與計畫工讀的大學部學生敘說，以置身學習(situated learning)與反身性(reflexivity)思考的探索為主軸，來探討高教學習者參與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所體會的學習，進而描繪高教學習者如何從「理論學習—現場運用修正」的學院與現場二元區分框架，轉變為「認同、參與—實作—行動反思—認同重建」的實作共同體框架。

通過參照人文臨床研究傳統對現場與臨床意義的開採，本研究關注現場與臨床的不確定性在學習發生論中對學習者促發的挑戰與重構，以及從中引動的自我探索與自我重構，提供高教教育者未來在設計結合現場的課程實踐之參考，以及建構實踐本位的高教學習認識論之參照。

關鍵字：置身學習、反身性思考、大學社會責任、高教學習認識論、學習作為參與

*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tedycliu@gmail.com。

**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 屏東縣立餉潭國小教師。

制度興業家推動地方創生過程之研究

黃芃尋*、葉晉嘉**

近年臺灣面對與日本相同的人口結構老化與人口失衡的困境，借鏡日本地方創生概念推展因應的策略，並宣布 2019 年為「地方創生元年」，開啟臺灣地方創生治理方針，在地方推動過程中，有一群經營在地事業的地方創生興業家（Entrepreneur），因自身具備的領導特質，在推動地方創生政策以及在地產業影響力上呈現了獨樹一格的影響力。

本研究為了更強化瞭解地方創生興業家的緣起與後續行動，以「制度興業」理論切入，瞭解地方創生興業家如何改變所處的在地情況。因制度興業家本身有利條件、個人特質深刻影響了後續去制度化的結構改變，因此本研究將主要焦點著重於地方創生興業家的有利條件及人格特質何以創造適合在地發展的場域。

本研究使用訪談研究法調查現有臺灣從事地方創生的興業家，並在紮根理論當中的歸納結果發現地方創生興業家的個人特質乃是牽動整體制度與地方的重要因素，地方創生興業家具備了敏銳的察覺力，在承擔風險的情況下積極找尋解決方案，個人特質更影響溝通策略、引導在地產業的發展。而在不依賴政策輔助下依然保有自主性的特質，因此在地方的發展而言，地方創生興業家其個人特質所形成的領導風格，對於在地有著不可或缺的影響力。

關鍵詞： 地方創生、制度興業、社區凝聚力、興業家、領導風格

*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生，matchalauren@gmail.com。

**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教授，scorpio.ball@msa.hinet.net。

In recent years, Taiwan has faced the same dilemma of an ag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as Japan. It has adopted the Japanese concept of local creation to promote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y and announced that 2019 will be the "first year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There is a group of local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 who operate local businesses. Due to their leadership characteristics, they have shown a unique influence in promoting policies and industry.

This research uses the interview method to investigate the existing entrepreneurs engaged i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entrepreneurship in Taiwan, and concludes in the grounded theory that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 ar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overall system and locality. Possess a keen awareness, actively seek solutions while taking risks,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However, it still ret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utonomy without relying on policy assistance. Therefore,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ity, the leadership style formed by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entrepreneurs has an indispensable influence on the locality.

Keywords: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Institutional theory, Entrepreneurs,

Leader style

在臺離散藏人生命經驗初探

費司樑*

離散作為二十世紀以降西藏民族命運的浮水印，深刻地影響了這個民族的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敘事。本研究結合「全球南方」的觀點，試圖將「南方」作為肯認「他者」視角與態度，使他者發聲並聆聽其話語。在這層意識之下，本文將指出在臺離散藏人的生命經驗如何使其成為混雜的主體。

本文將首先辨析「流亡」與「離散」的詞彙賦予外界社會何種對藏人的想像，並採用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方法論，試圖透過研究者「在場」參與以貼近研究對象觀點，並從該群人的視角觀看並理解此議題。故研究者透過實際置身於田野間，與在臺離散藏人互動的過程擷取具有能被彰顯意義的片段，輔以前人研究成果，提出「藏人性」的意義與可能的跨世代轉變，並在最後看見離散藏人身上背負的「藏人性」與其生命軌跡中途經的空間所導致個人混雜的個人身分及認同。

然而，本文僅是一篇先行的階段性研究，只看見從其他地理空間移動至臺灣的離散藏人的狀態，後續將會把重點放在臺藏人的後代——即是在臺灣出生、成長的離散藏人，這也是本文定名為「初探」的原因。

在臺離散藏人雖然只佔臺灣人口的極少部分，然而透過找尋身分認同並試圖建在不安定中立安全感的過程被呈現，使類似處境的讀者能夠藉由本論文產生共鳴，獲得療癒與慰藉。

關鍵詞：離散、混雜、認同、藏人性、離散藏人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The Tibetan Diaspora forming the destiny of Tibetans after the 20th century has profoundly affected the life narratives of every individual in this nation.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view the “Global South” as a perspective of recognizing the “Others” and an attitude to inspire the Others to deliver their stories which need to be listened to by people. This research aim to point out how the life experiences of the diasporic Tibetans in Taiwan make them become a hybrid subject.

The research employs ethnography as the approach. By participating in their activities, interviewing them, and analyzing their narratives, the researcher can get close to the lives of the diasporic Tibetans in Taiwan and understand the issue from their position. This article will first identify and analyze what kind of imagination the Tibetans are given by the words “exile” and “diaspora.” Secondl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being in the fields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 Tibetans, the researcher will select the fragments that can be manifested to argue the meaning of “Tibetanness,” and point out the possibl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 Finally, the article will show the hybridity of diasporic Tibetan identities and indicate that the situation is caused by their life experience and their identity with Tibetanness.

However, this research is a previous study and only discusses the status of Tibetans who migrated to Taiwan.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descendants of Tibetans in Taiwan, that is, the Tibetans who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Taiwan. That is why this article is titled “preliminary study.”

Although the Tibetans in Taiwan are a minority, disclosing how they find out their identity and their sense of security will heal those who strike a chord with them.

Keywords: diaspora, hybrid, identity, Tibetanness, diasporic Tibetans

網路民族誌— 虛擬社群中草根文化之探討

匡佑倫*

南方的概念來始於《布蘭特報告》，報告中重新定義第三世界國家，賦予他們「全球南方 (global south)」，一個更為政治中立的代名詞。本文從全球南方的觀點獲得啟發，試圖重新詮釋「南方」的意義，認為在社會及經濟發展的脈絡之下，南方通常被解讀為弱勢、落後、邊陲的代名詞。然而，本研究認為南方的概念不只是全球化體系的概念，亦非單純地理上的疆界，而是一個普遍存在於社會之中的資源不平等現象。本研究以網際網路作為研究場域，認為網際網路作為資訊社會的產物，既勾勒出人際互動與溝通對話的新樣貌，與此同時，網際網路也形成了現代人生存與活動的另類空間。網際網路的去中心化、匿名化、跨區域特性以及即時性緊密地將網路使用者集結於網路平台之中並使他們表現出特定的行為模式，他們透過行為展演吸引其他網路行動者的認同，他們共享特定價值並且相互吸引，進而產生情感依附建構虛擬社群。近年來，各式網站、手機軟體以及網路遊戲的雨後春筍，網際網路越發成為草根階級群聚的虛擬空間。草根階級的集結，在網路中也逐漸形成獨有的次文化，一種與菁英文化互斥的思想體系。本文試圖以草根為主軸，重新定義草根階級作為「南方」的社會學意涵，並梳理草根行動者在虛擬社群中的互動行為及其社會意義。本研究欲以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方式，親自參與田野現場，與被研究者長期相處，透過深入互動，了解虛擬社群中草根行動者的線上及線下互動，認識個別報導者的故事並撰寫自身作為參與者暨觀察者在場域中的身體感受與觀察發現。

關鍵字： 草根文化、南方社會、網路民族誌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研究生。

The concept of the South began with the Brandt Report, which redefines third world countries, giving them the "global south", a more politically neutral term. Inspired by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 South,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south", arguing tha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outh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less developed or periphery. However,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South is not just a term of globalization system, nor a purely geographical boundary, but a pervasive phenomenon of inequality in society. This study takes the Internet as the research field, and believes that the Internet not only outlines the new appearance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et has also formed an alternative space for modern people. With decentralization, anonymity, cross-regional and immediacy characteristic, the Internet gather users and show specific behaviors. They share specific values and attract each other, thus generating emotional attachment to construct a virtual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websites, mobile software and online games have sprung up. The Interne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virtual space for grass-roots groups to gather. The gathering of grassroots classes has gradually formed a unique subculture on the Internet, an ideological syste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elite cultur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ake the grassroots as the main axis, redefine the sociological meaning "South", and sort out the interaction behaviors and social meanings of grassroots actors in virtual communiti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nline and offline interactions of grassroots groups in virtual community. This study intends to use the ethnographic research method. Via participating in the field, getting along with researchers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study expects to write down observations of participants and observers in the field.

Keywords: Grassroots Culture, Southern Society, Internet Ethnography

臺灣公辦民營學校的實踐與理想- 以南部某國小為例

洪嘉音*

這兩年全球各地受到疫情和戰爭大肆攪和，但在這表象的結果背後，真正反映了現今人類處於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全球化的政經結構的時代背景。臺灣教育為培育出能適應快速變遷並接軌未來的人才，回應多元需求的「實驗教育三法」應運而生。在我國各類型的實驗教育中，公辦民營學校一支除了是為公私協力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icipations, PPPs）與學校治理（school governance）之實踐，其中對鄉村小校更蘊含有社會正義之考量，透過創新轉型並由內而外改變學校體質，使原本因招生不足恐面臨裁併廢校危機的學校得以續存，讓鄉村地區學生的受教權益不招致犧牲，甚至有機會獲得高品質、以學生為中心、具文化回應性的學習經驗。公辦民營實驗學校深具理想並致力透過教育彰顯公平正義之精神固然值得肯定，然而，其理論與實踐確尚存在著落差。本文首先回顧及整理國內目前公辦民營實驗學校的理論基礎及發展現況，並以一所位於南臺灣漁村的公辦民營學校為主要對象，概述該校的轉型歷程，並透過校長作為公、私之間的橋接者與行動者的身份，經驗與見證公、私部門協力治理的張力與尚未銜接之處；同時也透過校長視角，看見主流教育制度與另類教育策略、原任資深教師與新任年輕教師、轉型前後家長態度轉變等方面之差異。本文分析與討論部分，以互為主體性觀點檢視公辦民營學校在理論與實踐的落差中，公部門與私部門所建構的互為主體性樣態，以及校長、教師、家長乃至學生的主體性如何在此種創新的學校型態中開展出不同樣貌。本文最後，以哈伯瑪斯「理論優位於實踐關係的顛覆」的現代哲學主題為本研究帶出更高一層次的討論，基於人類主體性與思考自由的解放，在當代社會中理論不再優位於實踐，但也應有意識地看待這樣的現象，避免以二元對立與互相消融的思維走向徹底的理性懷疑論，進一步導向理論與實踐的互為主體性結論。

*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系碩士班二年級。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world has been disturbed by the epidemic and the war. They just reflect that human beings now are be in an era with great advanc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globalization. To foster future-ready talents and respond to diverse needs, Taiwan passed “Three-type acts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in 2014. Among the various types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or called alternative education), the branch of public schools managed by the third sector (hereinafter named “PPPs schools”) in Taiwan is not only an application of public-private participations (PPPs) and school governance, but also the practice of social justice for rural education. Some schools in rural areas could prevent from closing through transforming into experimental education schools and establish a curriculum paradigm different from mainstream education.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PPPs schools and its spirit of manifesting educational justice are worthy of recognition.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gap between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PPPs schools in Taiwan. Then taking a PPPs school located in a fishing village in southern Taiwan as an example, to outline the school'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By interviewing the principal who is a bridg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oundation taking over the school to view the tensions of this kind of governance and some unconnected parts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Based on this school’s circumstances and the principal’s perspectives, the researcher tried to figure out the differences in implementation between mainstream and innovative education systems, and difference in enthusiasm between the formerly senior teachers and newly young teachers, and also changes in parents’ attitud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In discussion section, apart from checking out the intersubjectivity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the researcher also demonstrated how the stakeholders of the school created their subjectivity in such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the paper applied Jürgen Habermas's idea to reflect the posi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especially in the modern world, and further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y are intersubjective.

創傷與療癒： 再思跨族群互動之挑戰與整合

何浩慈

跨越種族、族群、文化之學術研究與政策制定，一直為充滿挑戰卻無法迴避的議題，但其本質上又必定遭遇因差異引發之矛盾、衝突。以臺灣原住民族及漢人群體為例，雙方百年來之相遇與相處定調了今日關係、甚至雙方未來發展。回到時光長河，殖民時期以來著眼文化差異、治理策略討論；隨著八零、九零年代原住民運動風起雲湧，逐漸關注社會正義、資源與權利不平等、社會排除、認同與文化流失、歧視、污名等議題；當代更深入反思的成果，則進一步提倡主體性與尊嚴、欣賞原本未受足夠尊重的文化、爭取部落主導之由下而上且具文化特色的發展範式、打破漢人專業權威、拿回話語權、積極傳承語言與文化、甚至重新定義「他者」。

此背景下，原住民知識近年於永續發展相關範疇備受矚目，具原住民身分學者及有志貢獻己力之漢人學者，不遺餘力與部落成員共同紀錄與發揚原住民知識體系；此外，全球無論原民或非原民社群主流論述也大體接受，相比居住於都市環境群體，原住民社群與周遭環境維持更親密、和諧關係，其環境倫理、生態知識、文化規範提供人類社會面臨環境危機時重要參照。兩者加乘下，現已累積豐碩成果。然而，雙方往往於跨越族群邊界互動後，受到影響甚至產生轉變，兩者都經歷創傷與療癒、挑戰與整合。

本研究採人類學民族誌研究方法，於臺灣東部原鄉長期田野調查，檢視磨合過程中情緒與主體性相關論述，關照雙方行動者精神、心理狀態，提供對於此過程更深入、立體之分析。

關鍵字：情緒、主體性、療癒、民族誌研究方法、臺灣原住民族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perspective on post-conflict borderland
development: the Monpas in Eastern Himalayas*

Iris Ruyi Lin*

The Monpas dwell on the borderland claimed by both China and India; before the post-colonial nation-state establishmen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agro-pastoralist group connected and maintained a sustainable lifeway by utilizing mobility, local knowledge, and cross-community collaborations. The 1962 Indo-China war changed mobility, land usage, and relations like memories and affect. Although the military combat only lasted for a few months, the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has continuously influenced the quality of life, demography, and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e mountain region ever since.

However, national security has a tricky dimension that challenges “whose national?” in an area like the Himalay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manent dwellers such as the Monpas, militaries and government staff are passengers; gods, spirits, ghosts and themselves are the residents that belong to the place. While the larger negati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are made by the “authorized passengers” and tourists from the outside such as water and noise pollution and the heavy pressure processing waste, the local community is also piling up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with the materialist modernization – a posthuman perspective is needed. Neither the “no man’s land” view nor the “state authority’s frontier” view leads to a solution through the democratic process, is it because we failed to position the non-human in the legal frame?

Adding to the local crisis is how the Himalayas as “the Asia water tank” could affect the uncertainty of hydrology on the lower land, which makes the reason and result of the local people’s experiences global. Climate change only arrives as the latest uncontrollable factor threatening the already fragile ec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Multiple scaled borderlines have been drawn on the fragile zone, whilst this paper analyses affect and practice rather than sovereignty and beliefs. Sett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Monpas and their Himalayas case on Matt McDonald’s concept of ecological security (2021), this paper reflects how the idea of security was constructed by stakeholders that view “the nation” differently, and what role do these entanglements play in environmental change lived by all agents in the system. My PhD dissertation offers more detailed and wholistic explanations for this construction, including the agrarian change of the

* 林汝羽, R.Lin@ids.ac.uk。

Himalayan lands, pathways of environmental emotions, and the media of experiencing crises. However, in this paper, I will only focus on how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gents sense and make sense of the security in the Eastern Himalayas (Western Arunachal Pradesh India), the dimension of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n of secur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valuing ecological security for post-conflict Asian borderlands. This approach aims to offer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about the post-conflict borderland development of Matzu and Kinmen, or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issue of mountain dwellers on the Taiwan island.

USR 課程成果節慶化策略的效益與挑戰 ～以中山大學《鹽夏不夜埕》與《街頭玩童》為例*

宋世祥**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中的課程常會透過舉辦成果展，藉此展示課程橋接社區與學生歷程，或是學生投入社區問題解決或是發展工作的結果。但缺乏延續性的活動往往對於社區關係的消費，也會造成課程本身人才訓練內容的不一致性，在這樣的挑戰下，「節慶化」成為 USR 課程成果的選項，但這樣做又有哪些優勢、影響與挑戰？筆者自 2018 年起每年舉辦的《鹽夏不夜埕》以及 2019 年起舉辦的《街頭玩童》兩項活動為例進行反思，並嘗試論述「節慶化」所帶來的優勢、影響與挑戰。筆者認為，節慶化的優勢為帶動大學與社區間發展穩定的合作關係、課程本身有清晰的實作場域、USR 課程資源也能成為助益學生成長學習所需要的課程創新。在影響上，則可以看到當「節慶化」成功運作，學校與社區之間的關係成為更為緊密的合作夥伴，大學生與教師也能夠在節慶的品牌效應下將容易走進社區的角落，或是進行更多事務的推進。然而，所有的挑戰也伴隨優勢與影想而生。首先，課程對於 USR 計畫資源的依賴降低了課程本身的自由度，許多 KPI 要求迫使教師必須在課程設計上必須以「完成任務」為規劃原則，而不是以「完成學習」為規劃的主軸。當未來 USR 計畫不再補助課程，如何回應社區期待、如何獲取源維持，則成為重要的挑戰。

關鍵字：節慶化、USR 課程、創意街區、創意城市

* 本文為會議論文初稿，尚有諸多不成熟之處，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建構地方學習型社群組織的行動模式初探： 以暨大的兩項行動個案為例*

張力亞**、許祐蓁***、林芳慈****

建構學習型社會，是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地方創生持續發展的關鍵基礎。臺灣近年受到高齡化與少子女化的影響，且因長期政策資源配置不均的問題，導致許多鄉村區域的人口逐步流失、基礎公共設施的服務相對不足，影響整體基層社會的發展動能。行政院將 2019 年訂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企盼透過不同政策資源的整合與相關利害關係人的協力合作，為地方帶來創新發展。但實務觀察經驗顯示，當政策計畫資源不再供給時，許多創新作為通常也會隨之消逝。為避免此問題的產生，如何在地方建構起地方社群組織學習的機制，提供地方創新行動者知識學習、溝通對話、方案討論的空間，發展出具行動力的網絡社群，是地方發展韌性力極為重要的工作項目。

本文將以暨大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推動的南投縣學習型城市計畫、地域振興與地方創生研習學苑方案作為個案，探究在地方治理的過程中大學可扮演的角色。其次，分析大學在地方治理的整體環境系絡中，可透過哪些行動方案的設計與策略方法的運用，協助地方不同類型組織進行組織學習。再者，從事務推動的經驗中省思，學習型社群建構的反思效益。企盼透過本文的書寫，為臺灣當前的地方治理走向，提出另一項討論的題材。

關鍵字：地方發展、地方治理、學習型城市、社群組織、暨南大學

* 本文初稿將發表於國立東華大學人文與社會學科臺灣文化學系「第 14 屆發展研究年會」（2022.11.18-20）。相關研究成果摘錄於南投縣學習型城市計畫（2020-2022）、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善盡社會責任：地域振興與地方創生研習學苑方案」兩項計畫。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E-Mail：
purdue3011@mail.ncnu.edu.tw。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專任助理。E-Mail：
yuchenhsu@mail.ncnu.edu.tw。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地方創生與跨域治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生、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專任助理。E-Mail：fangtszlin@mail.ncnu.edu.tw。

教育部 USR 計畫之大學定位與社區連結之關係： 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USR 為例

陳仲沂*

「大學社會責任」在歐美地區是基本的認知與價值理念。然而在臺灣地區，高等教育通常被分類為研究型大學與教學型大學，對於社會責任與社區連結，關注甚少。

為順應國際潮流，教育部於 2018 年推動第一期「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計畫，主要宗旨為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透過人文關懷與協助解決區域問題，來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本文旨趣於在「教育部 USR 計畫」尚未執行前，大學定位與社區連結之關係，以及在「教育部 USR 計畫」執行過程中，大學定位與社區連結產生變化，最後試圖說明當「教育部 USR 計畫」結束後，大學與社區的發展將呈現何種趨勢發展。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暨大)位於南投縣埔里鎮，校內擁有教育學院、人文學院、管理學院以及科技學院。過去因 921 地震與埔里鎮產生嚴重疏離。因此復校後，積極與埔里鎮各社區進行重建工程，以及相關社區營造，透過學校充沛的學術資源與專業知識背景，來重整受地震摧殘的社區。此為第一階段，學校與社區連結的過程。

2018 年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此計畫至目前已進行兩期，暨大總計獲得 4 項計畫的支持，涵蓋領域包括長照議題、偏鄉教育議題、地方產業創生、永續環境推動與人才培育。行動場域包括埔里、魚池、仁愛、信義，亦外溢到台中、彰化等地區。此為第二階段，除了持續深化原有社區之關係外，同時也擴散至其他場域。

筆者身為計畫執行者，除了觀察暨大從過去到現在的脈絡發展，同時亦在思考大學定位與社區連結，是否能在教育部「大學責任計畫」退場後，仍持續保持連結關係，甚至可以進一步優化與深化，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關鍵詞：大學社會責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科技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 basic cognition and value concept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i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is usually classified as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eaching universities, and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

In lin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unched the first phase of the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program in 2018, the main purpose of which is local connec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People-oriented, starting from local needs, and fulfill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university through humanistic care and assistance in solving regional problem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y positioning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R Program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changes in university positioning and community connection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SR Program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at trends will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and communities show after the end of the USR Program?

National Jin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Jinan University) is located in Puli Town, Nantou County. The school has Education College, Humanities College, Management Colleg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In the past, due to the 921 earthquake, it was severely alienated from Puli Town. Therefore, after the resumption of the school, we will actively carry out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with various communities in Puli Town, as well as related community building. Through the school's abundant academic resources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ackground, we will rebuild the earthquake-devastated community. This is the first stage, the process of connecting the school with the community.

As a plan executor, the author not only obser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but also consider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y's positioning and the community, whether it can continue to maintain the connection after the "University Responsibility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withdrawn, and even It can be further optimized and deepened,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Keywords: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論地方文化館政策發展二十年及政策轉型與展望

林玟妤*

「地方文化館」一詞，首見於 2002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提出的「地方文化館計畫」之中，概指國內公、私立中小型博物館、展演機構、閒置空間再利用及古蹟建築等，以推廣在地特色文化、地方展演性質之文化機構。地方文化館政策自 2002 年推行至今，從文建會所提出，轉由文化部推廣，共經歷三期的政策轉變，每期依當時社會情境脈絡及地方文化館在地的發展，而於政策上有所調整。

本研究擬以地方文化館政策為主要研究對象，針對地方文化館的政策發展、相關補助要點、督考機制及國內地方文化館統計資料進行分析，比較國內地方文化館政策三期推行方向的轉變及地方文化館的型態改變與未來趨勢。

本研究發現，地方文化館政策發展至今近二十年，第一期為 2002 年至 2007 年，主推廣政策從社區營造為理念為出發點，強調社區具備在地特色文化與知識脈絡，並以「一鄉鎮一館」的概念，盤點地方文化資產及閒置設施，以活化設施為目標進行推動，因此地方文化館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國內共有 258 座地方文化館。第二期政策從 2008 年至 2015 年，改以「文化生活圈」為推廣目標，強化地方文化館的機能及在地方的重要性，因此全台共有 399 座地方文化館共同參與，此時期政策主要為加強地方文化館的硬體設施及效能。第三期政策從 2016 年至 2021 年，改以「既有設施再利用」及「軟體規劃先行」為主推行方向，國內地方文化館逐漸收斂為 300 座，並改以推廣地方文化館營運、專業功能強化及品質提升為主推行方向。近兩年隨著受到疫情影響及網路科技興起，地方文化館逐漸鼓勵發展線上及科技等方面的推廣，並擬定新政策進行地方文化館的型態再轉變。

關鍵詞：地方文化館、地方文化館政策、文化政策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博士班三年級，wenyulin82@gmail.com。

臺灣文化消費階層化之研究： 以參觀博物館為例

王佳煌*、詹傑勝**

本文依據文化部 2020 年文化統計電話調查蒐集之資料，以邏輯迴歸模型分析臺灣民眾到訪博物館與社會人口特徵（性別、年齡、居住地區）、社會經濟條件（教育程度、職業、平均月收入），以及與其他文化消費行為之間的相關性。我們的第一個邏輯迴歸模型顯示，男性參觀博物館的可能性不顯著；教育程度愈高者，參觀博物館的可能性愈顯著；收入與參觀博物館之間的相關性略高；文化消費的金額愈高，參觀博物館的可能性愈顯著；但參加線上文化活動，會減少參觀博物館的可能性。教育程度、文化消費金額與參觀博物館之間的關聯性在統計上有顯著的意義。第二個模型顯示，教師、學生、製造業者，參觀博物館的勝算比較為顯著，其他可能具有較多文化資本的職業，參觀博物館的勝算比卻不顯著，如公務員、專業人員、科學技術服務業等。在大眾傳播媒體使用方面，觀看電影、閱讀雜誌、閱讀書籍的人，參觀博物館的可能性，比不看電影、不讀雜誌、不讀書籍的人高出 31.74%。在文化展演活動方面，欣賞現場古典與傳統音樂、現場現代戲劇、現場傳統戲曲、視覺藝術展覽的人，參觀博物館的可能性，比那些不欣賞這些現場文化展演的人高出 1.46 倍。總之，臺灣民眾參觀博物館的行為模式，與較高的教育程度、較高收入、較多的文化消費金額、大眾傳播媒體高使用率、其他現場文化消費活動參與率之間的相關性較高。本文最後依據這些研究發現，與歐美文化消費的理論觀點（同源論、雜食-純食論、個人化論題）及主要研究發現對話。

關鍵字：文化消費、博物館、社會階層化、同源論、雜食-純食、個人化

We conduc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2020 Cultural Statistics survey data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with the purpose of exploring the museum visiting behavior of Taiwanese. Our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indicate that the visiting behavior of males is statistically insignificant. In contrast, the models reveal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behavior of visiting museum, on the one hand, and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higher income, more expenditure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high rate of consuming mass communication, and attendance at live cultural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The findings show asymmetrical cultural consumption based on economic and cultural capitals in visiting museum despite some research limitations. Following the findings, we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regarding the theses of homology, omnivore-univore, and individualization.

Keyword: cultural consumption, museum, social stratification, homology,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BTC、NFT、DeFi 指數、VIX 指數與黃金指數之關聯性研究

王昱翔、紀宗利

本研究以 DeFi 指數、BTC 指數、黃金現貨指數、NFT 指數、VIX 恐慌指數為研究對象，樣本期間為 2021 年 3 月 8 日起到 2022 年 5 月 13 日，將資料進行 ADF 與 PP 單根檢定、向量自我迴歸模型、因果關係檢定、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迴歸分析等進行實證分析。

實證結果發現五個變數皆受自我變數影響。DeFi 指數、黃金現貨指數、NFT 指數、VIX 恐慌指數等顯著受前一期 BTC 指數影響，前一期 DeFi 指數、BTC 指數、黃金現貨指數、NFT 指數等指數顯著影響 VIX 指數。由 Granger 配對因果關係檢定發現，看出 NFT 指數對 DeFi 指數呈現單向因果關係；DeFi 指數對 BTC 指數則呈現雙向因果關係。再透過預測誤差變異數分解了解變數是受自身、其他變數之影響程度與解釋能力，實證結果發現，五個變數均受自身影響最大，黃金現貨指數、NFT 指數在第 1 期之後均受到 DeFi 指數影響；DeFi 指數、NFT 指數、VIX 在第 1 期之後均受到 BTC 指數影響，最後，透過迴歸分析發現，VIX 指數、黃金現貨指數對 BTC 指數有顯著負向影響；DeFi 指數、NFT 指數對 BTC 指數指數有顯著正向影響。

關鍵字：BTC 指數、NFT 指數、DeFi 指數指數、VIX 指數、黃金現貨指數

以多層次觀點探討自行車通勤政策轉型過程 利害關係人參與情形-以高雄市為例

吳冠頡*、鄭祖睿**

臺灣的街道設計過去都以汽機車等私有運具為主要規劃對象，不過近年來「人本交通」與永續發展概念已被國際社會所重視，而臺灣也無置身事外，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皆大力推動自行車發展。然而臺灣的自行車使用特性目前仍以休閒旅遊為主，因此自行車通勤議題較不受大眾所重視，對此本研究將針對我國近年自行車政策進行文本資料蒐集，並以高雄地區作為自行車通勤環境研究對象，從多層次觀點探討我國自行車通勤環境之實際情形與未來發展方向。此外對自行車通勤政策之利害關係人進行訪談資料蒐集瞭解實際發展與政府施政方向是否存在落差外，從公民參與之角度釐清現有的自行車發展情形與阻礙，也從中確立政府部門對自行車議題的態度，最後統整出我國都會地區在自行車政策規劃中對於通勤議題現有的困境與挑戰。

關鍵字：自行車通勤、利害關係人、多層次觀點、深度訪談、公民參與

The concept of human-centered transport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recently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Taiwan's longstanding motor vehicle centric transport planning dominates urban mobility whereas cycling in Taiwan is still mainly regarded as a leisure activity. Bicycle commuting, therefore, has not gained as much attention as motor vehicles have.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recent bicycle policies at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with Kaohsiung city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ng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subsequent grounded theory wer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icycle policies in Kaohsiung.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multi-leve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the public sector has faced between the niche market and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in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policy.

Keywords: bicycle commuting, stakeholder engagement, Multi-Level Perspective, in-depth interview, public engagement

*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 國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助理教授。

第三場

- A. 政大國發所 X 國合會「政府開發援助」02
- B. 原民性的多重視野與想像花東經驗 02
- C. 做花東：地方發展與韌性
- D. 地方與韌性 02

民國初期的環境治理

羅頌民*、林義鈞**

本文的研究問題:民國初期南京政府的環境治理議程內容如何?在此問題意識下,本文採用生態國家理論作為分析途徑,解構中國在南京政府時期的環境治理內容,初步形成以下論點與發現:「實業計畫」具體列出發展與環境治理互相呼應的政策方向,包含了資源管理和汙染管控,它們也同時呈現出民國初期的環境治理議程與生態國家內容。本文的預期貢獻希望能使中國環境治理議程的歷史論述更加完整,並且建構中國經驗在發展學的影響。

關鍵字: 實業計畫、發展學、中國環境治理、生態國家、資源管理、水利社會

The research question of this paper arises: What was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genda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in the early-20th century? For answering the above, this paper uses the Eco-State theory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studies as the analysis approach to deconstruct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genda under the Nanjing government.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further completion of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genda in Development Studie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Development Studies,
Chinese Environment Governance, Eco-State, Resource Management,
Hydraulic Society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110261001@nccu.edu.tw。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scottlin@nccu.edu.tw。

***Reflecting on Hans Morgenthau's Thoughts on Aid Effectiveness in his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60 Years Later***

Asma Amina Belem*

In his 1962 publication titled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Hans Morgenthau expressed skepticism about the ability of foreign aid to fost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e believed capital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might not suffice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He diagnosed four root causes of under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amely natural resource poverty, cultural backwardness, deficiency in intellect and character, and lastly lack of political will, which he proposed could be resolved by imposing conditionalities on aid.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validity of these claims and revisits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 in light of recent literature. It shows that Hans Morgenthau's arguments are problematic in many respects. These problems are: a perception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which is inherently racist; a weak argument in support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preconditions for development; and a case in favour of conditionalities, which have now been implemented for decades yet produced mixed results. Nevertheless, skepticism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 still prevails in current literature but is no longer based on unfounded claims.

**Key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eign aid effectiveness,
resource-based development, culture, racism, conditionalities**

*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mail: asamina91@yahoo.fr

Cel: +886925059615

No.64,Sec.2,ZhiNan Rd.,Wenshan District,Taipei City 11605,Taiwan (R.O.C)

Hans Morgenthau 在 1960 年代早期的著作《外援的政治理論》(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中，對外援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能力表示懷疑。他認為資本和知識積累可能不足以促進經濟發展。他列出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四個根源，即自然資源貧乏、文化落後、智力和品格不足，最後是缺乏政治意願，他提出可以通過對援助附加條件來解決。本文重新審視了這些主張的有效性，並根據最近的文獻重新審視了外援的有效性。

在 Morgenthau 的文章發表 60 年後，他關於援助有效性的觀察中指出的一些情況仍然存在，他對資本和知識這兩種因素不足以解決經濟發展不足的質疑，也仍然也正確。近年的經濟學文獻指出，多種因素有助於經濟增長。然而，在許多方面，Morgenthau 提出的證據基礎薄弱。

他聲稱一些國家永遠無法發展，因為他們的人民不聰明，這屬於智力種族主義：假設智力是遺傳且不變的，意味著種族決定了國家的發展水準。此外，他將資源豐富作為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的說法，已被證明是不正確的。過去豐富的自然資源在一些地區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今天資源豐富的國家似乎經濟表現不佳，並且有資源貧乏的國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功。此外，他認為有些國家的發展進程受到其文化的阻礙。但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係是雙向的，經濟結果是文化與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所產生，文化不能以單一尺度進行排名。有些文化實踐按照 Morgenthau 的標準看起來是「前理性的」，卻可能會促進社會其他方面的進步。

關於援助的附帶條件，Morgenthau 認為只有外援接受者才應受到約束。一些捐助者可能會施加條件來強化自己的戰略利益，並在此過程中損害受援國的發展前景，有時捐助者實施的改革甚至可能適得其反。更重要的是，我們不知道外援的有效性是否取決於受援國的政治體制類型、制度或政治環境，相關文獻尚無定論。

總結而言，目前的文獻仍然普遍存在對外國援助有效性的懷疑，但不再基於缺乏根據的主張，而是基於循證研究。

中非合作論壇的演變

劉曉鵬

2000 年開始的中非合作論壇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迄今已舉辦八屆，每次舉辦都受到國際矚目，惟論者對其分析多以政策評論為主，本文試圖提出歷史觀點。

作者首先回顧論壇的緣起，認為是中國不願再受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影響，改變對「黑人兄弟」投入大量無償援助的政策，進而在 1980 年代後力圖減少金援，對外合作以促進本身經濟發展為原則，而在本世紀初形成制度化的結果。

其次回顧論壇開始後的前十五年間，江澤民與胡錦濤主導謹慎使用援助、減債、投資、貸款等工具，藉定期聚會形成大規模平台，為中非雙方開拓更多商機，穩健發展中非經貿關係。習近平上台後，出現與前任完全不同的對非洲政策。投入非洲的資金，包括贈予在內，幾乎各方面都倍數成長。

惟展現中國雄心的同時，上世紀類似的問題同時出現。上世紀是非洲習慣於獲得無償援助，當今則是非洲習慣於獲得中國投資，差別是後者累積大量債務，而對非洲國家逼債，等於是步殖民主義後塵，形成更多政治問題。

中非合作論壇中方提供的資金，在習近平之前都是上升的，也在習近平時期出現迅速下滑。下滑的背後，中國上世紀末調整對非援助的歷史隱約再現，意識形態造成的龐大開支與債務及其衍生問題，使官方實質降低支持，尋找新合作模式，或將成趨勢。

關鍵字：中非合作論壇、中國對外援助、中非關係、債務陷阱

文化資產、認同政治與自然資源： 太魯閣地區原住民生態旅遊的變遷

陳毅峰*

本研究從族裔生態觀光探索在地族人對文化資產的詮釋變遷。觀光研究的文化轉向取徑帶來許多重要的反思，但所付出的代價是在面對觀光產業的全球性新自由主義化時，未有足夠的政治經濟學取向以分析結構性的權力與資本關係，未能延伸探求造成與深化差異背後所隱含的政治經濟過程。本文首先以理論性的概括回顧當前觀光研究文獻所強調的文化與社會面向的探索，進而以在原住民文化資產與認同政治的推廣及行銷中所隱含的「差異」作為核心，延續 Comaroff 夫婦在《族群性公司》對差異的討論，探討差異的文化與認同如何生產與促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本研究聚焦太魯閣族大同與大禮部落，探討文化資產化過程與傳統概念的轉變，及從更大政經脈絡尋求改變的社會根源。如 James Clifford 所言，復興傳統牽涉講究實際的選擇和對「根」的批判性重編織，將傳統視為一種歷史實踐，回歸傳統就不是單純的返回過去或是重覆操演發生過的事，而是轉化的源頭。原住民文化藉由目前當興的生態旅遊，以無形文化資產的態勢，在許多地方成功塑造出在地特色。傳統文化資產不僅帶著族人回望過去，更展現與未來的交織建構。本研究討論以無形文化資產的原住民知識做為另類發展與認同建構的路徑。

關鍵字：族裔觀光、原住民知識、文化資產化、另類發展

*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從疫情中的 Podcast 聲媒教學談分散式原民在地發聲： CDIO 觀點

林俊偉

本研究以疫情中原住民族學院的 Podcast 聲媒教學經驗為例，從 CDIO 觀點探討分散式原住民族在地發聲架構。

本文關注的 CDIO 觀點，源於工學院教學設計，以發想（Conceive）、設計（Design）、落實（Implement）和運作（Operate）四支點搭出教學架構，在產品創意發想到實際成品上架的產製周期中，讓學生透過主動實踐，培養專業知能，並達成理論與實務的整合。本研究將此架構應用於疫情中的聲音媒體教學情境，藉此探討聲音媒體跨越時空的能動性，在當下與未來的條件中，透過分散式原民在地發聲，實踐原民性在當代社會復返與前進的可能路徑。

關鍵字：原住民、Podcast、CDIO、聲音媒體教學

從「部落照顧」到「部落發展」的距離： 部落文化健康站的觀察與反思

黃盈豪

「部落照顧」多被放置在一個「社會福利」、「申請補助」或是「依賴和補貼」的位置，而鮮少有人更積極的從「發展性社會工作」、「照顧創生」、或是「部落整體照顧與發展」的角度來探討。原住民族長者面臨偏鄉醫療資源不足和福利殖民的過程，部落人口高齡化和長者生理衰弱過程急待部落照顧資源佈建，原住民族委員會在全台共佈建有 433 家文健站，過去這幾年來文健站預算成長 10 倍而站數和受服務部落長者數量成長了三倍（行政院網站資料），部落文化健康站可說是近年來影響部落社會最巨大的原鄉社會福利政策。在文健站快速佈建的過程，各部落文健站也面臨如何翻轉由上而下一體適用的外來服務模式，因地制宜地找出有主體性和在地脈絡文化照顧模式的挑戰。東華大學承接原民會文健站宜花東專管中心計畫，目前服務涵蓋共計 218 個文健站（宜蘭 16 站、花蓮和台東各 101 站），佔全國文健站約一半的範圍。本文試圖從專管中心的視角，依據訪視經驗作為分析資料，觀察文健站除了主流長照相關服務的推動，如何面對部落發展和社區整體照顧服務的議題，是否有發展出另類的服務模式及其他在地經驗，聚焦在「部落發展」的概念，發掘文健站除了照顧服務進行社區組織與發展及組織培力的在地經驗。一反過往只看「需求」和「弱勢人口」的社會工作取向，本文將從 218 個部落文健站的基礎資料分析承作組織、人口組成和族群特性的影響，並從專管中心輔導員的實際接觸經驗，探討部落從「照顧服務提供」走向「部落發展」的可能性。

關鍵字：部落文健站、發展性社會工作、地方創生、原鄉長照、原住民族社工

GAYA 才是法律的原點： 亞洲水泥公司新城山礦場租用原住民族土地真相調查過程中的發現

張鑫隆*

行政院在 2022 年 2 月 9 日核定公告亞洲水泥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真相調查報告，亞泥是否違法受到大眾的矚目，但是太魯閣族的祖訓 GAYA 亦被列為調查的對象，對於最後真相調查結果具有重大的影響。儘管調查報告結論稱「尚無發現證據顯示有不法情事」，但亦同時建議「儘速回復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以利族人依循傳統慣習利用土地」。此建議是根據太魯閣族 GAYA 的傳統慣習而來，儘管統治者更替，實施各種不同的土地管理制度，但是族人一直遵循著 GAYA 的規範管理其土地。日本人類學家在舊慣調查中發現泛泰雅族人開墾取得之耕地存在不得納入個人私產之慣習。日本法律人類學家岡松參太郎將這種 GAYA 的規範轉譯為「永耕權」的法律概念，意指在休耕期間，即使基於部落族人間互信和互助關係的土地借用，也不影響其耕作權之存續。從 GAYA 這樣的規範可以理解太魯閣族人將其祖先開墾、耕作之土地視為是世代傳承的「家產」，而非個人財產，不能有買賣，更不能有拋棄的意思。亞泥真相調查時，簽署拋棄書的族人大多數都已過世，那些拋棄書意思表示是否為真難以認定，但是族人的土地權利並不會因此消失。調查報告回復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的建議，雖然不代表族人馬上可以取回土地，但雙方直接成立租借關係是 GAYA 所允許的，只要亞泥礦場開發未危及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存續（原基法第 21 條），這是部落所有族人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不應由個人承受。此一事件也同時凸顯出目前原住民保留地制度和 GAYA 的緊張關係，現行原保地制度是基於「保障原住民生計」所創設，在市場經濟的引誘下，多數族人選擇原保地的所有權，土地交易造成部落土地流失的訊息時有所聞，導致 GAYA 的存續危機，是本文最大的課題。基此，本文透過文獻分析，試圖從 GAYA 是法的原點之概念出發，論證傳統慣習和現代法律的共存是多元主義思潮的必然，並藉由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政府應尊重原住民族選擇「土地擁有利用與管理模式之權利」，導出國家應承認原住民可選擇維持自己傳統之土地管理模式（如同太魯閣族 GAYA）之權利。

關鍵字：自然法 natural law；習慣法 customary law；原住民族基本法（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集體文化權 Collective Cultural Rights；原住民保留地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傳統占有 traditional Possession；GAYA（祖訓）；永耕權 A permanent farming right；文化多樣性 Cultural Diversity；一般意志 General will

* 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The Executive Yuan announced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land dispute between Truku and Asia Cement Corporation in Shin-Chen San Quarry on February 9, 2022. Whether or not Asia Cement Corporation is illegal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GAYA, the ancestor's instructions of the Truku, which was also listed as the object of the investig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inal result. Although the report concluded that "no evidence has been found", it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ownership of the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should be restored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the local people can use the land according to their traditional customs." This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of the GAYA. Although the rulers have changed and various land management syste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he tribes have always followed the GAYA norms to manage their land. Japanese legal anthropologists found i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customs that reclaiming and acquiring cultivated land is not allowed as personal property even during the fallow period. Japanese legal anthropologist Santaro Okamatsu translated the GAYA norm into the legal concept as "Permanent Tillage Rights", which means that during the fallow period, even if the land is borrowed based on mutual trust and mutual assistance among tribal people, their farming rights will not be affected. According to the norms of GAYA, it can be understood that the Truku people regard the land reclaimed by their ancestors as "family property" rather than personal property, which cannot be bought, sold or abandon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most of the clansmen who signed the renunciation had passed away.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 intentions of renunciations were true or not. But, their land rights shall not be negated because of this. Although the suggestion does not mean that the tribes can take back the land immediately, the direct establishment of a lea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s allowed by GAYA, as long 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 Cement Corporation does not endanger the survival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aboriginal people (Article 21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this is a problem that all members of the tribe must face together instead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most clansmen choose the ownership of the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The incident also highlight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ystems between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and GAYA. This article is most concerned with the existential crisis of GAYA due to trade of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ceed from the concept of GAYA as the origin of law, to prove that the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al customary law and statutory law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pluralism. In addition, through Article 23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it is stipula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spect the origin of the law.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spect the indigenous people's choice of "the right to use and manage the land systems", and to acknowledge the aboriginal people's right to choose and maintain their own traditional land management model (like the GAYA).

Keywords: Indigenous Peoples Basic Law; Indigenous Reserved Land; The traditional territorie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raditional Possession; The GAYA Culture in Truku; Regulations on Land or Tribal Land Allocation for Indigenous.

數位時代下的地方志撰修與大學社會實踐- 吉安鄉案例研究

郭俊麟*

地方志是地方歷史與地理的綜合體，包含一地的地理環境、自然資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人物等歷史與現狀的綜合性和資料性的論述。過去數十年來，臺灣在民主化與社區營造的推動過程中，也掀起了一波村史、鄉鎮志編纂的風潮。然而，由於地方志編纂耗時、資料更新不易，傳統的彙編方式不利於線上檢索與推廣運用。面臨搜尋引擎、地方維基百科等數位平台挑戰的同時，如何讓地方志撰修有新的機會與可能，是主管機關與地方文化單位需要共同思考的課題。

近年來「社會創新」的概念從國外引入，鼓勵並推動大學與社會連結，大學師生走入在地社區，讓學術生產與在地問題的解決有更多的連結與可能性。社會創新強調把「實踐」納入「理論」，並呼應社會需求的「在地性」，讓大學的知識生產與地方社會結合，提供臺灣學術發展一個新的路徑與實踐方式。而「教學」就是大學最核心的實踐，透過跨科際且實踐型的駐地課程，將有助於大學的社會創新，並與地方共同找出解決的方案。

本研究以 2022 年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將啟動的鄉志修纂為探討個案，闡述研究團隊如何透過一系列的課程設計及暑期的駐地課程，導入大學的專業知識與人力資源，建立地方志的編修團隊。從當前「地方創生」的需求出發，透過文化部門的各類數位資料庫，嘗試用嚴謹而有脈絡的傳統編修工法，結合數位化與線上故事地圖的介面，提供地方志應用推廣的簡明版地方志的故事地圖網頁。從吉安鄉的案例，探討數位時代下的地方志撰修與大學社會實踐的具體方案。

關鍵字：地方志、地方創生、社會實踐、吉安鄉、故事地圖

*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主任，
jinlin@gms.ndhu.edu.tw。

**通貨膨脹物價不上漲：
臺灣戰後幣制改革的前因後果（1945-1960）**

林子新

本文旨在探討臺灣戰後幣制改革的前因後果。研究發現，中華民國政府（下稱國府）於1949年6月15日實施臺幣改革（發行新臺幣）之目的，固然在於解決臺灣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不過，其藉以解決通膨問題的手段，並非是在國內市場上大幅減少新臺幣之發行與流通數額，而是在國際市場上大幅高估新臺幣之對外價格。結果，臺幣改革過後，儘管新臺幣通貨淨額依舊快速增加，但台灣躉售物價卻旋即不再隨著通貨淨額之增加而快速上漲。由此可見，創造並維持一個通貨膨脹但物價不上漲的獨特金融環境，才是國府實施臺幣改革的真正目的，也才是造成1950年代台灣外匯嚴重短缺的主要原因。由此亦可見得，國府並非為了推動進口替代型工業(import-substitute industry)之發展，而於1950年代長期高估新台幣匯價，而是相反，是為了維持新台幣匯價之高估政策，才優先選擇發展最有助於節省外匯支出的進口替代型工業。

屋頂光電與地方文化的裝配： 以淡水忠寮社區公民電廠發展為例

吳蘇庭、邱啟新

近年應和國際間永續發展的目標，國內也提出「淨零轉型」的轉型目標與治理，包含行之有年的能源轉型，以及新指認出的社會轉型與生活轉型，其中能源轉型的治理策略，在滾動式修正中轉向跨部門、跨層級合作，並且賦權公民、鼓勵全民參與發電，「公民電廠」一詞也在能源轉型的脈絡下興起。然而，光電的探討仍多側重於網絡的形塑，對於光電如何與地方互動的關注仍舊闕如，尤其公民電廠的概念如何揉合、鑲嵌而落實在有特定地理範圍的地方，更需實際考察公民電廠的裝配過程受到哪些社會條件的影響與支持。本文以「新北市智慧綠能社區合作社」作為主要探討對象，並且以合作社推動公民電廠的重要場域-淡水忠寮社區為例，忠寮社區作為淡水百年農村，其光電發展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本文認為與地方脈絡、地方認同鑲嵌在一起，需看到合作社如何轉譯公民電廠進而落實地方，同時也不可忽視屋頂型光電公民電廠裝配中的物質政治與資本流動如何影響社區動態；若轉以城鄉尺度來看，「公民電廠」也成為忠寮社區穩定地方的契機。透過訪談與參與式觀察法，研究試圖探討公民電廠如何接應地方創生行動，並且指認出社區支持公民電廠發展的社會條件包含自然文化鑲嵌的社會生活，以及合作社在知識與實作上的能力如何接應公民電廠落實，進而指出由下而上形塑的綠能城市想像，藉以回應當今的淨零轉型路徑，期許為屋頂型光電公民電廠的發展開啟不同視角的關注。

In recent years, in line with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ly, Taiwan government has also proposed the goals and governance of "net-zero transition", includ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 as well as social transition and life transition which are proposed this year. The governance strategy of energy transition has shifted to cross-sectoral and cross-level cooperation in rolling revisions, empowering and encouraging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power generation. . The term "citizen power plant" has also emerged in the context of energy transition.

However, the discussion of solar energy still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of network, but little attention is paid to how community solar interacts with places, especially how the concept of citizen power plants is integrated, embedded and implemented in places with a specific geographical scope. Actually, 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could affect and support the process of assemblage of citizen power plants.

This research regards "新北市智慧綠能社區合作社 (SGECcoop)" as the main field reporter, and focus on 淡水忠寮社區, which i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SGECcoop to promote citizen power plants. As far as the research is concerned, it is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 power plants is embedded in the local context, and based on local identity as well, so that the CS could be promoted in 忠寮 community. It is necessary to see how cooperatives translate citizen power plants into implementation in place,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cannot ignore how the material politics and capital flows in the assembly of CS affect community dynamic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itizen Power Plant" has also become an opportunity to stabilize community itself.

Throug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the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citizen power plants respond to local creative initiatives, and identifies the social conditions for developing citizen power plan, which including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embedded social life, and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bility to help implement citizen power plants. In addi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imagination of green energy cities shaped from the bottom up may respond to the current path of net-zero transformation, hoping to open up different perspectiv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 power plants.

從水利襲產保存到社區動態維護： 屏東檳榔聚落的個案研究

賴子儀

本文探討鑲嵌在不同時期社區政策與地方政治社會網絡中的襲產化行動，為何不僅未能有效塑造社區公共性，引導公共事務運作模式與改造生活環境之目的，甚至速裂解地方社會。首先，作者回顧社區營造與聚落保存相關研究，凸顯缺乏社區關係與環境的維護面向，在社區或襲產化行動達成特定目標之後，經常難以為繼，淪為官方接管或持續毀損的窘境。順此，作者引入基礎設施與維護研究，解析由襲產化建立社區公共性背後所需的社會-物質關係，強調建立維護基礎設施的必要。接著，作者探討 1965 年以降的社區發展、1994 年之後的社區營造，以迄 2000 年後的聚落保存政策內涵，說明不同時期的政策邏輯如何框架了地方居民的想像及參與社區公共事務的方式。為了深化討論，作者以極具特色的屏東檳榔社區(化名)為例，探討不同政策介入下的聚落保存與再發展的困局。檳榔社區在 2008 年登錄為法定聚落，在官方資源挹注下陸續推動多項聚落保存計畫。地方組織以水圳、水門及護岸維護等環繞水利基礎設施的生態保育取徑，嘗試掌握湧泉濕地的聚落特色，強調友善生態環境的人工清淤、水草復育及護岸工法，卻引發防洪、疏濬及觀光等不同立場的地方衝突。本文將指出聚焦於水利設施的襲產化實踐，一方面彌補主流聚落保存模式的不足，將自然納入襲產範疇中，試圖重建從稻米到檳榔的社區變遷中，遺落的生態地景與人水關係。但在地進步團體以理念價值為要的社區行動，無法接合既有社區運作模式與資源，不僅曲高和寡，難以建立社區參與共識，更無法突破地方選舉與派系等政治框架，形塑兼具進步性與穩定性的地方公共事務運作模式。最後，作者主張在維護中持續產生新意義的動態維護觀點，突破過往著重改變卻難以延續，及僅單調重複維持現狀的靜態維護，使襲產化行動轉為建立社區的維護基礎設施，作為撐持及轉化社區生活與環境的動力與機制。

關鍵詞：維護、襲產化、基礎設施、社區營造、生態保育

環境敘事與區域文化變遷初探— 以雲林口湖為例

謝玉玲*、李明安**、蘇琬雅***

臺灣西部海岸帶（桃園至台南）約 460 公里，其中雲林海岸線長約 55 公里，近海漁業盛行，是文蛤、牡蠣的重要養殖區，更是國家發展綠能項目規劃中的重要風場之一。然一般人多認為雲林的海岸過於蠻澀，土地過於荒瘠，尤其透過文學書寫的表達，令人感受特別深刻，也見證雲林是長時間被忽視、漠視的區域。

對海岸帶空間進行人文探索，是全球化結構中的焦點之一，且透過後殖民理論、空間理論與生態主義交織，結合一地的歷史脈絡與發展，對海岸帶認識的典範性建構或轉移，必對一地的文化空間詮釋產生更多的可能性。在臺灣西部海岸漁村社會變遷的主軸上，本論文初步對口湖一地的人文風景與地方認同進行探討，尤其關注文化變遷之現象、內涵與影響進行詮釋闡發，進行具有開放、啟發與共振作用的辯證，期能為雲林海岸帶之區域人文社會研究有所裨益。

關鍵詞：環境永續、雲林口湖、海岸帶書寫、漁村跨域敘事

The western coast of Taiwan (Taoyuan to Tainan) is about 460 kilometers, of which the Yunlin coastline is about 55 kilometers long. Therefore, fishery in the coastal area of Yunlin is prevalent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breeding area for clams and oysters. It is also one of an important wind power field in the national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 plan. Yunlin is not adjacent to any municipality. However, most people believes that the coast of Yunlin is too rough, and the land is too barren, The description of Yunlin is particularly profoun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cultural research, but it also proves that Yunlin is a field that has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Humanistic exploration of coastal space, combined with post-colonial theory, space theory, and ecological analysis,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development of a place, will surely creat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astal cultural space. This plan is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the western coast of Taiwan.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discusses the humanistic landscape and local identity of Kou Lake paying,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henomenon,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e of cultural change to interpret and interpret, conduct a dialectic that is open, enlightening and resonant. It is expected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region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research in the Yunlin coastal zon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Yunlin Kouhu Township, Coastal writing, Regional regulation, Fishing village cross-domain narrative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語文教育組教授兼中心主任。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特聘教授兼副校長。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碩士。

國家的數位轉型： 丹麥的數位化發展歷程

黃仁志*

資通訊科技的快速發展，已分蘖出許多新的數位科技，諸如大數據、人工智慧、物聯網、雲端運算、5G 等，並結合各種社會經濟活動的運作而加速整體社會的數位轉型。新冠疫情之後，數位科技應用不僅成為全球日常生活的新常態（new normal），更使數位科技創新發展加速成為邁向未來社會的核心競爭場域。國家如何善用這些新興科技，使數位科技成為改善國家治理、提升公共服務和創造產業發展的助力，亦已成為各國和國際組織的關切所在。

丹麥的數位化發展一直位居全球各國前茅，更是歐盟推展數位化轉型的指標性國家。從 1994 年提出「資訊社會 2000」（Information Society 2000）計畫延續到晚近的「數位成長策略 2025」（Digital Growth Strategy 2025），丹麥政府以「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作為示範場域和引導，逐步打造出一個結合網路基礎設施、數位通用工具、友善應用平台和社會服務架構的數位轉型發展體系。整體來看，丹麥的資通訊科技和數位發展政策，主要建立在四個重要原則上：（1）資訊社會必須為了國家全體人民的福祉而存在；（2）促進資訊社會中資訊的傳遞與溝通；（3）前瞻技術相關 IT 基礎建設的整備；（4）公私合作串聯擴散數位應用效益。丹麥的經驗顯示，數位轉型之路必須結合科技研發、社會應用、治理體系的共同調適，並透過通用工具、運作平台、友善界面的共同運作，為數位科技的擴散採用提供行動的誘因與利基。

臺灣自 2017 年開始推動「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DIGI+）（2017-2025 年）」計畫，並在 2021 年升級為「智慧國家方案（2021-2025 年）」，強調從基盤、創新、治理、包容四大主軸進行推動計畫。未來如何整合各主軸的行動策略，面對虛實整合世界的數位轉型挑戰，值得從丹麥的推動經驗中加以參照和反思。

關鍵詞：數位丹麥、數位轉型、數位治理、智慧國家、電子化政府

*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國際經濟所輔佐研究員，聯絡方式：hjcrdf@gmail.c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CT brought us many new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5G, etc., which has influenced our life a lot. After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in our daily life and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s that also be a critical competitive field for the future society. How countries can make good use of these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improve national governance, enhance public services and creat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also become the concern of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anish digital development has been among the top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it is also an indicator country for the EU to promot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0" (1994) to the recent "Digital Growth Strategy 2025", the Danish government leverages e-Government as the demonstration field and guidance to gradually build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egime that involves network infrastructure, digital tools, user-friendly platforms, and social service arrangements. Danish ICT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policy circles on four important principles: (1)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ust service the well-being of all citizens; (2)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should take care of the transmission and communication; (3) The improvemen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hould base on the need of future society; (4)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cooperation to spread the benefits of digital applications. Danish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path to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ust connect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social applications and provide incentives and niches for the proliferation and adop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Since 2017, Taiwan has promoted the "Digital Nation: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Economy (2017-2025)" (DIGI+ 2017-2025) program and upgraded it to the "Smart Nation Program (2021-2025)" in 2021. The four major pillars constitute infrastructure,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 to inclusion. How to integrate the action strategies of and face the challenge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of virtual and real integration, is worthy of reference and reflectio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Denmark.

**Keywords: Digital Denmark,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Governance,
Smart Nation, e-Government**

第四場

- A.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之建立與永續發展
- B. 氣候變遷因應與永續能源發展
- C. 產業發展與空間 01
- D. 能源與治理
- E. 性別, and beyond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_ 彰化 (LTSER_Changhua)介紹

王素芬

人類對資源的需求和環境價值觀的改變會導致土地利用和地景的變化，經濟和人口壓力往往會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永續性產生衝擊。長期的社會-生態系統觀測研究不僅能累積有助於了解臺灣的人地互動資訊、更能提供探索環境生態議題與永續治理的知識基礎；為對臺灣社會生態系的特殊性有全面的理解，科技部推動「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LTSER)」納入共用核心設施項目，對核心基礎資料項目進行觀監測，讓科學家可共享觀測資源，讓資源運用最大化，以利研究人員將有限資源進行有效率分配及使用，深化社會生態系統研究，引導社會邁向永續發展。

彰化沿海地區的地景與生態系統變遷是臺灣西南沿岸發展的縮影，沿海地區過去數十年已發展多個填海造陸的海埔新生地，其土地使用多為工業生產及養殖漁業為主，近期沿岸陸續開發魚塭光電與陸域風機等設施。風力與太陽能發電為臺灣能源轉型的里程碑，透過再生能源之開發，以滿足與日俱增之工業生產與都市消費生活所需。這些超越在地脈絡的社會發展需求，將改變彰化沿海的自然與社會地景，影響社會生態系統的運作。此外，氣候變遷、降雨型態改變，加上河川上游土地利用與工業發展帶來的污染，亦衝擊著沿海濕地生態系統。

長期社會生態研究平台概念回顧與在臺展望： 跨域治理之觀點

藍逸之*、王素芬**、林惠真***、宋郁玲****

落實永續發展，前提是意識到人文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間的互動關係，及務實地觀察其相互影響與造成改變的驅力。人文社會與自然生態並非兩個單獨運作的系統，彼此具有相依關係；兩者的系統變遷，也會相互反饋，對彼此的運作產生影響。歐盟先進國家的實務經驗，則陸續在已經行之有年的「長期生態研究」(long-term ecological research, LTER) 經驗，納入社會面的資料觀測與收集，形成「長期社會生態研究」(long-term social-ecological research, LTSER) 平台。LTSER 需要跨領域知識相互整合，仰仗權益關係人的共同知識生產及尋找問題解方，也需要配合地域特性、厚植地方知識、串聯跨地點網絡。LTSER 也反映出，人地關係的調節有賴制度介入，需要跨域合作機制，串聯地域網絡，促成多尺度的環境資源監測，並制定多層級治理策略。唯不同地域的社會生態景觀具有區域差異，也使治理解方呈現多中心性，塑造具制度多樣性的治理地理學。本文定位為回顧性論文，對國內方興的 LTSER 平台及理論基礎，予以綜合性評析。除了陳述 LTSER 的主要概念及學理基礎，本文也對其具有的夥伴關係、合作網絡、跨學門、多尺度/層級等特性，在公共管理上跨域治理的意涵為何？又如何銜接多樣的國土空間？透過臺灣目前正在推動的 LTSER Changhua 做為簡例，進行說明與對話，闡釋 LTSER 對落實臺灣國土跨域治理及地方永續行動，有其必要性。

關鍵詞：長期社會生態研究、社會生態系統、共享資源、治理地理、跨域治理

* 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學系助理教授。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特聘教授。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特聘教授。

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之社會面向資料建置與議題整合

宋郁玲

本場次將針對 LTSER 社會面向資料庫資料內容的系統性安排進行說明，包括資料搜集的方法，如：深度訪談，問卷調查，Story Map。以及資料系統性呈現，以便於使用者進行分類搜尋，並從社會面資料與社會環境議題連結，尋找完整的資料內容，並引導研究議題的發想，或者政策訂定所需的脈絡性資料。

關鍵詞：長期社會生態核心觀測站，資料庫，故事地圖，主題搜尋

自然環境和人為活動對彰化海岸潮埔地形變遷之研究

陳毅青

潮埔地形為彰化海岸生態與農漁業社會系統重要基礎，因廣闊且平坦的潮埔灘地富含有機質和營養鹽，孕育多樣的動、植物生態系，也是當地居民賴以維生的養殖漁業和漁場。潮埔地形受到沿岸河流輸砂變化的影響，近年更受到各種海岸人工構造物的干擾，逐漸出現海岸侵蝕的現象，瞭解潮埔地形和生態社會系統之間交互作用與衝擊，則有賴於長期且完整的潮埔地形監測資料。本研究將以多尺度航遙測技術建立彰化海岸近三十年的潮埔地形變遷，研究方法將使用多種衛星影像與濱線自動判釋，配合潮位觀測資料建立潮間帶灘地地形，再分析地形變遷與濁水溪和大肚溪河流輸砂之間的關係。同時，本研究也將針對彰化芳苑海岸灘地的影響進小範圍、高解析度的觀測，以了解「海空步道」與「紅樹林」，或未來光電板或風機進駐，潮埔地形與人工構造物之間的交互作用與衝擊，作為未來評估氣候變遷情境、環境治理策略下，潮埔地形、海岸氣象、生態系、土地利用、產業活動、治理策略之間的互動與衝擊，進而評估彰化海岸社會生態韌性與脆弱性的依據，促使下一步的永續行動方針產出。

關鍵詞：海岸地形、潮埔、衛星影像、人為活動、彰化

以海線為名：
臺灣離岸風電開發與其空間影響

盧沛文

本文從海洋空間規劃的視角，檢視彰化海線的空間發展脈絡，特別是 2010 年代中後期，離岸風電開發誘因下的決策服務網絡，藉以盤點時空條件上的進程與地方發展的連續性，梳理公私部門與行動者在地方空間發展上的角色與協力關係，並進而理解決策服務網絡的更迭對地方空間發展的影響。透過政策分析，半結構式訪談與田野調查，本研究發現，第一，中央部會決策者建立了由上而下的決策系統，主導了地方從石化工業，離岸工業區到再生能源的工業發展。第二，決策過程中地方參與的匱乏與過去的地方反對經驗，即便普遍性的支持用更積極的方式減緩氣候變遷與其帶來的衍生性災害衝擊，仍然讓地方行動者對離岸風能的發展有所保留。最後，現階段在制度與權責分工上的缺口，讓海洋空間規劃僅被當作是海洋環境保護的同義詞，缺乏社會面向的討論，也讓海洋空間秩序的界定與永續經營愈發充滿挑戰。

關鍵詞：海洋空間規劃，海洋環境保護，離岸風電發展，環境治理，彰化海線

Manufacturing sector based on TCFD recommendations in Taiwan

Ya-Ting Kuo*, Kuei-tien Choub**

氣候變遷對於生態環境與人文社會的影響已是無法改變的態勢，不僅不斷為人類健康帶來不良影響 (Ahmad & Hossain, 2015)，甚至很難計算因應氣候變遷所產生的經濟代價 (Bolton et al., 2020)。加上，國內外氣候相關法規日趨加嚴、極端氣候事件發生愈加頻繁，乃至於消費者行為的改變等，使得這些因氣候變遷產生的種種劇烈變化會對企業的營收、產品價值，甚至商譽，皆可能產生潛在的衝擊 (Isabel et al., 2020)。因此，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工作小組於 2015 年由金融穩定委員會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成立，並於 2017 年發佈「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建議書」，提供具一致性的自願揭露指引，以協助投資者與決策者了解企業面臨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

在國家治理上，TCFD 的重要性逐漸攀升，各國政府開始將 TCFD 納入法規或政策中。TCFD 在 2021 年發佈的「現狀報告書」(Status Report) 中，提到包含巴西、歐盟、香港、日本、紐西蘭、新加坡、瑞士、英國等地的官方機構皆提出不同程度的強制揭露，隔年也新增了美國與印度兩國，並要求國內企業需依照與 TCFD 相同的框架揭露氣候相關訊息。

在臺灣，金管會也關注此趨勢，要求上市櫃的企業在編制申報 2022 年永續報告書時皆需參考 TCFD 資訊揭露規範，俾將氣候風險聯結至公司治理，以提升企業資訊透明度。除了政府規範外，臺灣企業也越來越積極地加入 TCFD 倡議組織。截至 2022 年 4 月底，已有 91 家企業或組織加入。

為了解現階段臺灣企業在因應氣候變遷衝擊下，進行相關財務揭露之意願與行為，本調查首度針對國內企業進行氣候相關財務揭露調查，希冀可以掌握目前臺灣企業面臨氣候變遷風險時，所展現出的態度與行動。調查期間為 2022 年 3 月 23 日至 2022 年 4 月 12 日，調查樣本共回收 377 筆的製造業企業資料。主要的研究發現有三個。第一，高碳排企業比非高碳排企業更願意進行 TCFD。第二、高達八成企業認為未來高碳排產品會面臨完全或部分淘汰。第三、企業越接受更多利害關係人壓力者，更會有意願進行 TCFD。

因應未來國際政策趨勢與臺灣法規規範，臺灣企業將逐漸越發重視與進行 TCFD。因此，建議臺灣企業應將企業風險管理政策與 TCFD 架構之風險與機會結合，並且儘早因應未來氣候變遷所影響的政策、法規、市場、立即性與長期性實體風險、低碳產品研發等轉型風險，及早擬定調適策略。

* 郭雅婷，Risk Societ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周桂田，Risk Societ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society is an irreversible situation. It not only brings adverse effects on human health, but it is even difficult to calculate the economic cost of climate change. In addition, the increasingly stringent climate-related regu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mor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and even the changes in consumer behavior, etc., these drastic changes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may have potential impacts on the company's revenue, product value, and even reputation. Therefore,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was established by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in 2015 and issued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in 2017. The main purpose is to provide consistent voluntary disclosure guidelines to help investors and policymakers understand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or businesses.

In term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importance of TCFD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governments have begun to incorporate TCFD into regulations or policies. In the "Status Report" released by TCFD in 2021, it is mentioned that official agencies including Brazil, the European Union, Hong Kong, Japan, New Zealand, Singapore, Switzer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places have proposed different degrees of compulsory disclosu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which required domestic companies to disclose climate-related inform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me framework as the TCFD, were added the following year.

In Taiwan,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is trend, and requires listed companies to refer to the TCFD disclosure when publishing their 2022 sustainability reports. In this way, climate risks are linked to corporate governance to enhance corporat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n addition to government regulations,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becoming more active in joining the TCFD supporters. As of the end of April 2022, 91 companies or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have join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willingness and behavior of Taiwanese companies to conduct TCFD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t this stage, this study investigate a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survey on domestic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hoping to grasp the current attitudes and actions of Taiwanese companies when they face the risk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urvey period was from March 23, 2022 to April 12, 2022, and a total of 377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data were collected. There are three main research findings. First, high-carbon companies are more willing to conduct TCFD than non-high-carbon companies. Second, up to 80% of companies believe that high-carbon

emission products will face complete or partial elimination in the future. Third, the more companies accept pressure from stakeholders, the more willing they are to conduct TCFD.

In response to future international policy trends and Taiwanese regulations, Taiwanese companies will gradually pay more attention to and carry out TCFD.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should combine risk management policies with th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f the TCFD framework, and respond to the transition risks such as policies, regulations, markets, immediate and long-term physical risks, and low-carbon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ffected by future climate change to develop an adaptation strategy as early as possible.

離岸風電與漁業之衝突與調和： 日本和韓國的利益共享與協調機制之案例分析

黃慧慈*、施怡君**

近年離岸風電在亞太地區快速發展，得益於中國的爆炸性增長，亞太地區處於領先地位，占 2020 年新增裝置容量的 59.8%。其中，中國、臺灣、韓國、日本和越南最具發展風電潛力，預計 2025 年後亞太地區新增裝機量排名前五的場將是中國（52GW）、臺灣（10.5GW）、韓國（7.9GW）、日本（7.4GW）和越南（5.2GW）。然而，各國推動離岸風電建設以來都面臨到「多重使用衝突」的爭議，尤以漁業補償爭議的協調問題最為複雜。面對離岸風機與漁業使用衝突，我國既有的協調機制中，僅有漁業補償金和電力發展協助金兩種解決方案，單一的金錢補償機制無法一體化地解決漁民生計的影響。本文擬探討除了補償機制外，建立新形態的參與機制之可能性，其融合分配正義、程序正義以及增進信賴關係，並營造離岸風電與漁業共榮的環境。

在再生能源協調機制的相關研究中，「共同所有權」（Co-ownership）被視為可消弭衝突，並帶來社會接受性（Social acceptance）的重要方法。共同所有權理論除探討「所有權」外，也包含廣義的利益共享、溝通參與和協調機制，例如漁業補償機制、協調員、地方基金、合作社或協議會等。因此，本研究以「共同所有權」為研究理論基礎，並擇以「日本新瀉縣村上市及胎內市」及「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代表性的案例，探討其利益共享與協調機制之發展和形成因素。日、韓兩國在消弭離岸風電與漁業的衝突時採取不同的途徑，日本新瀉縣村上市及胎內市利用「協議會」機制，將漁民和多方利益整合為具有政策影響力之決策方案，並成立村上市及胎內市基金，將風力開發的利潤一部分撥為地域振興用途；韓國全羅南道新安郡引入「利益共享制」來提高社會接受度，居民和新安郡廳可以透過發電廠設立法人的股票、債券、基金等形式，其入股的比重至少 30% 以上或項目總成本的 4%，風力發電的收益以「禮卷」形式發放，不僅增加居民的收入，還可以促進人口回流和振興地方經濟。本研究採取再生能源協調機制三個觀察角度，包含權力關係、動機與強制性，以分析日、韓兩個案在利害關係人與協調機制形成的關鍵性因素。

關鍵字：離岸風電、漁業補償、利益共享、共同所有權、協調機制

* 德國弗萊堡大學環境與自然資源學系博士，email：salviacardamom@gmail.com。

** 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email：syj@rsprc.ntu.edu.tw。

兩位作者對此研究具同等貢獻。

Offshore wind power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recent years, and thanks to the explosive growth in China, the region is in the lead, accounting for 59.8% of new installed capacity in 2020. China, Taiwan, South Korea, Japan and Vietnam have the highest potential for wind power development, with China (52 GW), Taiwan (10.5 GW), South Korea (7.9 GW), Japan (7.4 GW) and Vietnam (5.2 GW) expected to be the top five sites for new installations of wind turbin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fter 2025. However, since the promotion of offshore wind power construc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y have been facing the controversy of "multiple use conflicts", especially the coordination issue of fishery compensation is the most complicated. In the fac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offshore wind turbine and fishery use, the exist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 Taiwan has only two solutions, namely fishery compensation and Electricity Development Assistant Grants, and this monetary compensation mechanism cannot solve the impact of fishery livelihoods in an integrated manner. This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new form of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in addition to the compensation mechanism, which integrates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cedural justice, and trust relationship, and creates a co-prosperous environment for offshore wind power and fishery.

In the study of renewable energy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Co-ownership" is seen a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resolve conflicts and bring about social acceptance. In addition to "ownership,"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co-ownership include a wide range of mechanisms for benefit shar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such as fishery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coordinators, local funds, cooperatives, or councils.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s Co-ownership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search, and selects representative cases from "Murakami-shi and Tainai-shi, Niigata Prefecture, Japan, and Sin-an Gun, Jeollanam-do Province, South Korea"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of benefit sharing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adopted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resolving conflicts between offshore wind power and fisheries. In Japan, Niigata Prefecture has used the mechanism of the "Council" to integrate the interests of fishermen and multiple parties into a policy-influencing decision, and has established a fund to allocate a portion of the profits from wind power development for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the Sin-an Gun introduced a "benefit sharing system" to increase social acceptance. Residents and Sin-an Gun Office can share at least 30% of the total project cost or 4% of the total project cost through shares, bonds, and funds of the power plant's founding sponsors. The proceeds from wind power generation will be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gift certificates", which will not only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esidents, but also promote the return of population and revitalize the local economy. This study adopts three perspectives of renewable energ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cluding balance of power, motivation and level of compulsion, to analyze the key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stakeholder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Keywords: offshore wind power, fishery compensation, benefit sharing,

Co-ownership, coordination mechanism

建構數位轉型下的臺灣永續能源生態系統新經濟

黃偉任*、王奕陽**、王涵***、林木興****、許志義*****、周桂田*****

2021 年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達成史上首個減煤的氣候協議，意味終結燃煤發電、建置永續能源生態系統新經濟已是沛然莫之能禦的趨勢，反觀我國電業法更直接將能源轉型入法，以期達到國家永續發展。本研究探討臺灣政府、企業與民間社會如何透過能源轉型結合數位轉型，以期發展強化永續能源生態新經濟。本研究不僅從發電端關注停電議題與電力政策，也同時探究可能影響穩定供電的輸配售端。本研究分析數位轉型下電力交易平台對於電力交易市場的影響，以及是否能解決穩定供電之根本問題？在臺灣能源轉型時刻協助政府建置永續能源生態系統新經濟，並且強調數位轉型發展、利害關係人參與，以期規劃我國電力供需之發展目標、降低能源轉型對於穩定供電之負面影響。研究方法除文獻分析法之外，主要採用焦點團體及深度訪談；以永續能源生態系統與數位轉型的主要內涵作為分析架構。初步研究發現如下：(一) 分散式電源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 DER) 具即產即銷、自給自足之特性，能極大化利用在地綠電，效能較高且風險有限。(二) 未來綠電成長趨勢下，可利用分散式電源與配電系統營運商 (Distribution System Operator, DSO)，以避免具間歇性之太陽光電與風電過剩而大量併入中央電網。(三) 臺灣宜仿照先進國家電力市場的經驗，發展虛擬電廠與另類電業，提供輔助服務、穩定供電的效能，且能解決電力系統區域壅塞之缺電問題。(四) 我國應持續強化利害關係人參與電力市場機制，特別是共享經濟平台發展及其相關法律整備，以期促進制度性的永續能源生態系統新經濟發展。因此整體而言，臺灣應加快數位轉型腳步、健全電業改革政策、完善永續能源系統發展。

關鍵字：虛擬電廠、另類電業、永續能源生態系統、電力交易平台、分散式電源

*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資深助理研究員。

***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資深助理研究員。

****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 中華大學創新產業學院暨企管系/特聘教授。

*****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臺灣大學風險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in 2021 reached the first-ever climate agreement on coal reduction, meaning that the end of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economy of a sustainable energy ecosystem is a trend that cannot be halted. Even more, the Electricity Act of Taiwan also directly incorporates the transition of energy production into the articl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sustainable nat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Taiwan's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ivil society can incorporate energy transition with digital transition to develop a new economy with enhanced sustainable energy ecosystem. This study not only focuses on outage issues and energy policies from the generation side, but also explores the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and marketing side that may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power supply. Also,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Energy Trading Platform on the electricity market under digital transition and whether it can solve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stable power supply, and helps the government establish a new economy of the sustainable energy ecosystem at the moment of Taiwan's energy transition. Meanwhile, this study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transition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to formulate the development targets of Taiwan's power supply and demand, and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nergy transition on the stability of power supply.

Regarding the methodology for this research, in addition to the document analysis conducted by policy research, this research mainly adopts the focus group an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employs the key concepts of sustainable energy ecosystems and digital transition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DERs) have the features of self-production and self-sufficiency, and can maximize the application of local green energy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limited risk. (2) Under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green energy growth, the DERs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operators (DSO) can be used to avoid intermittent and excess solar and wind energy from being connected to the central power grid. (3) Taiwan should follow the experience of advanced countries in the electricity market and develop virtual power plants (VPPs) and atypical electricity suppliers to provide ancillary services, stabilize power supply,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power shortage in power supply congestion areas. (4) Taiwan sh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in the electricity market mechanism,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aring economy platforms and their related legal preparation,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economy with an institutionalized sustainable energy ecosystem. Therefore, overall, Taiwan should speed up the digital transition, strengthen its electricity reform policies,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sustainable energy systems.

**Keywords: Virtual Power Plants (VPPs), Atypical Electricity Suppliers,
Sustainable Energy Ecosystem, Energy Trading Platform (ETP),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DERs)**

氣候調適治理及其法律整備：
歐盟、英國對臺灣組織法與作用法之啟示

林木興*、劉華美**、周桂田***

「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 揭示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不可偏廢，並且強調以風險為基礎、兼具包容性的氣候變遷治理。本研究觀察臺灣政府、企業與民間社會如何建構氣候變遷調適治理能力、強化氣候韌性發展？本文採用轉型管理的理論，分析氣候調適治理之組織、網絡與機制為何？超國家或是其他國家對於臺灣的相關啟示為何？研究方法除文本分析法之外，主要採用焦點團體。以便建構臺灣氣候變遷調適治理能力，並且著重在極端氣候災害防救及其法律整備、氣候調適治理組織法律的面向，亦即本研究試圖探究氣候組織制度化甚至立法規範的可能性，以建構兼具彈性、可行性、包容性的氣候調適治理框架，期待促進行政效能、得以長治久安。

關鍵詞：氣候變遷、風險治理、預防法學、韌性發展、氣候法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declares that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cannot be neglected, and emphasizes risk-based and inclusive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This study observes how the Taiwan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ivil society buil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strengthen climate resilienc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dopts the theory of Transitional Management to analyze the organization, network and mechanism of climate adaptation governance. What are the relevant revelations about Taiwan from supranational or other countries? In addition to text analysis, the research methods mainly use focus groups. In order to build capacity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governance in Taiwan, it focuses on extreme climat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and its legal preparation, as well as the legal aspects of climate adaptation governance organizations. That i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institutionalizing climate organizations and even legislative norms, in order to construct a resilient, feasible and inclusive climate adaptation governance framework, expected to promot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Keywords: Climate Change, Risk Governance, Preventive Jurisprudence,
Resilient Development, Climate Law

*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

四川西北羌族地區旅遊開發政策之研究

林介士*

旅遊業是項朝陽產業，對中國大陸民族地區國民收入的增長，具有一種連鎖反應作用。尤其是在自然資源豐富、古老文化濃郁的民族地區推動旅遊開發，易將資源轉變成經濟優勢，形成產業後發優勢經濟社會的價值創造。

本文研究以旅遊開發對羌族所在的茂縣、理縣、汶川及北川區域，從不同時間、空間維度、政策維度分析其對區域經濟社會影響情形，探討旅遊開發對少數民族實際受益情形，及旅遊推動過程可能遇到的問題，提出研究觀察與發現，冀作為對學術可能的貢獻與建議之論述。

本文研究採質性研究，以田野調查方式兼引用官方數據進行分析，從調查研究過程中進行觀察並蒐集第一手原始資料，疏理分析旅遊開發政策對四川西北羌族地區經濟社會影響的情形，研究上使用「新經濟地理學途徑中的核心—邊緣理論」，作為融貫研究議題內容的論述；實證上以理縣為核心景區旅遊開發經濟呈現的效應，依空間分佈距離核心越遠的邊緣縣區汶川、茂縣，逐漸減弱對邊緣區域經濟社會效應影響的程度。

從實證與數據顯示新經濟地理學途徑，旅遊業隨著空間改變轉換經濟正向效應表現，但並非是固定不變。亦可能受到其他變數影響，例如，資源分布、交通動線、旅遊行為、都市化程度等依變數因素影響，改變核心—邊緣區域經濟效應外溢表現；同時，從經濟效應、族群人口與宗教文化等面向，分析渠對核心—邊緣理論的變化關係影響。

關鍵詞：旅遊開發、羌族地區、經濟效應、核心邊緣理論

*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休閒農業與鄉村旅遊之思考

徐胤承*

自工業革命後，多數新興國家之產業型態，已然從農業轉往工商業發展，職是農村不再僅是提供主要就業機會的場域，勢之所趨，大量青壯年勞力遷往都市集中，最終造成農村人口外移及高齡化等嚴重問題，於是所謂「農村再生」概念，因此應運而生。按執行農村再生有諸多途徑，其中發展觀光，堪認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揆其方向，粗可分為以下兩大類：其一為休閒農業，依據我國「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之定義，休閒農業係指利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農業經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供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及以農村體驗為目的之農業經營；概言之，休閒農業乃基於農業暨其衍伸活動的觀光產業。其二為鄉村旅遊，雖說我國目前尚無提供具法效力之法規定義，但狹義而言，應係指與鄉村空間與資源密切相關之休閒活動；而此類藉由整合鄉村資源，兼及推廣觀光的途徑，間接亦能達到農村再生效果。惟察我國政策，多側重休閒農業，反而較少關注鄉村旅遊，因而如何開創振興，抑或針對兩者進行整合，俾以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益，應是未來努力目標。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movement of citizens away from agriculture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Rural areas are not attractive places where people work and live.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young laborers have moved to cities. As a result, the most prominent age groups in rural areas are more than 60. The so-called 'rural regeneration' concept became popular. While there are many ways to determine the implementation options for the concept, the tourism industry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There are roughly two categories: recreational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In respect of the first category, Article 3.5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ct" provides that "Recreational agriculture: A kind of farming management that applies landscapes of countryside, eco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integrate the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fishery and animal husbandry,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cultures of farm villages and life of peasant families, provide citizen recreation and enhance the objective of experiencing agriculture and farm villages". In respect of the second category, there is currently no legal definition, but it should refer to leisure activities closely related to rural space and resources in a narrow sense. In Taiwan, more emphasis is placed on recreational agriculture, rather than rural tourism. This issue deserves further attention.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本文資料部分來自於發表人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補助之 111 年「農村再生與文化資產共舞-墨西哥魔幻農村視角下的我國農村旅遊」計畫案。

以情感氛圍之角度探討大型旗艦建築物 對周邊土地使用之影響—以花博公園圓山園區為例

賴思廷、劉佳蓉

本研究以都市情感氛圍之角度切入，探討大型旗艦建築物對都市土地使用之影響。目前國內針對都市再生之相關文獻較少針對情感氛圍之影響加以著墨，只探討建物與建物周邊的影響，沒有考慮到建築物與周邊環境與無形量體如光、聲音、氣味、情感氛圍等所形成的複合性量體，因此本研究不只以大型旗艦建築物做為討論對象，更是從複合性量體的角度去探究過去所忽略它們之間所產生的情感氛圍。

本研究以花博公園圓山園區為例，利用調查法分析比對園區周邊之土地不同時期使用情形，搭配實際走訪記錄園區內之有形與無形量體相互作用情形，發現園區量體複雜之原因與隨創式規劃有直接關係，此外本研究運用「影像發聲法」(Photovoice) 結合照片與訪談了 13 位園區的活動者將情感氛圍可視化，探討園區內的量體根據地點和時間會有所不同而具有領域性，且透過受訪者所拍攝的照片了解受訪者對於地方的情感感受皆與受訪者自身回憶有很強的連結，而由於本研究研究期間受 COVID-19 影響，園區在疫情期間所受之影響也是本研究特別之處。

此外，透過訪問財團法人臺北市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與花博公園圓山園區附近的咖啡廳商家，進一步了解情感氛圍與土地使用之影響，以及情感氛圍隨著時間的催化於周邊再現之現象，證實情感氛圍確實能影響我們的生活、土地使用和都市。情感氛圍為都市再生中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並能成為未來都市再生之發展方向提出之參考。

關鍵詞：文化導向都市再生、量體地理學、大型旗艦建築物、情感氛圍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ole of urban affective atmosphere on the urban land use in the era of post-mega-event. Current studies have overwhelmingly emphasized that the birth of mega-project and its spectacular buildings on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urban regeneration, rather than focuses on the urban affective atmosphere which is constituted by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urban volumetric space and its fluid volume (such as light, sound, air) and its impact on mega-event sit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ddress this gap through using Taipei Expo Park as a case. Drawing on the field observation, photovoice method, and 13 in-depth interviews,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the urban affective atmosphere is constituted through volumetric thinking. Compared to physical dimension of mega-project urban regene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mergence of urban affective atmosphere, which is constituted by physical and fluid ontologies of volumetric space, has successfully generated three urban volume nexus, affecting the feelings, memories, everyday practices of urban dweller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o unpack the affective dimension of urban regeneration.

**Keywords: Cultural Creativity-Led Regeneration, Volumetric Geography,
Megaprojects, Affective Atmosphere**

Integrating communities' importance-performance aspects of community resilience towards sustainable indigenous tourism

Chi-Cheng Chen 陳季呈, Jia Wei Chook 祝家蔚, Chun-Hung Lee 李俊鴻

The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capacity building are the key issues for the sustainable indigenous tourism for the local development, specifically on factors affecting locals'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perceptions in sustainable indigenous tourism. We conducted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indigenous tourism with the aspects of communities' community resilience from an approach of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and applied a discrete choice model to find the main variables affecting local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sustainable indigenous tourism.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perceptions of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I-P) for community resilience of sustainable indigenous tourism.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strategies such as "assist building green landscape in the village", "assist creating tribal landscape based on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lann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cultural activities" are the first priority for the capacity building of sustainable indigenous tourism.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the locals' participation on sustainable indigenous tourism are the residents who had 1) higher education, 2) living in the Datong Township, 3) higher attitudes on job opportunities from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4) higher perceptions on community resilience. Our outcomes synthesi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sustainable indigenous tourism.

Keywords: Capacity building, local's participation, policy incentives, integrated perspective, community resilie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stitutions, collective action, and adaptive co-management: Analyzing the problem of social fit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 governance

Weien Chen *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pproach to more systematically examine how “governance ingredients” of adaptive co-management (ACM) mediate the problem of social fit in marine protected areas (MPA) governance, or how their absence leads to the persistence of mismatches. Since rules are institutional statements that specify what social actors are allowed to do, a lack of mutually agreed-upon rules frequently results in disagreements about the management,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shared resources. The archetypical social fit problem in MPA governance arises when formal institutions are incongruent with informal rules derived from user perspectives and local conditions. Numerous ACM components and their interplay are vital in creating a better fit. However, it is impractical to identify the major explanatory variables or package strategies that lead to desired outcomes of ACM, as numerous factors may substantially influence in each case. Thus, the focus of the inquiry is to examine how these ingredients serve as building blocks for proceeding to adaptive co-management while enhancing social fit. By using the inter-institutional gap framework,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t contributes to identifying the multilevel rule gaps in the natural resource governance system. This sheds light on the causes of un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across social organiza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Further, applying ACM’s “governance ingredients” will help to explain why certain inter-institutional gaps have been mediated while others have not. This study offer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with policy implications, aiming to recognize the essence of social misfits in MPA governance and the potentiality for initiating adaptive co-management.

Keywords: social fit, inter-institutional gaps, adaptive co-management, governance ingredients, marine protected areas governance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Forestry in association with Syracuse University

Weien Chen 陳偉恩, PhD Candidate, 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Policy Doctoral Program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this articl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wchen79@syr.edu

Work in progress: Please do not circulate or cite without author’s permission

Gogoro Network 換電站佈建的公私協力模式： 從能源轉型治理理論的多層次視角途徑檢視

周禮邦*

在國際間對於減碳等環境議題愈加重視的趨勢下，許多國家透過不同的政策組合，試圖推動電動車此類運輸部門的能源轉型作為對應解方。相較他國，臺灣在電動車輛上的轉變更多發生於機車而非自小客車。自燃油機車轉變為電動機車的過程中，除了電動機車業者本身之外，燃油機車業者、政策、消費者的想法...等不同要素之間的互動，都會影響到轉型的發展脈絡。在我國電動機車轉型的諸多過程中，有關構成 Gogoro Network 能源網絡之換電站佈建相關的硬體、建設，可說已達可謂普及程度。本文透過理論之文獻分析以及對相關行為者之訪談，嘗試以社會科技轉型理論之 MLP 途徑，分析換電站網絡發展過程中，代表「政策」的公部門在轉型的各個階段與代表網絡佈建之「技術」的私部門之間的互動關係。接著，再根據公私協力理論補足 MLP 途徑在政策及技術要素間互動描寫上的不足。整體來說，電動機車社會科技體系中 Gogoro Network 之換電站能源網絡作為代表技術要素之私部門，之所以能夠達到目前的發展程度，得益於兩要素間綿密、衝突又妥協的公私協力關係。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mm920066@gmail.com。

Incorporating citizens' importance-performanc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acceptance of renewable energy management in Taiwan

陳興芝、李俊鴻

The develop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RE) is a critical issue for the goal of 2050 net-zero carbon emission around the world, especially on factors affecting citizen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social acceptance in renewable energy management (REM). We established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REM based on citizens' social acceptance perspectives under the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method. We hired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disclose key variables affecting citizens' participating behavior in Taiwan. The outcome shows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perceptions of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for social acceptance of REM.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strategies such as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residents,” “duce overall power system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tablet a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building smart grid and power storage equipment” are appreciat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REM policy. The features that affec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itizens in the RE are residents who had 1) higher income, 2) living in the northern area, 3) less than 50 age, and 4) higher awareness of social acceptance. Th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constru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RE mechanisms from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 RE development.

Keyword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policy incentives, social communication, social-political accept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離岸風電能不能- 臺灣離岸風電產業的創建、落地與著根

李崇睿

本研究以臺灣離岸風電產業的發展為例，將研究問題區分成巨觀、中觀與微觀三個尺度。(1)臺灣政府創建離岸風電產業鏈採取何種政策？(2)臺灣廠商透過組建聯盟來切入產業鏈所產生的效益與阻礙為何？(3)臺灣廠商跨入離岸風電產業鏈遇到什麼樣的門檻，又是透過何種策略去處理？藉由回答上述問題試圖去了解創建一條新產業路徑的關鍵要素與其背後機制。

研究結果發現，從巨觀尺度，臺灣具有地方特性，也就是擁有了與其他地區不同的自然資源稟賦，而政府也企圖運用這項籌碼去要求國外開發商將本地廠商納入離岸風電產業鏈中。另外也可以看到政府的高躉購電價與產業關聯性政策，呈現其政策特性從發展技術到嘗試開創市場，縱使無法全然的掌控整條產業鏈，但我們仍然能看到臺灣政府在創建新產業路徑時所展現的角色轉型。再者，從中觀尺度，對廠商而言，進入離岸風電產業仍具有相當高的門檻，因此期望透過組建產業聯盟產生綜效，然而因產業結構的限制使得聯盟網絡難以發揮效果，不過在另一層面，本研究也觀察到其比較具體的成果展現在資訊交流平台的方面。最後就微觀尺度而言，本研究以水下基礎與海事工程領域為例，區分了技術與市場門檻。其中水下基礎廠商比較能以自身為基礎投入，透過向外學習、內部自我學習、向下要求等策略來處理門檻；而海事工程廠商則需要透過合資處理規模與經驗的議題。然而因臺灣環境／產業的特殊性產生有異於先進國家的特殊門檻，使得臺灣廠商不是單向被先進廠商帶著走，是存在著雙向的需求與互動過程。另外，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臺灣政府的政策對臺灣廠商存在著效益與制約的二元性。

關鍵詞：路徑創建、國家、離岸風電產業、產業聯盟、後進廠商

This study tak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as an example, and divides the research questions into three scales: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asks: (1) What are the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Taiwan government to create an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chain? (2) What are the benefits and obstacles that Taiwanese firms encountered when entering the industry chain through the formation of alliances? (3) What are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aiwanese firms individually to tackle the barriers of entering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chains? By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key elements and mechanisms behind the creation of a new industrial path.

The study finds that, from a macro-scale perspective, Taiwan has local characteristics, i.e.,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regions, and,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has attempted to use Taiwan's natural endowments as the leverage to ask foreign developers to involve Taiwanese firms into their supply chains. 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such as Feed-In Tariff and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s, show the state's policy goals shifted fro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o market creation. Even though it is not possible to control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s, we can still se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government's role in creating new industrial path. From a meso-scale perspective, the threshold for entering the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is still quite high for Taiwanese firms, so they sought to create a synergy through establishing industry alliances.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local industrial structure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alliance networks to work effectively. Finally, on a micro-scale perspective, this study takes the foundation and marine engineering fields as examples to examine how local firms deal with the technological and market thresholds. It is found that foundation firms are more capable of dealing with the thresholds through external learning, internal self-learning, and downward requirements, while marine engineering firms ne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scale and experience through joint ventures.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environment/industry, we note that Taiwanese firms faced special threshold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advanced countries, allowing Taiwanese firms to develop two-way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foreign advanced firms. In addition, we can also observe the duality of benefits and constraints of Taiwan government policies on Taiwanese firms.

Keywords: path creation, state, offshore wind power industry, industry alliances, latecomers

臺灣的利害關係人問題：
切入離岸風力發電產業

麥傑米*

The need for Taiwan to reform and bring clarity into stakeholder engagement processes for development projects is clear and long awaited.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ty has come to understand the benefits and importance of stakeholder engagement processes. As suc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continued to regulate and streamline processes for stakeholder engagement. Particularly formidable in these efforts are the World Bank, IFC, and OECD, all of whom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establishing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 for stakeholder relations. In Taiwan however, stakeholder processes lack effective guidelines and structure, leading to a variety of problems for development projects across industries. These problem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project delays, unnecessary costs, poor perception of industry amongst the public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issues.

In Taiwan's emerging offshore wind industry, the lack of clarity and guidelines in stakeholder processes have already resulted in a number of problems for the industry, including formidable delays in green energy goals set by Taiwan's executive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stakeholder engagement issues regarding fisheries have resulted in communication issues, distrust, and ultimately conflict. Thu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continued rollout of offshore wind in Taiwan is effectively, timely, ethically and sustainably completed,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stakeholder engagement need to be clarified and systematized at the regulatory level. This essay, after taking an in depth look at the state of stakeholder engagement with fisheries in Taiwan's offshore wind industry, will conclude that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international, and practical reasons, the emerging offshore wind industry has potential to be a leader which brings Taiwan into a new era of best practices for stakeholder engagement.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永續發展管理人才培育之探究

鄭以萱*

本論文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究我國永續發展管理人才培育之觀念及課程發展趨勢。研究本身立基於發展教育領域，後者致力於探討教育和人類發展的關係，探索教育之於發展的行動角色，以追求更具發展效能的決策與行動結果。發展教育思潮受 1960 年代學者如 Theodore W. Schultz 所提出的人力資本論影響甚鉅，強調人才培育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亦長期形塑世人對於發展目的的經濟期待。相較之下，1990 年代 Amartya Sen 和 Martha Nussbaum 的人類發展與能力取徑論述，主張發展的終極目的不在於追求財富與經濟成長，而是為了體現人類自由與福祉。進入本世紀，不少發展教育學者如 Lesley Powell, Simon McGrath, Leon Tikly 和 Angeline Barrett 等除了認同人類發展與能力取徑論述中對於發展的願景與想像，同時試圖融入 Roy Bhaskar 以及 Margaret Archer 等批判現實主義者視角，探討不同社會結構及其間動態複雜關係對人才培育過程所帶來的影響。

在當前聯合國之永續發展目標和國際國內相關政策的推波助瀾下，我國公私立大學紛紛開設永續管理人才培育學程。這些課程內涵為何？課程背後之發展觀念與意識形態為何？課程發展之趨勢、挑戰與未來展望為何？為回應研究目的與問題，本論文採用文獻分析法和內容分析法，首先釐清永續發展觀念與脈絡，繼而建構批判現實主義之能力取徑觀念分析架構。據之，進行我國永續發展管理課程內涵與現況之分析。最終，從學程目的、能力組合以及課程與教學三面向建議我國未來相關人才培育之課程發展方向。

關鍵詞：永續發展管理、人類發展與能力取徑、發展教育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系教授。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concepts of educat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nd the trends of developing its curriculum. The study stems from the field of Development Education, whose thought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odore W. Schultz's Human Capital Theory since the 1960s, accordingly stressed the 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long shaped people's economic expectation of development work. By comparison,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Approach later theorised by Amartya Sen and Martha Nussbaum addresses that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development is to realise human freedom and well-being. In this century, many development educators such as Lesley Powell, Simon McGrath, Leon Tikly and Angeline Barrett not only recognise the development vision of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but involve Roy Bhaskar, Margaret Archer and other critical realist perspectives to discuss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upon educating process.

In wake of 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cies, public and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have boosted programmes to educate stud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What are curriculum and contents inside? What are development concepts and ideologies behind? What are trends, challenges and future prospect of thei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literature review along with content analysis are conducted. In so doing, the concepts and contex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firstly clarified. Then, a conceptual analytic framework of critical realist capability approach is constructed, by which the current programmes are analysed and discussed. Finally,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ogrammes purpose, capability set, an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are sent.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y Approach,
Development Education**

Social Disparity in Haitian Farmers'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and Related Coping Strategies

Manasse ELUSMA^{*}, Thung-Hong LIN^{**}, Chun-Yin LEE^{***}

Climate related disasters are constantly threatening Caribbean farmers (e.g. Haiti).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s among farmers are a subject of considerable research since sufficient knowledge is essential to making effective adaptation decisions. Among the many questions facing developing economies is what role does socioeconomic status play in perceptions and adaptations to climate change? Thu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social disparities in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and related coping strategi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farmers by comparing two farming areas in Haiti. We further explor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male and female farmers in these areas. We collected data through fieldwork and a household survey of 670 farmers, of whom 75% were men. Consistent with the majority of existing sociology of science research,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poor and female farmers had a stronger climate change perception than did the rich and male farmers, respectively. The survey population generally adopted similar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climate change. However, the poor were more likely to rely on off-farm strategies, whereas the female farmers were more likely to use on-farm versus offfarm strategies. Although the female farmers had less education, land, and resources, in contrast to the male farmers, they exhibited greater overall awareness of climate change and engagement in finding new alternatives to cope with this threat.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can be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improving agricultural resilience in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such as Haiti.

Keywords: Social class, climate change, gender, coping strategies, Haiti

^{*}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 i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lobal Change Research Center; N0 1, Section 4, Roosevelt 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617, Taiwan | melusma7@gmail.com

^{**} International Degree Program i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Room 907) N0. 128, Sec. 2, Academia Rd., Taipei, Taiwan 11529 | zoo42@gate.sinica.edu.tw

^{***}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Room 906). Institute of Sociology, 8F, South Wi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uilding, 128, Sec. 2, Academia Rd., Taipei, Taiwan 11529 | as0201022@gate.sinica.edu.tw

我在花蓮做同志： 逃離臺北的性別實踐

張哲源*

本篇研究關注在花蓮以及東臺灣地區的同志運動，透過自我民族誌的方式探究「暫居者（暫時居住者）」對於地方同志運動的影響。從自身同志運動者生命經驗出發，微觀地反思身份認同、運動認同以及地方認同與花東同志運動的交互關係。不同於以往的研究，這次視角以地方同志運動為主，並以地理學的移動理論為主要的研究取向。從花蓮以及東臺灣的同志運動經驗中，可以發現身為倡議者的我們幾乎並非原生在地人——都有著外來者的身份。我們這群移動來到這裡舉辦同志運動的人對於地方的同志平權有什麼新的能动性？而移動所帶來的新地方讓同志有什麼新的認同與發展？同時指出，從社會孔隙介入到地方氛圍重建的關鍵歷程。

關鍵字：同志運動、移動、地方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gay movement in Hualien and East Taiwan,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emporary residents" on the local gay movement through self-ethnography. Starting from the life experience of one's own gay activists, this paper reflects on the microscop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movement identity, and local identity and the Huadong LGBT movement.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is time the perspective focuses on the local gay movement, and takes the movement theory of geography as the main research orientatio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gay movement in Hualien and eastern Taiwan, we can see that we, as advocates, are hardly natives - we all have the identity of outsiders. What kind of new activism do we, the group of people who moved here to organize the gay movement, have for local gay equality? And what kind of new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do comrades have in the new places brought by mobile? At the same time, it points out the key process from the intervention of social pores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local atmosphere.

Keywords: gay movement , mobility , place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culine Development and Gender Equality:
the case of Taiwan**

Mei-chuan Wei^{**}

The election of its first ever female president in 2016 and the legalis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first in Asia, in 2019 have earned Taiw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recognition for its achievement of gender equality. The gender revolution however has seemed to stall in the country despite its impressive achievement in gender equality. Through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this paper aims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journey of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in general and women's liberation in particular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aiwan's postwar development, which is dominated by discourses of capitalist modernisation and liberal feminism and 'masculine' in its nature. The 'masculinity' of Taiwan's postwar development is discerned and defined by the consequences, intended or unintended, of it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which empowers women in some way and to a certain degree and perpetuates patriarchy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primarily to discussions of the limits of capitalist modernisation, and about what, beyond the dominant policy reforms inspired by liberal feminist thoughts, is needed for facilitating women's further liberation and gender equality in Taiwan.

**Keywords: capitalist modernisation, gender equality, liberal feminism,
masculine development, Taiwan**

* Draft, do not quote.

** 魏玫娟,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圓桌論壇

第十四屆發展研究年會

XPlorer探索者計畫

走入大學的疫後新課綱世代
文化世代衝擊與再適應

主辦單位：
台灣發展研究學會

承辦單位：
教育部XPlorer探索者計畫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參與中心

大學入門課程支持系統之建立- 以東海大學 Alpha Leader 為例

許書銘*、李佩玲**

面對 108 新課綱後第一屆新鮮人即將踏入大學，如何透過大學入門課程，引導大一新生盡快融入大學生活，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並展開自我學習，是多數大學必須思考的迫切議題。早期國內多數大學的大學入門多停留在新生訓練、校務介紹甚至政令宣導的階段，東海大學在 2011 年起將大學入門推動到全校 3500 位新生、也將課程擴大到 4 天 3 夜，讓新生在認識校園的同時也能在情境式的學習中盡快融入新鮮人生活、學會學習並積極規劃未來之大學生涯。這樣大規模實驗課程之所以能順利啟動並持續推動，除了各項課程/活動的創新設計，最重要因素即是 Alpha Leader (AL) 支持體系。

AL 體系最初建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培力帶領 3500 位新生的 250 位「課程引導員」，要成為 AL 都必須參加完整的培訓。隨著後續每年大學入門的規劃、推動與檢討，AL 逐漸發展出更有系統的培力機制，包括協助規劃課程的資深 AL-Senior-Alpha 和統籌 AL 培力的 Coordinator-Alpha。作為一群有自主思考能力的行動者，AL 們也開始對 AL 的定位、功能、角色思考辯論，AL 不應該只為了大學入門而存在，整個 AL 體系也開始有機發展出更多元且豐富的樣貌。歷屆 AL 相較於一般大學生有更強的學習動機，也能在參與或帶領各項活動中的自我認同與成長，並培養團隊合作能力；整個 AL 體系的共演化方向與過程，都相當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本研究希望透過對東海大學 Alpha Leader 體系演進的研究，包括蒐集與分析歷年 AL 招募、培訓、社群互動與活動紀錄等各項質化與量化資料，以期能對上述主題能有更深度的觀察與反思。未來的研究結果，也能對於 108 新課綱實施後大學可以推動的介入策略（例如，大學入門及其支持系統的重新想像），以及各項核心素養（例如自主學習、團隊合作）的養成與培力，提供可行的思考方向。

關鍵字： 大學入門、僕人領導、同儕教練

*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兼校務研究辦公室執行長。

** 東海大學 ALPHA LEADER 計畫負責人，:APENNY@THU.EDU.TW。

This research hopes that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Alpha Leader system of Tunghai University,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variou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such as AL recruitment, training, community interaction and activity records over the years, it is hoped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bove topics. Observation and reflection. Future research results can also provide insights into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at universities can promot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08 new syllabus (for example, re-imagining university entry and its support system),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and relationship of various core competencies (such as self- directed learning and teamwork). Build strength and provide feasible thinking direction.

**「探索」作為行動方法：
以「探索永續」、「素養導向」課程為例**

許輝煌、包正豪、蔡宗儒、黃瑞茂、李長潔

本研究在淡江大學永續治理的藍圖發展上，藉由參與教育部「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試圖探索大學該如何探究與實踐永續發展教育。本研究在實用主義的知識論上，以行動研究（AR）為操作，汲取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觀點，引援 John Dewey、Harry Collins、Kurt Lewin、Bruno Latour、Michel Callon、John Law 等學者，對「涵育永續力：揚帆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之新旅」計畫中的人與非人參與者（human and non-human），進行多重解讀，挖掘問題，期待變革，策略合作。集合校、院、系、個人等不同層級，共至少 70 位計畫與研究參與者，形成計畫團隊，從異質的視野與行動，建構實用主義式的過程性創新，描繪教育革新（reform）的巨觀與微觀之行動網絡，理解永續素養教育嘗試、創新與擴散的樣態。

故此，本研究提出的題旨為：（一）素養教育如何可能；（二）永續教育如何可能；（三）永續素養教育如何可能。雖然三個研究問題宏大，但基於行動研究之方法論立場，本研究將窮盡可能地在詢問的迭替與各種可能性的發生中，接近問題與解答的根本。

關鍵字：永續發展、永續發展教育、素養導向教育、行動者網絡理論

素養的接力賽- 以銘傳大學傳播學院新生轉銜課程為例

陳柏宇*、陳佳慧**、王皖佳***、張舒斐****、詹雪蘭*****

為因應疫後新常態及 108 課綱素養教學轉型，傳播領域課程正面臨諸多挑戰，其中人文創意難開發、教學內容難創新、疫後職場難轉型等三項尤為艱鉅。為協助學生在融媒體時代中，認識自我、探索知識，打造適性且自主的高等教育環境，必須重整傳播學院基礎課程及整合學院共同課程，訓練學生成為說故事的人。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法之理念，探討「新生轉銜課程」之教學現況，引領學生透過自主探索，逐步成就學生將經驗與知識的組合能力，以回應跨領域傳播實務學習的困境。本研究另以參加暑期「公共關係」轉銜課程之大一新生和已修習過非課程翻轉下「公共關係」大二生為研究對象。參考十二年國教課綱之核心素養指標，擬定適用於高等教育之「大學傳播領域核心素養指標」，並據此設計研發翻新課程、研究問卷與採訪大綱，從多元資料進行成效之評估，亦藉此瞭解修習與未修習素養導向翻新課程學生之差異。

實踐課程透過理論、現場與對話，並採多元評量方式，於教學時，請學生填寫前、後測問卷，用以追蹤調查課程對學生之實質影響。並於教學中，記錄學習歷程，例如：學習心得、小組互動紀錄、提案簡報等；同時，邀請教師社群共備討論。於教學後，隨機挑選參與學生及教師，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共同探討學習歷程紀錄與課程實施得失。

研究結論發現：1. 接受 108 課綱的大一新生，較以往學生更為優異特質係：企圖心、語言表達能力、反應互動能力、數位科技應用能力，且個人風格較顯著；「語言表達」、「分析、歸納或邏輯思維」、「人際互動能力」是他們在公關相關課程共同最期待獲得的能力。2. 轉銜課程先修生在課程核心素養「公關內容認知」、「公關溝通功能」、「公關形象影響力」面向的公關領域知能皆顯著高於期初；轉銜課程先修生在對於「公關職涯」面向的認知顯著高於未參與翻新課程之學生。3. 透過轉銜先修課程，公關內容認知、公關形象影響力的瞭解，與學生未來修習公關領域課程或工作的興趣更為強化。

* 銘傳大學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 銘傳大學廣告暨策略行銷學系。

****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 銘傳大學新媒體暨傳播管理學系。

後疫砌兵— 色彩學基礎素養課程的創新教學模式研究

杜瑞澤*、朱谷熹**、蔡旺晉***、李傳房****

近幾年來在疫情影响下，設計教育的教學現場受到嚴重衝擊，包括課程規劃、教學策略等。而在與疫情重疊的期間，也正好是新課綱的啟動，讓課程中不管是老師或學生們，都必須面對教學環境與學習樣貌的改變。因此，當過往的教學模式與學習參與產生變化時，就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幫助學生達到有效學習。本研究主要針對色彩學課程，進行教學模式的創新與研究探討。研究方法則採用文獻分析及焦點團體訪談與討論，受測對象為雲科大三位色彩學課程授課教師，並進行相關資料收集與調查分析。本研究所得結果，建構了六項色彩學素養能力教學核心共識，包括：(1) 色彩的形成；(2) 色彩特性；(3) 色彩系統；(4) 色彩心理學；(5) 配色原理；(6) 色彩生活應用；其次在檢視課程及學習評量差異分析上，可發現都已超過50%的翻新程度。而在課程單元教學導入核心素養的比例為 39.32：43.69：16.99，與新課綱三個面向評核比例（40%、40%、20%）的交叉比對下，具有高度相似度，這說明了新課程的翻轉與新課綱的方向是一致的。最後本研究在彙整核心共識、課程與學習評量的核心素養導入後，提出建構創新教學模式之雛形，其建構步驟為(1) 取得教學核心共識；(2) 制定評核比例；(3) 新課程翻轉設計；(4) 建構以學生為主的學習評量；(5) 檢視單元教學的核心素養比例與三個面向評核比例是否一致；(6) 如無一致，調整核心素養項目，直到高度相似為止。因此根據本研究所獲得的前期調查研究階段性成果，可作為後續研究方向的參考依據，進而獲得更完整的創新教學模式，以供國內設計相關科系在色彩學基礎素養課程的翻轉教學之應用。

關鍵詞：新課綱、設計教育、色彩學、素養課程、創新教學模式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學研究所。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wangwang@yuntech.edu.tw。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the teaching site of design education has also been seriously impacted, including courses planning and teaching strategies. During the overlapping period with the epidemic, it also happened to be the launch of the new guidelines, so that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must face changes in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and learning style. Therefore, when previous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change, there is a need to rethink how to help students achieve effective learning. This study is mainly aimed at the course of color theory, conducted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the innovation teaching model.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embrac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and discuss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of 6 core consensus on color basic literacy of ability teaching, including: (1) color formation; (2) color characteristics; (3) color system; (4) color psychology; (5) color matching principle; (6) color life application. Second, 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nspection curriculum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renovation exceeded 50%. The proportion of core basic literacy introduced in the courses unit teaching is 39.32:43.69:16.99, which is highly similar to the three assessment-oriented proportions (40%, 40%, 20%) of the new guidelines, indicating that the new courses is highly similar. The flip of the new courses follows the direction of the new guidelines.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prototype of constructing an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after synthesizing the core consensu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courses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The construction steps are (1) to obtain a consensus on the core teaching; (2) to formulate the assessment ratio; (3) to flip the design of the new curriculum; (4) to construct a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assessment; (5) To examine the core of unit teaching, whether the competency-based of ratio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hree-dimensional assessment ratio; (6) If there is no consistency, adjust the core competency-based items until they are highly similar.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stage results obtained from this study, it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direction, and then a more complet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And can be obtained for the application of domestic design departments in the flipped teaching of basic literacy courses in color theory.

Keywords: New Guidelines, Design Education, Color Theory, Literacy Course,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l

外語人才科技賦能與永續議題初探 – 以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為例

周德嫻*、曾明怡**、劉紀雯***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的 Xplorer 探索者計畫以外語人才科技賦能與社會實踐為核心，運用前導課程的實作課程專題報告，引導學生關切全球永續議題，以適應疫後新常態，並培育學生之 5C 素養、自主學習、數位公民等二十一世紀知能。本研究乃正式行動研究前之前導研究，研究對象為 36 位來自不同主題課程（包含文化文學、科技應用溝通，與外語學習等）之外語學院學生，了解其在本學期運用數位科技 StoryMaps 故事地圖：數位敘事工具進行專題製作以及永續議題探究與呈現的看法以及其學習成果。

研究方法採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在量化方面，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分析不同語文領域學生對在課堂上運用科技工具進行專題製作以及探索永續議題的回饋，以及其 5C 素養、自主學習，與數位公民之二十一世紀知能；在質化方面，本研究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探究學生對議題的了解，以及課程規畫的看法。同時，將邀請前導課程之授課老師進行焦點團體訪談，針對學生專題製作之學習成果進行討論，討論聚焦於以下面向之異同：教師之課程主題設計、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數位敘事，與教師對學生學習成果之觀感。

在資料分析上，量化問卷方面使用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了解不同課程主題與各變項之間的差異及關聯性。同時，在質化訪談方面，本研究採扎根理論分析授課老師以及學生對於專題作品之數位工具應用及永續議題探究之不同看法。

初步研究發現，老師對新科技導入課程應用有技術上的挑戰，但也發現學生在敘事邏輯的差異；學生則對運用新工具接受度相對較高、引發自學的好奇心、認為數位敘事工具讓報告更具吸引力、透過議題探究啟發對永續議題的關注，學習到不同資料蒐集與資訊化敘事的能力。然而在技術方面，數位敘事工具的小組合作共編功能為必要條件，但也培養了跨文化/跨領域溝通與複雜問題解決的能力。

整體而言，語文背景學生在敘事能力較佳，以數位敘事探究並呈現永續議題，但在空間思考方面，修讀科技應用溝通課程學生表現較好。由量化與質化分析，本研究結果為：透過不同主題的前導課程，可以由教師與學生角度分析不同課程之學習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科技賦能」，學生數位敘事成品顯示學生「能夠」學以致用達成「學而後能」，但也可能將技能轉為素養，「學後（內化、轉移）更能」以及「未學而能（內化、轉移）」。藉此前導研究之結果，作為下學年參與 Xplorer 探索者計畫之各課程在推動課程創新方面的參考依據，後續並將根據結果運用以終為始的課程設計方法進行課程規劃改進。

關鍵字：永續發展目標、二十一世紀知能、課程設計、學習成果、科技賦能

*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126827@mail.fju.edu.tw。

**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023148@mail.fju.edu.tw。

*** 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034702@mail.fju.edu.tw。

第五場

- A. 中國（綠色）科技治理與發展
- B. 解析遷移：流動/無法流動
- C. 產業發展與空間 02
- D. 公民與行動

以代碼化拼裝體概念初探中國綠色金融科技 在一帶一路與數位絲路的發展*

劉秋婉**

中國在 2015 年推出互聯網+政策，並於 2016 年推出互聯網+生態政策。本文以中國螞蟻集團旗下的螞蟻森林為個案，期能初探中國綠色金融科技的內涵、實踐及其政治效應。螞蟻集團在 2016 年推出螞蟻森林程式應用平台，鼓勵支付寶用戶從事無紙化、線上支付、騎單車等減碳行動，累積綠能分數，當累積到一定分數，就會在中國西北荒漠種下一棵樹（Zhang et al. 2021:2）。目前針對中國綠色金融科技的文獻主要側重該私有科技企業如何借助金融科技的應用促進荒地綠化、或是銀行如何透過金融科技技術計算更為環境友善的借貸方案與識別同時有能力推行減碳商業模型又具備還款能力的放貸對象（e.g. Zhang et al. 2021; Zhou, Zhu and Luo 2022）。然而，尚未有太多文獻關注綠色金融科技的政治效應。針對中國綠色一帶一路方面的研究也尚未關照到中國綠色金融科技。隨著阿里巴巴與螞蟻集團在東南亞投資電商與數位支付平台，中國綠色金融科技運作的模式也可能輸出到東南亞的投資公司。本文嘗試以代碼化拼裝體（coded assemblage）（Kitchin 2017; Kitchin and Dodge 2011）初探中國綠色金融科技技術演進與平台整合的面向，並嘗試提出下一步分析的研究議程，來深入檢視中國綠色金融科技在中國國內與海外發展的政治經濟邏輯。

關鍵字：中國綠色金融科技、螞蟻集團（螞蟻森林）、代碼化拼裝體、一帶一路、數位絲路

* 論文初稿，請勿引用。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國科技企業與跨國治理：
以綠色金融科技分類架構的成形為例*

林竣達**

廣義來說，綠色金融科技（Green FinTech）可以泛指有助於環境保護及減緩氣候變遷的金融科技創新。儘管目前全球已有一些綠色金融科技的實踐案例，但學界及業界對綠色金融科技的內涵及範圍仍尚未發展出共同標準，這將導致漂綠的風險。針對此問題，國際上已有組織試圖發展金融科技或綠色金融科技的分類架構，而中國的科技企業也正參與在此過程中。本文主要從跨國治理的觀點，以過程追蹤的方法，分析現有綠色金融科技分類架構的形成過程、內涵及限制。此外，本文也試著回答在跨國綠色金融科技治理中，中國的科技企業扮演了何種角色。

關鍵字：綠色金融科技、跨國治理、永續分類、螞蟻金服、UNEP Inquiry

* 論文初稿，請勿引用。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一帶一路下的孔子學院- 以東南亞為例

黃彥誠*

中國國家漢辦自 2004 年後推動孔子學院以來，數量在全球範圍不斷上升，成為中國公共外交、文化影響力「走出去」的重要一環，於 2020 年改設為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undation，簡稱 CIEF），具官辦非政府組織的色彩（GONGO）。相較孔子學院在西方國家所引發之許多隱憂（如 Hamilton 2018; Manthorpe 2019），孔子學院在東南亞較少受到質疑（相對於大壩、鐵路建設）。然而東南亞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重點區域，一帶一路沿線進出口總額的前 10 個國家有 6 個是東南亞國家，其孔子學院數目亦為全球最高（24%），與中國在雙邊經貿、文化交流之密切程度相當值得關注。中國 2015 年發布之《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提出「五通」，孔子學院正是「民心相通」的基礎之一。本文將以東南亞的孔子學院為焦點，進行文獻回顧，梳理與一帶一路政策的關聯或所造成的影響，並進行綜合分析。

關鍵字：一帶一路、孔子學院、東南亞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生。

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規範擴散與極限： 一個世界體系論的觀點*

黃兆年**

國際社會日益關注中國數位威權主義對現行網路世界秩序所帶來的挑戰，本文旨在探討其對不同國家、區域、或全球範圍的影響幅度差異，及其背後的條件因素。受到世界體系論與文化霸權論的啟發，本文主張：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的網路規範在國際體系的擴散程度與極限，取決於中國的數位科技發展程度在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中所佔據的地位。假如中國的地位相對於某國而言更接近「核心」（「邊陲」），則其「網路主權」規範向該國擴散的可能性便越大（小）。而「國際組織」則是連結數位科技宰制／依賴與網路規範擴散的主要作用機制。本文以個案研究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並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沿線的開發中國家作為主要的研究個案，同時以歐美為主的已開發國家作為對照。

關鍵詞：中國、數位威權主義、網路主權、規範擴散、世界體系論

Concerns have arise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bout the challenge that China's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brings to the existing cyber world order.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influence it causes o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their underlying conditions. Inspired by the world-systems theory and the cultural hegemony thesi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xtent to which China's digital authoritarian norm diffu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inges on the status of China's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f China's position relative to a specific country is corer (more peripheral), then the likelihood that China's cyber sovereignty norm diffuses to that country will be higher (l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the primary mechanism linking economic dominance/dependence to norm diffusion. Case investigation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versus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ducted to examine and confirm the proposed theory.

Keywords: China,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cyber sovereignty, norm diffusion, world-systems theory

* 本論文係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11-2636-H-004-002-）之部分成果，以初稿形式發表於 2022 年臺灣發展研究學會年會。特別感謝研究助理蔡守昂、周迦萱協助資料蒐集及整理，但文責仍由作者自負。歡迎提供評論與建議，唯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引用。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jnhuang@nccu.edu.tw。

留不住，走不了一 臺灣人才回流的多重空間經驗與資本積累

宋郁玲

全球化的時代，多方向，無終點的人才流動已經是常態。在這前提下，本研究以自「南方國家」--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回流或者再流動的台灣人才為對象，有別於慣常的南-北遷移的全球流動空間架構，而是當前更為明顯的南-南遷移模式，以探討他們往中國與東南亞流動，以及回流或再流動的過程，以不同空間尺度的網絡連結，對不同地方造成的影響為何，釐清什麼是「人才」，而「人才流失」與「人才回流」的拉扯中，究竟誰在什麼樣的資本積累，知識轉移與社會網絡建構與權力幾何的差異化下，是 in place 而誰 out of place，呈現南-南人才流動的空間、權力與社會流動的關係。本論文為進行之研究，本次以 45 位受訪者作為探討對象。透過質化研究的半結構深度訪談與主題分析，發現在領域性上，頻繁往返於工作地與台灣之間，並且把前往「南方」工作視為規避風險（失業），累積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的途徑之一。因規避風險而流出的人才，具有清晰的「國家」與「邊界」概念，而積累經濟，文化與社會資本者，其「國家」尺度的「離鄉背井」或「中國夢」的敘事並不鮮明，取而代之的是「亞洲」，「全球」的領域概念。則而回流台灣，仍維持類似的領域概念。知識技能的轉移，在空間規模依賴性較弱的產業，能在回流台灣後重新被轉換利用，但並非在地化，而是整合產業屬性與全球市場的新知識技能，並成為累積經濟資本的重要條件，創造了 in place 的在地連結。反之，對空間規模較具依賴性的產業，回流後的人才產生了 out of place 的在地經驗。內化的文化與社會資本，是人才流動過程較明顯的資本積累，但回流台灣卻未必能轉換為經濟資本，也未構成自我認知上的社會流動，反而成為一種勾勒自我認同的素材。原先移往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年輕人才，在產業屬性相關的文化與經濟資本產生分化，因而，出現部分回流人才產生相異的人才階層，或者衝擊「人才」本身的定義。本研究呈現出南-南遷移的時空框架下，台灣與中國及東南亞的產業連結與空間分化，造成台灣人才的殊異性，以及回流後與地方之間 in place 與 out of place 的相異關係，同時也彰顯了「人才」概念的複雜性。

關鍵字：台灣人才回流，資本，領域化，中國，東南亞

學術資本主義下臺灣學生跨國留學流動性的建構

許嘉文

全球流動人口不斷攀升，國際移民改變了世界的樣貌，全球城市、移民政策、跨國企業呼之欲出，人力資本的爭搶變成各國家的課題，留學生作為高技能人才的前身，其流動也與未來路徑息息相關。2000 年後因應教育改革，大學生數量大幅提升，相應留學需求也隨之上升，國際學校間的競爭也造就了與以往不同的留學模式，留學族群也不再是高材生的專利，而漸漸走向中層化，跨國留學做為一種文化資本再生產的流動，然而隨著學術商品化的演進，留學已經不單只是知識轉移的過程，國外旅遊、學習語言、移民簽證、價格與學生組成都被包裝在商品之中，留學成為多種目的性的複合決策，不同類型的參與者加入，打破了過去單一的流動方式。本研究將聚焦於中層化的留學流動改變，企圖以 Bourdieu 的資本理論分析中層學術資本留學生的流動性與跨國空間如何被建構，為理解學生認定的最短路徑的成因，研究假定了三個參與的角色：需求者—學生、供給者—高等教育學校、協助者—中介機構，將主要問題拆成不同參與者的面向，能夠看見彼此間的利害關係。預期成果能夠從高等教育中的中層學生，其軌跡中找出其中能動力(motility)與移動間的相互作用，受訪者的決策中概念化其中的資本再生產過程，最終從全球教育市場的角度探討臺灣教育環境與勞動力市場。

關鍵字：流動、國際學生、資本、中介

The global mobile population is ris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as changed the face of the world, with global cities,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on the horizon. The struggle for human capital has become a national issue. As the predecessor of highly skilled talents, the mobil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path. After 2000, in response to the educational reform, the number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corresponding demand for studying abroad also increased, and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schools also created a different study abroad model than before. The study abroad group is no longer the patent of high-caliber students, but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the middle level, transnational study abroad as a flow of cultural capital reproduction, but with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commercialization, Studying abroad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foreign travel, language learning, immigrant visas, prices and student composition are all packaged in goods, and studying abroad has become a composite decision for multiple purposes. Different types of participants joined, breaking the single flow method of the past. This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change of middleing study abroad flow, and attempt to use Bourdieu's capital theory to analyze how the mobility of middleing academic capita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transnational space are construct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e shortest path identified by students, the research assumes three roles of participation: demander-student, supplier-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and facilitator-intermediary, and divides the main problem into different participants, and can see the interests between each other. The expected outcome is to identif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tility and mobility in the trajectory of middleing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conceptualize the capital reproduction process in the respondent's decision-making, Finally, Taiwan's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labor market a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education market.

Keywords: mobil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apital, agency

移居花蓮的農業實踐

遲恆昌*

花蓮人口近年逐年下滑的同時卻有一群人移居至花蓮，本研究關注這些國內移居行動者的遷移動機與軌跡，比較從外地的移居者與返鄉者從事農業的歷程。研究以 Halfacree (2006) 的鄉村空間三重結構角度討論移居者的鄉村在地性、生活與再現，並以關係性視角再探移居者的空間遷移與農業實作，資料收集通過半結構深入訪談並追蹤部分移居者對於遷移、農業與鄉村空間的實踐與看法。本研究指出返鄉者多數因社會關係的拉力而返回花蓮定居從農，部分外地移居者受到鄉村田園 (rural idyll) 的拉力吸引而尋求鄉村生活，兩者在推力的共同點是資本主義都市的生活節奏與生產模式。從關係性視角上本研究討論移居從農者與都市生活的斷與連，與親屬關係與土地的連結、非慣行農業實作與鄉村的地景的關係。

關鍵字：國內遷移、農業、鄉村空間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hcchi@cc.ncue.edu.tw。

我能在鄉村找到身心平衡嗎？ 返土歸農女性在另類農食網絡裡的自我關照與健康福祉

黃紫翎

本研究探討「返土歸農」女性的移居動機，並探討她們參與另類農食網絡（AAFN）和臺灣農村社區的關懷倫理。當代的返土歸農女性移民體現了廣泛的性別和專業背景。她們大多數與鄉村居民的情況不同；傳統上，鄉村和女性氣質與流動性限制有關。本文仔細研究了他們從事農業的動機及其隨後的經歷。28 名參與者有一些共同點，包括最初對那些在都會生活的高度規範下感到不適應的人，以及他們渴望在鄉村獲得幸福、健康和更全面的「自我關照」（self-care）。本文採用女性主義政治生態學與情感轉向的身體政治生態學的觀點，關注自我關照的倫理學。通過對返土歸農女性的訪談和參與觀察，作者發現這些女性通過以自我關照的生活，適應她們從都市搬遷自鄉村的變動，甚至與他人合作將這種關照與自然環境的需求聯繫起來。本文認為，他們以另類農食網絡開始他們的關照工作，成功地與作物、鳥類、昆蟲等生態系統與在地社群建立了聯繫。

關鍵詞：返土歸農、另類農食網絡、女性主義政治生態、情感轉向、自我關照、身體體驗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motivations of "back-to-the-land" women migrants and explores their involvement with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AAFN) and the ethic of care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Taiwan. Contemporary back-to-the-land Women migrants embody a broad spectrum of gender and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Most are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from rural residents; both rurality and femininity are traditionally connected to mobility constraints.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heir motivations for engaging in farming and their subsequent experiences. Certain commonalities are shared by the 28 participants, including initial discomfort with those who were uncomfortable with life in the regulated city and their craving for well-being, health, and more excellent "care of self"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article uses the approach of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and focuses on the ethics of self-care. Drawing from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back-to-the-land" female migrants,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se women performed femininity consistently through living and farming with an ethic of self-care. They even apply this care in relation to the needs of natural environment through collabor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y succeeded in forging connections with the community of people, plants, birds, insects, and their environment by starting their care works with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Keywords: Back-to-the-land, Alternative agri-food networks, Feminist political ecology, affective turn, self-care, body experience

回鄉？創生？宜蘭青年返鄉與地方藝術季發展

林姿萱

過去關於青年遷移的研究，可以看出許多國家都同樣有著鄉村地區青年人口流失的問題存在，而在研究青年返鄉的議題中，以往大多都是從他們的動機以及需求來進行討論，對於是什麼因素會進一步影響到青年留鄉的決定是過去較少被提及的。然臺灣過往所推行的社區總體營造，抑或是現行的地方創生，在為了提升觀光的附加價值面向，多數人會選擇以文化活動或是節慶的方式來進行推動，而這些行動除了純粹的經濟取向以外，當中亦涉及許多非經濟層面的考量，如情感、家庭、同儕等等。本研究即選擇以宜蘭縣為研究區，探討宜蘭返鄉青年從事地方藝術季，來了解他們投入地方發展的過程，從中所獲得的經濟/非經濟因素是如何影響他們對於留鄉的決定，以及探討這些返鄉青年的社會路徑是如何建構出來，他們又創造出了何種空間關係，與地方的互動是否達到公民參與和實踐，並達到永續性的目標，並且使用 Bourdieu 的資本理論與生命歷程的概念作為框架來進行討論。研究方法則選擇以參與觀察法進行，另外也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法，針對 21 位曾投入參與宜蘭地方藝術季的返鄉青年進行深度訪談，並使用主題分析法將資料進行系統性的分析，預期研究成果為釐清青年返鄉的歷程，以及他們對於留鄉的考量，並進一步回饋到政策的面向。

關鍵字：青年返鄉、地方藝術季、留鄉

Past studies on youth migration have shown that many countries share the same problem of youth de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In the past, most studies on youth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erms of their motivations and needs, but the factors that further influence the decision of youth to stay in their hometowns have been less frequently mentioned. However, in the past, most people chose to promote cultural activities or festival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dded value of tourism in Taiwan's community master building or the current Local Revitalization. In this study, we chose Yi-lan as the study area to explore the local arts festivals of Yi-lan's young returnees, to understand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local development process, how the economic/non-economic factors they gained influence their decision to stay in their hometown, and to explore how the social paths of these young returnees are constructed, what spatial relationships they create, and whether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community achieves civic participation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sustainability. The study also uses Bourdieu's concepts of capital theory and life course as a framework for discussion.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was based o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21 returning youths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Yi-lan local arts festivals.

Keywords : youth returning 、 local art festivals 、 staying hometown

都市多樣化產業群聚— 以內湖科技園區資訊系統整合產業為例

高甫承*

內湖科技園區短短十年內產值破兆，超越其他科學園區的表現，已被各界認為是「內科奇蹟」。既有研究以競爭優勢及行銷觀點，或是強調由下而上的市場力量促使政府因勢利導，調整容許使用項目放寬進駐產業，作為其成功因素或發展路徑，但這樣的觀點忽略了其發展過程的偶然性，以及內湖科技園區所處的外在區位條件。同時，既有研究大多也以典型研究科學園區的視角，包括發展園區的要素，以及園區的政策及制度因素來進行，這樣的研究視角，忽略了內湖科技園區與其他產業園區本質上的差異：園區制度型態、產業組成型態以及外在區位條件。

本文認為內湖科技園區的園區制度型態及外在區位條件，有別於其他科學園區及產業園區，進而影響園區的產業組成型態，因此，需進一步釐清內湖科技園區的性質與條件，並且回應看似能以市場力量主導的偶然。另一方面，也需要從資訊系統整合的產業特性切入。本文發現，由於資訊系統整合業者客戶導向的特性，使其需要靠近都市，也造就內湖科技園區形成的偶然。另外，由於新興科技帶動的數位轉型需求，以及其衍生新的智慧應用及商業模式，都市多樣化環境，更為適合發展小量、多樣且更趨於複雜的資訊系統整合產業發展。

關鍵詞：產業園區、創新網絡、資訊系統整合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The output value of Neihu Technology Park has exceeded one trillion in just ten years, surpa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other science parks, and has been regarded as a ‘miracle of Neihu Technology Park’. Existing studies tak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marketing point of view, or emphasize bottom-up market forces to prompt the government to adjust the land use regulation to relax the entry into the industry, as its success factor or development path. But this ignores the contingency of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e location conditions of Neihu Technology Park. At the same time,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are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ical research on science parks, including the elements of developing the park, as well as th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the park. Such a research perspective ignore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Neihu Technology Park and other industrial parks: Institutional pattern of the park, industrial pattern and locational requirement of the park.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ark type and locational requirement of Neihu Technology Park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science parks, and thus affect the industries in the park.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nature and conditions of Neihu Technology Park. And responding to contingency that seem to be dominated by market for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This paper finds that due to the customer-orien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it needs to be close to the city, which also creates the accidental formation of the Neihu Technology Park. In addition, due to the demand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new smart applications and business models derived from them, the urban diversified environment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small, diverse and more complex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industry.

Keywords: industrial Park, innovation network, information system integration

能源轉型中的技術學習： 臺灣風能產業的快速跟隨與產業聚落

曾聖文*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在政府所設定能源轉型的極短時間中，對於臺灣風能產業結構的影響為何？臺灣本土風能廠商以哪種策略去調適因應？本研究透過對產、官、學、研的訪談蒐集初級資料，並使用政府報告及統計數據做為輔助資料，去分析臺灣風能產業的產業結構和技術學習。本文的研究發現包括：(1) 臺灣風能產業鏈現階段已包括風能製造業、風能服務業及風能發電業等完整產業鏈。由於技術水準及工程經驗上的限制，臺灣風能廠商主要學習對象是歐洲領導廠商，並在短時間內建立起國際學習機制。(2) 臺灣在控制系統、電力系統、齒輪箱、離岸大型風力機、工作船等子產業的技術、經驗及產品驗證等工作實績仍十分不足。這些子產業的廠商基本上仍扈從在國際大廠的全球價值鏈中，持續學習以累積工作實績與品牌聲望。(3) 從產業鏈的角度，鋼材、碳纖/玻纖、樹脂、塔架、葉片等子產業，是臺灣具市場競爭力的風力發電產業群。這些子產業的廠商透過國際學習、聯盟平台學習、內部自我學習和向前（供應商）要求等策略，進行快速學習以跨越技術門檻。(4) 在風場開發、規劃、營造與維護等子產業，由於臺灣廠商較能掌握在地環境和生產資源（人員、物料、設備），因此面對國際投資商具有雙向需求與議價能力。

關鍵詞：能源轉型、技術學習、臺灣、風能、產業聚落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副教授。

1. 作者感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原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10-2410-H-019-MY2）計畫經費的支持，使得本研究得以順利進行。
2. 本文為研討會會議論文初稿，請勿引用，謝謝！
3. 作者簡介：現任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可再生能源、環境治理、區域治理、永續發展與文化產業。
4. 作者聯絡方式：地址：20224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電話：(O) 02-24622192 轉 2060/2002；(F) 02-24632371。Email：swtsengtw@email.ntou.edu.tw。

從空間經濟之視角分析產業韌性

鄭安廷

韌性 (Resilience) 一詞被提出以作為氣候變遷下的回應行動時，這個概念被許多領域冀望成為永續性理論框架下的具體操作原則，其中亦包含經濟韌性。經濟韌性來自於被廣泛應用於工程、生態或調適觀點的回復力概念，並強調韌性系統會邁向單一均衡狀態的觀點。在眾多經濟韌性面向中，產業系統的韌性對以製造業為主的經濟有最大的影響，而工業發展的複雜交互關係的相關研究更包含聚集經濟 (agglomeration economics)、工業地域 (industrial district) 及產業群聚等，單一主題恐怕皆無法作為經濟韌性全貌的解釋。

鑒於國土規劃者及產業空間政策制定者理解經濟韌性的重要性，卻往往無法在空間上對於產業區域判斷取得足夠的資訊。本文擬以產業長時間的存活表現為觀察標的，嘗試建置我國的產業空間資料庫以豐富產業空間計畫之內涵，包含各年度產業空間分布，探討不同產業空間的新生、存活及死亡情形，並計算各產業空間上的平均存活時間，以及聚集型態的基礎資料，包含各年度的空間聚集與產業聚落的變化。未來期以國土計畫觀點，探討土地使用分區與經濟韌性之關聯性，以及對產業、國土政策與資源投注之應用與啟示，提供政府在規劃國土資源使用方式時本於科學有所依據。

關鍵詞：空間經濟、產業韌性、企業存活、產業聚集、工業地域

As the term Resilience was thought as a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the concept was seen by many as a concrete operational strateg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sustainability theory, including economic resilience. Economic resilience comes from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that is widely used in engineering, ecology, or adaptation perspectives, and emphasizes the idea that a resilient system moves towards a single equilibrium. Among the many economic resilience dimensions, the resilience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the manufacturing-oriented economy. While the study of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cludes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cs, Industrial regions, industrial region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 a single theme may not be an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resilience.

Although spatial planners and industrial space policy maker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resilience, they have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on industrial planning. This study intends to take the long-term survival performance of the industry as the target, and tries to build Taiwan's industrial space database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industrial space plan, including th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in each year, the newborn, survival and death of firms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places, and the average survival time of each industrial place. Besides, explores the basic data of the agglomeration, including the changes of spatial aggregation and industrial settlement in each year.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could utilize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lann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oning and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provide the government with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Key words: spatial economic, industry resilience, firm's surviv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dustrial district**

美國關鍵供應鏈政策對臺灣產業的影響：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

施柏榮*

美國於 2021 年 2 月簽署《美國供應鏈行政命令》，並且提出眾多方案來確保與強化美國供應鏈的安全性。該行政命令清楚地指出半導體等產品，有高度集中於東亞區域的現象，以及指出臺灣是全球核心的生產國家，並且在全球半導體的供應鏈扮演關鍵的角色。本研究聚焦《美國供應鏈行政命令》為核心的美國關鍵供應鏈政策對於臺灣半導體產業的影響與衝擊，並且嘗試與全球生產網絡等理論進行對話。首先，就美國關鍵供應鏈政策進行分析，並且指出相關的政策舉措，應放置在當前全球化的政治經濟脈絡之下來探索；其次，本研究嘗試分析在此一過程之中，臺灣晶片代工企業（Foundry）與無廠半導體企業（Fabless）所提出的在地策略回應。美國關鍵供應鏈政策必須被放置在歷史時間，以及當前獨特政治經濟脈絡之下來加以理解，本研究也試圖以臺灣半導體產業為經驗案例指出，它即是「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的動態過程。

關鍵字：半導體、關鍵供應鏈、全球生產網絡、再全球化、國家安全

On February 2021, The White House issued an Executive Order, “America's Supply Chains” which directs several actions to secure and strengthen the supply chains of United States. This Executive order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semiconductors and IC (Integrated Circuit) are highly concentrated in the region of East Asia and emphasized Taiwan is a major manufacturing country and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s of American critical supply chains policies on Taiwa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nd dialogues with relevant theories. First, it explores the policy formation of American critical supply chains policies in the political-economic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Secondly, it depicts the “strategic local responses” of Taiwan’s semiconductor companies (foundry & fabless semiconductor company). It is therefore argued that American critical supply chains policies must be analyzed in its uniqu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economic contex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ritical supply chains policies as a dynamic process of “Re-Globalization”.

Keywords: Semiconductor, Critical supply chain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Re-Globalization, National security

*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生，e-mail: d10544002@ntu.edu.tw。

當代台灣地方型公民社群的形成—— 璞玉田的抗爭、韌性與創生

李天健*、邱星歲**、錢克瑋***

鄰近新竹高鐵站旁的四百多公頃璞玉田，位於竹科與周遭地方社會之前線，直接承受由園區發展產生的城市擴張壓力，歷經開發爭議近二十年。

竹科是台灣近四十年產業發展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也是台灣在世界生產體系中，從邊陲走向半邊陲的主要驅動力。然而，這一階段科學園區發展的社會影響劇烈，包括公共空間私有化、傳統社群意義感潰散、地域紋理消滅、地方知識商品化、公有與私有開發壓力日益增加，鄉村成為「城市」需求的外溢處，日益惡化的消費性城鄉關係，使大新竹區域的地方社會主體漸趨弱化。

在璞玉田案例中，持續不停的開發爭議，在近幾年引發許多大新竹區域各界公民的關切，展開萬人連署守護農地運動，運動結束之後，進而聚集成永續經營的地方型公民社群，與在地鄉親合作開創地方發展的不同想像。

不同於過往農地保護抗爭運動，如大埔、灣寶等，多以在地鄉民為主，在抗爭過程中經歷「鄉民→公民」的歷程，形成公民意識，外部公民主要為聲援角色；璞玉田案例早期同樣也有一群鄉民起而保護家鄉，發起抗爭運動，但近幾年由大新竹區域各界公民聚集形成的「地方型公民社群」，則是由外而內，在守護運動之後，仍持續參與璞玉田的地方創生，呈現「公民→居民」的新型態公民社群樣貌。

這一股在璞玉田抗爭與創生歷程中形成的「地方型公民社群」，其具體樣貌與特徵為何？形成於何樣脈絡？能否支持地方重建主體？如何回應、調節甚至轉化園區發展對地方社會的影響？對於大新竹地區的區域發展有何啟示？本文將分析這一段自 108 年至今的公民社群參與歷程，從中討論上列相關問題。

關鍵字：公民社群、地方創生、城鄉關係

* 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助理教授。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博士生。

*** 國立清華大學厚德書院導師暨清華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臺灣民眾對再生能源發展的多重偏好

李俊鴻、陳興芝

土地利用對社會生態系統的影響不僅限於特定能源的開發，任何能源供應方式都會產生積極和消極的影響。我們建立了臺灣多重偏好和社會認可下的可再生能源項目 (REP) 評估框架。使用選擇實驗 (CE) 方法，基於隨機參數 logit (RPL) 在多種和替代偏好 (即太陽能、風能、廢棄物和生質能、地熱能和碳稅) 下估計公民的異質性偏好 (HP) 模型，在潛在類別模型 (LCM) 下根據人口統計和社會接受度 (即市場、社區和社會政治接受度) 對公民的偏好類型進行分類，並評估邊際支付意願 (MWTP) 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潛在情景。結果表明，綜合屋頂和地面型太陽能發電廠、陸上和海上風電場、生物質發電和地熱發電系統是 REP 引人注目的發展屬性。影響公民對 REP 發展偏好差異化的特徵是 1) 年齡，2) 北部地區與其他地區的公民觀念，以及 3) 月收入。集成 REPs 開發計劃包括太陽能電池板、風能、廢棄物和生質能，與其他 REP 方案相比，地熱能具有最高的 MWTP 值。

關鍵詞：可再生能源、社會接受度、多重偏好、政策情景

The impact of land use o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is not limi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fic energy sources, and any energy supply method will hav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We established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REPs) under multiple preferences and social acceptance in Taiwan. Using choice experiment (CE) methodology, estimating the citizen's heterogeneity preference (HP) under multiple and alternative preferences (i.e., solar power, wind power, waste and biomass power, geothermal power, and carbon tax) based on random parameter logit (RPL) model, classifying the citizen's preference type with their demographics and social acceptance perspectives (i.e., market, community, and socio-political acceptance) under latent class model (LCM), and evaluating the marginal willingness to pay (MWTP) for the additional tax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scenarios of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grated rooftop and ground-type solar plants, land-based and offshore wind farms, biomass power, and geothermal power systems are compelling development attributes of the REP.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itizens' preferences towards the REPs' development are 1) citizens' perception of REPs' development, 2) attitudes toward social acceptance of REPs, and 3) monthly income. The integration REPs development program incorporates solar panels, wind power, waste, and biomass power, with geothermal power having the highest MWTP values compared to other REP scenarios.

Keywords: Renewable energy, Social acceptance, Multiple preferences, Policy scenarios

吃貨萬歲？： 在民主社會追求美食的正當性

向明珠*

「吃貨」表示對於飲食特別在意的一群人，本來帶有戲謔的成份，如今卻成為一種正面形象（自詡為吃貨）。從「吃貨無罪」（為自己的貪食辯護）到「吃貨萬歲」（吃貨對社會有所貢獻），反映出經濟生活中的一種文化性的轉變：為什麼人們開始認為追求美食是具有正當性的？我們應該更看重美食嗎？或是應該適可而止？本文回顧飲食研究的文獻，近年來呈現巨量成長，食物運動成為社會學的重要研究議題。在 Josée Johnson 和 Shyon Baumann 以及 Isabelle de Solier 的「吃貨」研究中，吃貨以「雜食性」品味的面貌出現，「美食」的範圍擴大。有一個爭議在於當世界名廚們登高呼籲拯救被工業化飲食包圍的大眾以及脆弱的地球生態，美食的階級性愈來愈隱諱地隱藏在吃貨的開放民主表象裡。本文認為民主社會要求的平等恰恰與吃貨所追求的美味區辨形成緊張關係，然而吃貨作為一個業餘愛好者，不僅是消費者，同時也是一個做中學的道德生產者，則能拓展品味，對於低端的工業食品品質也能有所提升。本文在結論回顧在臺灣這個美食興起的年代，重新省思物質文化，其積極意義即為橋接個人熱情與社群倫理。

關鍵字：飲食、雜食、階級、業餘愛好者、食物運動

"Foodies" refers to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food. In recent years, they have gained a positive image. From "foodies are innocent" (justifying one's own gluttony) to "long live the foodies" (the foodies'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this suggests a cultural shift in economic life: pursuing tasty food has been deemed as a priorit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iterature on diet, which has shown tremendous growth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food movements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 population research topic in sociology. In the studies on "foodies" written by Josée Johnson and Shyon Baumann (2010) and Isabelle de Solier (2013), foodies appear as "omnivorous" tastes, and the scope of "food" expands. There is more controversy between industrialized diets, tasty food,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omnivorousness, as a cultural consumption pattern for high-status individuals, meshes well with the classless nature in the democratic societ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equality required by a democratic society is precisely in tension with the taste distinction pursued by foodies. Amateurs, however, are not only consumers, but also producers who learn by doing. It is also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dustrial food. At the end of the article, reflections on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food, and its positive role in bridging personal enthusiasm and community ethics.

Keywords: diet, omnivore, class, amateur, the food movements

*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餐桌上的社會運動：
從「慢食」拿回原住民族「食物主權」-
花蓮縣「原住民族野菜學校」實例探討

王梅*、黃錦山**

食物主權成為國際社會運動是近三十年來的發展趨勢，為了對抗國際大財團掌控食物鏈的生產與銷售，不僅撼搖了各國傳統飲食文化結構，掠取食物取得和料理方式，甚至勞動市場也受到衝擊，農工階級遭受剝削，各國小農團體紛紛展開跨國串連，掀起了為食物正義而戰的國際呼聲。1986年興起於義大利的「慢食運動」，提出了《慢食宣言》，標榜「優質」、「乾淨」、「公平」三大宗旨，更是掀起一場全球性的飲食革命，全球已有122個國家、83,000名會員參與慢食運動。2004年，國際慢食協會在義大利 Pollenzo 成立了世界第一所「美食科技大學」(UNISG)，以科技整合提升學術研究水準，並將傳統農業知識建立資料庫，影響性迄今持續不墜。2015年，聯合國提出SDGs永續發展17個目標與168項指標，與慢食運動的三大主張不謀而合。

聯合國農業組織（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指出，原住民族的飲食傳統習俗對於永續發展與自然資源保護具有高度貢獻，然而，原住民族百年以來卻不斷遭受各種外來殖民政權與跨國經濟勢力打壓，導致食物主權蕩然無存，臺灣的原住民族也無法倖免。2000年，臺灣原住民與國際慢食運動接軌，並開始受到啟蒙，似乎找到拿回食物主權的新契機。2020年，花蓮縣成立了全國第一座「原住民族野菜學校」，被視為原住民推動食物主權運動的重要里程碑，並正式取得議題倡導的發言權。

關鍵字：食物正義、食物主權、慢食運動、原住民族野菜學校

*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班。

** 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Food sovereignty has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n order to resist the control of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he food chain by international conglomerates, small farmer group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have launched cross-border connections, raising international calls for the fight for food justice. The "Slow Food Movement" that emerged in Italy in 1986 put forward the "Slow Food Manifesto", which advertised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good ", "clean" and "fair". 83,000 members in 122 countries participate in the Slow Food movement. In 2004, the International Slow Food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the world's first "University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SG) in Pollenzo, Italy,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academic research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to build a databas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its influence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In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proposed 17 goals and 168 indicator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DGs,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three major propositions of the Slow Food Movement.

The United Nations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pointed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dietary customs of indigenous peoples have a high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digenous livelihood systems and related knowledge can solve food security, nutritional deficiencies, poverty, environmental damage, etc. However, the aborigines have been suppressed by various foreign colonial regimes and transnational economic forces over the past century, and the aborigines in Taiwan have not been spared. After 2000, Taiwan's aborigines have integr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low Food movement and have been enlightened. It seems that they have found a new opportunity to regain food sovereignty. Eastern Taiwan is in full swing to promote the Slow Food movement. In 2020, Hualien County established the country's first "Aboriginal Wild Vegetable School", which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promoting the move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s' food sovereignty, and officially dominates the issue.

青年群體的社會參與- 以花蓮 193 縣道拓寬爭議為例

曾子睿

「社會參與」是指以個人力量向外界擴散，融入社會群體後，共同為某個訴求或目的努力的過程。本研究關注行動者如何投入社會參與，而其過程又如何與其他行動者互動。就此，以花蓮 193 縣道拓寬爭議事件為例，並將焦點聚集社會參與議題研究中較少被關注對象-學生群體，探討學生群體在社會參與行動中的組織動員以及與其他群體在行動中的互動，進而理解學生群體投身於地方倡議行動與個人對於地方認同感之提昇的關聯性，以地方與自我認同的概念切入。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路徑，針對參與事件的群體，依學生與非學生的身份劃分為兩類後加以討論，前者延伸至中學生與大學生（國立東華大學與慈濟大學）的參與；後者則著重在 NGO、專家學者如何看待學生的參與，以與學生相關的群體為主軸，進行深度訪談，加以分析學生群體參與行動的管道，及其與非學生群體間的關係網絡。研究分析發現，學生群體在 193 縣道事件的抗爭行動中基本上是扮演輔助的角色，不僅為反對開發的 NGO 群體提供動員時的人力，更協助 193 縣道事件被地方上更多人所看見。而學生群體之間並非均質，不同的學籍屬性讓兩者在社會參與的程度產生區別，同時中學生與大學生在身份的差異，也為 193 事件帶來不同層次的擾動。

關鍵字：花蓮 193 縣道、拓寬爭議、青年參與、組織動員

"Social participation" means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personal power to the outside world, integrating into the social group, and working together for a certain appeal or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discover how actors engage i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how they interact with other actors. Take the controversy with the widening of the 193 County Road in Hualien as an example. The object of discussion is the group of students that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in the research on social participation issues. Exploring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between the student groups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student groups in the 193 County Road widening controversy. This study uses in-depth interviews to investigate the student-related and it divides student identities into two categories: student and non-student groups. First, analyze the channels of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the student groups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 the 193 County Road widening controversy. Second, put forward a propositi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student groups and integrate the views of the student group and the non-student group. At last, define the role of the student groups engage in social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student groups are supporters in the protest of the 193 County Road widening controversy. They not only helped the NGO group—Citizens of the Earth, which represents the opposition to development. Student groups provided mobilization manpower but also attracted public attention.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age and educational systems among student groups, which lead to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Because of the distinction in educational system, it may promote further discussion about the 193 County Road widening controversy.

Keywords: 193 County Road in Hualien `widening controversy `youth involvement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第六場

- A. 人與非人
- B. 認同、文化與關係
- C. 新冠疫情下的社會與區域發展
- D. 國際發展與合作
- E. 邊緣與危殆

「照顧人，照顧土地」： 園藝治療下的多元照顧經驗

應尚樺

伴隨社會福利政策與國家計劃的長期支持下，照顧被視為一種資源需求與挹注的施為。園藝治療，以提供綠色照顧的服務，成為社區照顧（community care）的一環。藉由計畫的期待與資源的支持，由上至下挹注的供需與分配邏輯，同樣影響園藝治療的操作，進而架構出特定的主／客關係：個案作為需求者，而植物則是資源。

此份研究，我以東部一間長期提供園藝治療服務的機構為案例，透過參與觀察、深度訪談、次級文本獲取田野資料。理解鑲嵌於特定計畫、空間的園藝治療在地經驗。園藝治療的操作中，照顧具雙層意義：其一是照料植物的日常生活，讓植物可以活下來（make to live）；另一層面，則以服務對象與其他生命互動的過程，提升健康與福祉。而本文揭示出團體中的照顧關係，並非是單向且恆定的，而是一種多元、複雜的互動樣態。人類並非僅為被照顧的個案，植物亦非是以服務對價的資源，能動性（agency）在關係的形成扮演重要的作用力。為了維持植物的生命力，其屬性的揀選與適應，是園藝工作中其一的考量。

園圃是主要的施作空間，同亦是多種且不同的行動者組成的現場。園圃中的植物，不僅源自於計畫的挹注，也來自於人類行動者的分享和交流，伴隨不同植物的移除、移動與加入，除了生產出更為適地適性的種植組合，也改變了人類的選擇。這揭示出，園藝治療中的人類與植物，是一系列以互動、考量與協商為基礎形成的照顧實踐，並且是一種更為彈性、多元，但兼具社會意義的日常經驗。

關鍵字：人類—植物、關係、照顧、能動性、園藝治療

With the supporting of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and programs from government, “care” is realized as a resource of demand and giving. And the logic of pouring, demand, and distribution from top to bottom also affects horticultural therapy, especially among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problem of fair and human-plants relationships.

This article, I focus horticultural therapy service provider in the East of Taiwan, AN-AN farm as my case. Use the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secondary data to describe how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care institution effect the local, community-based horticultural therapy experience and human-plants care work.

Care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has a dual meaning: one is to take care of the plants' daily life and make them to live; the other side is to enhance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through caring plant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of care is a multifaceted and complex interaction: humans are not just a cases to be cared for, and plants are not resources to be poured. To maintaining the vitality of plants, the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 of their attributes is one of the considerations on horticultural care work.

Garden is the main working space, but it is also the space filled with multiple and different actors. The plants in the garden not only poured from the government as resource, but also for the sharing and exchange from home. With the movement and materiality of different plants, not only do they produce a more suitable combination of plants for the place, but they also change human choices. It reveals that people and plants in horticultural therapy are a series of care practices based on interaction, consideration and negotiation, and more flexible, diverse.

Keywords: care, human-plants, relationships, agency, horticultural therapy

旅行的拼裝體： 同伴動物、旅行與治理

林潤華*

由於同伴動物進入家庭，與人類當前社會關係密切，一直在人類社會中扮演著陪伴以及情感與情緒依附的角色，故，是近年來動物研究中最被關注、也最為用以強調人類社會與動物互動極為密切的案例。尤其當同伴動物逐漸被視為飼主新型態的家人，並且透過與飼主的互動，重新建構「家」的定義，以及此一風潮下所帶動的經濟議題、社會與文化意義上的改變，使得同伴動物更成為動物研究乃至於新動物地理學研究中的重要一環。基於以上基礎，本研究著重於同伴動物的「移動研究」，尤其在都市中/間隨著飼主的不同型態的移動，包含動物的社交外出、醫療外出、短長途旅行、區內移居或跨界移民等。

在這些「移動」中，交通工具扮演重要角色，故本研究將以「交通工具」作為觀察人與動物戶中的空間，包含私人的交通工具以及公共運輸系統。交通運輸系統作為一種流動空間，成為人與非人動物中「相遇」的「接觸地帶」。在此接觸地帶中，人與動物的關係有溫馨的連結，但也有衝突，動物的現身也常被視為一種風險：包含公共衛生、道德、與安全。本研究目的在深入探討動物移動過程中必要的現身如何被實踐，包含情感性、制度性、以及物質性的互相揉合，使得動物移動與現身常浮現的各種關係，達成協商、妥協以及共好。本研究透過次級資料收集、深度訪談以及自我民族誌的方式，來進行資料的收集。透過作者作為同伴動物飼主的親身經驗以及觀察，以及深度訪談專家學者、以及不同飼主的親身經驗，輔以不同公共交通運輸法規的收集以及分析，作為分析的基礎。

關鍵字：移動研究、同伴動物、拼裝體、治理

*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junhua.lin@gms.ndhu.edu.tw。

「雞」本代謝：
新竹市都市養雞的物質分解與社會重組

陳品嘉

本文旨在考察養雞運動於都市公共空間中的發展脈絡，提出物質代謝與社會代謝概念進而廓清此種人與非人的互動空間，如何成為舒緩或處理城市剩食資源循環的場域，以及透過什麼樣的空間實作，進一步修補斷裂的社區鄰里關係。揭示社會-自然的無法二分性，作者援引都市政治生態學中的代謝觀，借道其循環迴圈之範型，勾勒出都市自然的交互圖譜。作者擇定之田野地點，為新竹市東區六燃遺構中的社區「保溫雞舍」。通過密集造訪田野現場，運用介入式空間觀察、直接參與場域的活動、及關鍵人物的半結構訪談，呈現「人雞一體」的共生體系與空間實作。作者先藉訪談關鍵人物，從陽台到公共空間尺度變遷，釐清養雞行動對於都市空間的意義與做法。作者主張，在空間層面，都市養雞不僅需要創造「自然空間」，亦需兼顧動物福祉的確切落實；在代謝層面，保溫雞舍處理都市剩食資源，以及重組地方社會斷裂的網絡，展現物質代謝與社會代謝的雙重循環特質。保溫雞舍的實作體系，不僅強化雞原有的動物特性，也將雞的地位提升至夥伴動物（寵物）層次。都市養雞使得社會重新認識自然，自然也凸顯其鑲嵌於社會意義。

關鍵詞：都市養雞、都市政治生態、人與動物關係、代謝論、公共空間

Agency and Culture in the Traditional L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Lake Toba Area, North Sumatera, Indonesia

Betty Betharia S. Naibaho*

The paper analyzed the involved agencies in the traditional land development process by focusing on the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of the agencies to know their perception, interest, and strategies related to customary land in the context of land development. The qualitative data was collected using snowball sampling for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the local people, the local NGO,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s representative.

The study identified five agencies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traditional leader (Elder), the community member, and the land dealer as the primary decision make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GO as the secondary level. Moreover, there are conflicting opinions even among the locals on the value of the land, which influences their strategy in protecting their interests, such as registering their land for land certification ownership, establishing an official indigenous people organization, and affiliating with the local NGO. Further, as secondary-level agencies, the NGO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different stances regarding customary land protection, and the NGO objects to the land dealer strategie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must support the empowerment of the local people related to traditional land rights and protection, and supervise the land dealers.

Keywords: customary land, l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value, agency, tourism development, Lake Toba Area, Batak people

*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Milk Tea Alli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of milk tea in the Asian context

Pakorn Phalapong^{*}

Regarding the looming democratization trend as well as the coercive influence of China toward several countries in Asia, ‘Milk Tea Alliance’ was initiated by the young generation in Thailand, then, was politically strengthened by other countries’ young generations in the region. Milk tea is generally just a beverage which mushroomed across the region and the globe lately. Nonetheless, after the movement was emerged in 2020, milk tea was seen and rematerialized as a material culture to achieve political intent by Asian youth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ims to scrutinize its newly cultural meaning through the consumption under the manifestation of Milk Tea Alliance, which constructs transnational identity toward young generations in the region. The research utiliz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while applying in-depth interview as a fundamental approach to collect primary data.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Thai and Taiwanese youths of 18 persons in total. The results elucidate that milk tea as a material culture can be rematerialized its cultural meaning through participants’ consuming praxis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Milk Tea Alliance which are: their social media practices when they consume milk tea in their daily life, their consumption of milk tea during the offline demonstrations, as well as their choices to decide consuming milk tea from a particular milk tea chain which advocates democracy or the movement. This configuring cultural meaning fundamentally shapes transnational identity between transnational participants in myriad facets: democratization, regional solidarity, the new Asian value, and the defiance of Chinese political interference.

Keywords: Milk Tea Alliance, milk tea, consumption, material cultur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 Program in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Department of 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Email: pakorn.phala@gmail.com>

店舖、人與地方：
以「關係性」論述探究雜貨店的地方意義*

吳柏毅、賴淑娟

傳統雜貨店是臺灣早期什貨零售的一種商店形式，亦是社區民眾採買日常生活用品之重要場域。當前雜貨店相關的研究多聚焦在幾個面向：一、雜貨店在地方的社會角色及功能。二、雜貨店產業變遷的歷史脈絡。三、雜貨店產業的發展困境。而就雜貨店當前之存續議題來說，在受到連鎖加盟超商集團式的商業壟斷之下，不可否認的，雜貨店就營運上確實面臨高度的競爭與排擠。雖然文獻大都指出雜貨店能否持續經營，跟店舖所在社區之消費習慣有高度相關，但卻未能說明雜貨店跟在地的關聯性為何。因此，營業迄今的雜貨店如何因應全球化的浪潮，又何以作為其經營之道，即是本研究之核心關懷。藉此，本研究採參與觀察法與深度訪談法，並以高雄市仁武區一間雜貨店為田野地。企圖透過關係性的視角，梳理在雜貨店經營的過程中，店舖如何「不只是」一個消費購物的場域，希冀闡明當代雜貨店相較於連鎖便利商店的獨特之處。所以，本研究發現雜貨店的商品變遷、聚落的鄰里情感，以及店舖周邊的組織互動關係，皆和雜貨店一直以來採取的「搏感情」經營之道有關。同時，若以絕對性、相對性與關係性之時空三元觀點來說，有別於便利超商門市空間具有的理性特質，雜貨店的獨特之處在於充滿情感安排的主客互動，此現象即是雜貨店連結店舖、人和地方互動的「關係性空間」。最後，本研究主張「關係性」的論述不僅是目前雜貨店相關研究尚未涉及之處，更以此凸顯出在連鎖加盟超商掛帥的時代中，雜貨店在地方的重要意義。

關鍵字：雜貨店、關係性空間、地方、全球地方感。

* 本文為作者吳柏毅 110 年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人情雜味：雜貨店於在地聚落中之地方感的建構」之部分成果，並與國立東華大學賴淑娟副教授一同改寫合著。

Traditional grocery stores are a form of retail in early days in Taiwan; the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to go grocery shopping. According to the related researches, the grocery stores are undeniably facing the pressure of the operational competition and exclusion comparing to the franchised convenience stores. Although most of the literatures point out that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a grocery store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consumption habits of the community where the store is located, but it fails to explain how the grocery store is related to the locality.

This article use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as the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a grocery store which is at Renwu District, Kaohsiung. This research tries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First, how a grocery store responds to the impact of the globalization. Secondly, how a grocery store keeps operating in this situation. Additionally,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how a grocery store is “not just” a space of consumption through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and hoping to clarify the uniqueness of contemporary grocery stores compared to franchised convenience stores.

In conclus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discourse of “relational space” is not only the concept that has not been covered by the recent research,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local significance of grocery stores in the era of franchised convenience stores.

Keywords: grocery store, relational space, place,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A World Project : 國立東華大學外籍生的跨文化組織參與

林冠妤

2001 年臺灣逐步施行國際化教育政策積極招攬國際學生來台，然而以國家需求為本位的政策，著眼於外國學子對國際化的助益，卻忽略語言文化隔閡下，外籍生的實際需求，為有效給予支持，研究者一年多前創辦學生組織「一個世界計畫 A World Project」。欲探討跨文化互動的意義以及對於外籍生的支持效益，本研究使用深度訪談與行動研究法，以具地理特色的東華大學校園為背景，AWP 組織作為研究場域，研究發現組織成員穩定成長的主要原因，為抱持共同理想與去中心化的運作模式，而跨文化組織帶來的成果效益主要有三：組織的賦權使參與其中的人獲得不同層面的能動性、文化流動帶來對於自我文化的反省和重新建構、情感支持與社會關係搭建。雖面對高教國際化既有的體質不足，AWP 試圖透過學生的影響力搭建跨語言文化的橋梁，由下而上支持外籍生的同時，促進文化間的理解與反思。

關鍵字：外籍生/國際學生、高教國際化、組織參與、文化交流、賦權

In 2001, Taiwan has gradually implemented a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to actively attrac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Taiwan. However, the policy based on national needs focused on the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but ignore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ctual needs under the culture and language barriers. 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assistances for these students, I initiate the student organization called "A World Project" more than a year ago. To explore the meaning behind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support to the foreign students, us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as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has chosen geographically distinctive place, National Donghua University, as field and the AWP organizatio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growth of AWP is with the common idea between the members and decentralized operation mode.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AWP to the participants are mainly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mobility acquire by the 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 self-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gain from cultural exchange, and emotional support and social capital from interpersonal network connections. Furthermore, it may gain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introduce in future. Although facing the existing insufficiency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WP as a student's organization, trying to build a bridge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upport foreign students from the bottom up. At the same, accelerate the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Keywords: foreign students/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participation,
cultural exchange, empowerment

Another Man-made Virus Besides Covid-19? Discourse and Sentiment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edia's Statements on Taiwan During the COVID-19 Period

Yu-hui TAI*

Xi Jinping has emphasized ideological governance and the revitaliz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propaganda machine, as illustrat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PC) handling of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pandemic.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able to alter its image and how it exploited the Taiwan issue to reinforce its governance. The study collected reports from six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edia outlets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find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flected its legitimacy crisis and consolidated its rule by manipulating media coverage of the pandemic in Taiwan. It was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 CPC's propaganda machine was modified to adopt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measures that integrated external and domestic propaganda, media convergence, and disinformation to launch cognitive warfare. For media content, the CCP adopts wolf warrior diplomacy to confront Taiwan, and publish negative content to invigorate the Chinese people's hostility toward Taiwan and incite patriotic sentiments through the Chinese official media, creating a whirlpool of patriotism in China. As such, the accountabil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has been diverted,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PC regime in China has been maintained.

習近平強調意識形態治理和宣傳機器的擴大改造，中國共產黨在冠狀病毒大流行時期的治理政策就是例證。本研究調查中國政府如何能夠改變其形象，以及如何利用臺灣問題來加強治理。本研究收集了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來自六家中國政府和媒體的報導，發現中國政府通過操縱媒體對臺灣 Covid-19 的報導來轉移其合法性危機並鞏固其統治。還發現，中共的宣傳機器被改造，採取大外宣與大內宣結合、媒體融合、不實信息相結合的綜合治理措施，發動認知戰。媒體內容方面，中共採取戰狼外交對抗臺灣，通過中國官方媒體發布負面內容，煽動中國人民對臺灣的敵意，煽動愛國情緒，在中國掀起愛國主義漩渦。從而轉移了中國政府對人民的責任，維護了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

* 戴瑜慧，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 Technology,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No.1, Sec. 1, Liujia 5th Rd., Zhubei City, Hsinchu County 30272, Taiwan (R.O.C)

後疫情與戰爭下國家發展的重新審視

許源派*

世界新冠疫情發展逐漸常態化，各國也漸漸與新冠病毒和平相處，並成為生活日常，讓國家發展似乎回歸傳統全球化發展思維，將世界各國國家資源整合，重新建立國際秩序及全球化發展，但是俄羅斯出兵烏克蘭，讓傳統戰爭震撼全球，原以為全球化思維下，傳統戰爭已成為神話，無硝煙戰爭或網路戰爭會取代傳統戰爭，就國際現實主義架構下，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將傳統戰爭形式及理論推上另一波高峰，似乎回到傳統國際關係架構或國際現實主義的歷史洪流中，完全顛覆由來國際建制的慣性制度發展，讓戰爭重新居於重要核心的理論探討，傳統國際現實主義有成為主流發展趨勢，戰爭竟然成為當代國際關係的手段或工具，傳統戰爭議題或理論，突然成為主流理論，因為全球化帶來國際社會的穩定時代已經面臨挑戰，沒有不可能的戰爭，只有想不到的戰爭情勢發展。

關鍵字：後疫情、戰爭、國家發展、全球化

* 台北市立大學通識中心及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下之 相關應變體系規劃及執法作為之問題與對策

柯雨瑞、鐘太宏

自從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最早於 2019 年 12 月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被發現至今已超過二年多且尚未有減緩的趨向，其迅速在全球多國擴散而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的大災難，目前已造成逾六億多人的感染，死亡人數至今已逾 656 萬人，臺灣境內肺炎每日累計確診人數已高達 705 萬人，其已被多個國際組織及傳媒形容為自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全球面臨的最嚴峻危機以及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

我國政府依據過去對抗 SARS 所付出的慘痛代價與吸取的經驗立即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派由衛福部長陳時中為指揮官全權負責跨部會指揮與協調防疫工作，為了讓行政系統運作發揮預期的效能，立法院於是在 2020 年 2 月 25 日快速三讀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肺炎特別條例》），賦予行政部門全力執行防疫措施的法律基礎。

然而在全民總動員配合政府按部就班扎實做好防疫工作的過程中，依據《肺炎特別條例》所發布的行政授權命令之分際為何？抑或是地方與中央政府因應肺炎的管制措施裡不斷的出現法律明確性與授權管制範圍的爭議，甚至引發是否侵犯《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的疑慮？本文將提出目前在防疫的各項舉措中所浮現的法律困境與衝突，透過文獻探討，彙整相關重要資料，進一步提出法律應變體系規劃與執法作為的問題與對策，俾供各界參考之用。

關鍵詞：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行政命令、
法律明確性、基本人權

It has been more than a year since the new type of coronary pneumonia (COVID-19)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China in December 2019, and there has been no trend of slowing down. It has spread rapidly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global epidemic. The catastrophe has currently infected more than 100 million people. It has been described by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media as the most severe crisis facing the world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1945 and the most serious public health event in history.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mmediately established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based on the painful price paid and the experience learned in the fight against SARS in the past, and appointed the Minister of Health and Welfare Chen Shi-zhong as the commander to be fully responsible for the inter-ministerial command and coordin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work. In order to let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perate to fulfill its expectations, the Legislative Yuan quickly adopted the "Special Regulations on Prevention and Relief of Severe Infectious Pneumoni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Special Regulations on Pneumonia") on February 25, 2020, giving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 legal basis to fully implement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step-by-step and concrete efforts to prevent the epidemic, what is the law enforcement problems and dilemmas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zation orders which were published and issued under the "Special Regulations on Pneumonia"? Does it is effective that the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control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pneumonia disease? Another important problems are the disputes over the clarity of the law and the scopes of authorized legal control measures, and even raise significant doubts and disputes about whether it violates the basic human rights guaranteed by the R.O.C Constitution. This article will put forward and discuss the current legal dilemmas and conflicts in the various legal measures and control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Through literature discussions, relevant important inform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will be compiled, and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egal response system for planning and law enforcement suggestions will be further proposed and submitted for reference to our socie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Keywords: Novel Coronary Pneumonia (COVID-19), Public Health, SARS,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Special Regulations on Pneumonia", administrative authorization orders, legal clarity, basic human rights

中國劇變與臺灣對策

曾建元*、詹佳宜**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習近平主政之後，政治全面倒退，在意識形態上認同毛澤東，強化中華民族主義和大漢族主義，對抗憲政主義與普世價值，將習近平思想入憲並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而以依憲治國口號掩飾黨國權力集中一身，並運用科學技術強化社會控制。習近平欲與美國全球爭霸，東亞稱雄，在大國外交戰略下，有一帶一路經濟帝國的建構，對聯合國及相關國際組織全球治理的干擾，對西太平洋與南海區域安全的威脅，而隱匿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更釀成全球性人類大劫難。習近平的高調作為，導致以美國為首的民主世界的警戒，而有中美貿易戰的開打、美國印度太平洋戰略聯盟的串聯，乃至於美國召開民主峰會宣示全球新冷戰結構的成形，再加上俄烏戰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曖昧選邊，在在都使習近平核心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陷入了更甚於六四鎮壓後的國際孤立形勢和敵對處境。習近平正等待迎接第三個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任期，固然危機動員可能有助於他以團結號召黨國和人民擁護，但也可能因內外局面失控而使其喪失領導權威，甚至遭到罷黜。

習近平的上台，並不是政績卓著，官聲斐然，而是因為父蔭和身為太子黨、紅二代的根正苗紅，而被賦以維繫中國共產黨政權鐵桶江山和紅色權貴既得利益的重責大任，但這不代表習近平可以獨攬大權終身。所以一旦習近平將黨國帶向內外交迫、風雨飄搖的地步，黨國權貴群體基於自保的動機，必然要對習近平的去留和黨國權力機制的調整有所抉擇，而非如此，而是習近平因故無法視事或突然去職，因習近平並無法定的權力繼承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黨國體制也從未建立權力繼承或競爭的遊戲規則，後習近平時代必然要進入權力盤整或是鬥爭的階段。觀察目前中共黨國內部權力菁英的權勢和派系關係，究竟何人在一夕之間可以繼承習近平的黨國領袖位置，乃無法論斷，這就意味著後習近平時代的到來，中共政治必然將會發生地殼變動般翻天覆地的重大變化，如果中國大陸能就此契機展開民主轉型和憲政改革，至少就權力遊戲公平規則的建立以及黨國統治正當性基礎的轉換而言，就能使政治平穩過渡，從而為中國的民主化打造出一條道路。

*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國立金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
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理事長、台灣獨家傳媒智庫執行長

** 東吳大學人權研究學程研究生
華人民主書院研究助理

中國是一個大國，對全球秩序和人類文明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如果中國轉型成為憲政民主國家，則民主中國所參與的全球治理，將會基於普世價值的共識基礎創造人類的共善和福祉，流氓國家或專制國家將不會再因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後撐腰而在國內外興風作浪，世界大同指日可待。而面對後習近平時代的隨時可能來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是否已經做出準備，因勢利導，幫助中國走向民主化，還是任由中國內部陷入腥風血雨，從而牽動全球秩序、國際關係，將考驗著美國和各國政治家和人民的智慧。

本研究係針對中國民主化的問題，以及我國在當中的可能角色和作用深入討論，以期尋找和凝聚出共識，就當前與今後我國中國大陸政策的方向和內容提出具有建設性的建言。

關鍵詞：民主轉型、中國民主化、外部正當性、兩岸關係、習近平

Since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has been deteriorating. Ideologically, he identifies with Mao Zedong, stresses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Great Han nationalism, shows contempt for constitutionalism and universal values, inserted Xi Jinping Thought into the constitution and canceled term limits for the state presidency. He tries to conceal the fact that he has seized all power in the party-state, behind a facade of "rule of constitution" slogans, and uses technology to cement his control over society. Xi wants to compete with the US for global hegemony and lord over East Asia, formulating th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under his Wolf Warrior Diplomacy strategy, disrupt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relat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reatening the regional security of the west Pacific and the South Sea, and covered up the COVID-19 epidemic, resulting in a global catastrophe. Xi Jinping's actions has caused alarm amongst the free world led by the US, leading to the US-China trade war, the Indo-Pacific strategic alliance and the announcement of a new Cold-War order at the US-hosted Summit for Democracy. Combined with the China's ambiguous response to the Russian-Ukraine Wa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led to Xi's China falling into even worse isolation and enmity than the aftermath of the June 4th massacre. In the wake of Xi's third term as party secretary and state president, the sense of crisis could indeed serve to shore up support from the party and people, but should he lose control of the internal and global situation, he could also lose his authority and be ousted from power.

Xi Jinping's rise to power did not depend on his political achievements and prestige. It was his bloodline as a second-generation Communist, that led to him being entrusted to protect Communist rule and the vested interests of its ruling elite, but his iron grip on power was not anticipated. As a result, as soon as Xi leads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into crisis, the party elite will move to preserve itself, and make arrangements for Xi and the party power structure. Otherwise, if Xi Jinping is suddenly unable to discharge the duties of office, his lack of a legitimate successor, and also the lack of an established rule for succession and competition, could lead to power consolidation or struggle in the post-Xi era. Observing the current party elite and their factions, it is still unclear as to who could succeed Xi as the leader of the party-state, suggesting that as the post-Xi era approaches, a sea change in Chinese politics draws near. If China could grasp the opportunity to implement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s, then at least it could create a set of fair rules for power, and legitimize the state's authority, paving the way for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and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China is a large nation, with great influence on the global order and human civilization. If China transitions to a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then it could participate in a global governance for the common good of mankind, based on an consensual understanding of universal values. When rogue states and autocracies could no longer count on the People's Republic's backing, to cause mayhem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world peace could be in sight. As the post-Xi era draws near, whether the US-led global community is ready to help China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or pull the world into its internal chaos, will be the greatest test of the wisdom of the US and its allies and their leaders and peo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question of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and Taiwan's possible role in the process, in the search for consensus in this matter, to provide constructive advice for Taiwan's current and future policy for China.

Keywords: Democratic Transition, China Democratization, Outward Legitimacy, Cross Strait Relationship, Xi Jinping

WTO 漁業補貼談判： 當前成果與待解決課題

林仲慶*、楊名豪**

從 2001 年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杜哈部長會議開始，WTO 成員國認識到通過禁止漁業補貼可能裨益於漁業資源永續利用的效果，在全球貿易法框架下展開建立漁業補貼規範的工作。歷經一段時期的停滯，2015 年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14.6 對禁止漁業補貼期程的呼籲，加速了漁業補貼談判的進度。在今（2022）年的部長會議之談判文件中，原則上禁止三大主軸（three pillars）的漁業補貼，包含：（一）導致 IUU 捕魚行為之補貼；（二）有關過度捕撈魚類種群之補貼，例外得進行「用於推廣回復生態永續水準之種群重建之補貼」；（三）有關產能過剩以及過度捕撈之補貼，特別列出八項具體補貼態樣，並且例外開放「用於維持相關漁業之一種群或數種群生物永續水準之補貼」。其中，規範適用之對象範圍、特殊及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SDT）規範、通知及透明度等條款屢成談判焦點。如今，漁業補貼協定完成簽署，然而有關產能過剩以及過度捕撈之補貼之禁止以及 SDT 的規範未臻完整，須留待下次部長會議再次協商。本研究的關心在於：新形成的規範是否解決了過往爭議？抑或只是一份充滿妥協的文件，尚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本研究試圖聚焦近年漁業談判議題核心焦點，比較各方談判立場，並且分析當前國際貿易規範所建構的制度內涵與權利義務結構，以回應上述設問。臺灣為漁業大國，長年針對漁船用油、漁船汰建、資源調查等提供補貼，全球性新規範的形成勢必為我國產業帶來衝擊，值得臺灣加以重視。在此漁業補貼規範發展成形的時刻，本研究將為臺灣今後漁業補貼政策提供初步因應之方向。

關鍵詞： IUU 漁業、世界貿易組織、特殊及差別待遇、漁業補貼、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研究生，s89662630@gmail.com。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mhyang@email.ntou.edu.tw。

Since the four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was held in Doha in 2001, WTO members have recognized that the prohibition on fisheries subsidies might benefi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isheries resources, and thus launch the work on developing the new regulation of fisheries subsidies under the legal regim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were adopted in 2015 and called for the prohibition of fisheries subsidies. After a period of stagnation, the SDGs have now accelerated the progress of the negotiation on fisheries subsidies (Goal 14.6). The documents of the twelf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 which were made public, detailed the three pillars of fisheries subsidies that were prohibited: (1) subsidies to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IUU Fishing); (2) subsidies for overfished stock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ose promoting stock rebuilding to a biologically sustainable level; and (3) subsidies for overcapacity and overfishing, which listed eight specific types of subsidies and provided the exception of measures implemented to maintain the stock or stocks in the relevant fisheries at a biologically sustainable level. Moreover, the focus of the negotiations included the scope of the regulation;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DT); notification and transparency. The Agreement on Fisheries Subsidies (AFS) was recently assigned by WTO members. However, provisions of SDT and the prohibition on subsidies concerning overcapacity and overfishing have not been completed, and therefore such matters remain to be discussed at the next MC.

What concerns this paper is whether signing the agreement provides a resolution to these issues or merely marks the conclusion of a compromise-filled agreement and what issues remain to be resolved. By focusing on these main issue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opinions of WTO members. Furthermore, it analyzes the nature of the regul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ade legal framework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raised above. As one of the major fish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Taiwan government has granted fuel subsidies, vessel upgrades, and resource research for year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se issues becau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rules would impact Taiwan's fishing industrie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a preliminary strategy for Taiwan's future fisheries subsidy policy at a time when fishing subsidies are being regulated.

Keywords: Fisheries Subsidies, IUU Fishing,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以跨國倡議網絡探究香港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之成效 及臺灣扮演之角色

葉思好*

本文以跨國倡議網絡中最廣為應用分析的螺旋模型及迴力鏢模型檢視 2019 年香港反送中民主運動與國際環境如何跨國界的聯繫進而施壓香港政府作出策略性的讓步與妥協。當處於壓制性國家的國內團體繞過他們的國家，直接尋找國際盟友，試圖從外部對其國家施加壓力時，就會出現一種「迴力鏢」的影響模式。國家反對團體、非政府組織和社會運動與跨國網絡和國際非政府組織聯繫起來，進而說服國際人權組織、捐助機構和具國際影響力的大型國家向違反基本人權規範的國家施壓，這樣的跨國倡議網絡就可以為陷入困境的國內團體提供訪問、影響力、訊息和財務支援。

跨國間的國際聯繫可以放大國內團體的需求，從內部與外部串連，再由外部向內部施壓，以增加侵害人權的政權的壓力，為新問題提供開放空間，並將這些需求迴響到國內領域。

從大規模示威抗爭爆發、社群媒體的蓬勃發展引發國際關注及聲援，其過程中香港政府的態度從鎮壓、否認、妥協，以及其後美國通過《香港人權法案》這其中應證了跨國倡議網絡中，國家內部壓力與國際社會接軌，共同對侵害人權的政權施壓的成效。而臺灣在地緣位置、歷史背景底下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與香港面對同樣一個國際強權的壓迫，在這樣的脈絡之下，臺灣民間與香港民間的串連，充分給予了香港一定程度心理上及人權倡議上的協助，透過這樣跨國間的互動及新興媒體的快速發展，將為未來的民主運動注入活水。

關鍵詞：香港、民主運動、迴力鏢模型、螺旋模型、跨國倡議網絡

*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This article uses the Spiral Model and the Boomerang Patten, which are the most widely used analysis in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to examine how the strategic concessions and compromises were forced to be made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anti-extradition pro-democracy movement and cross border interactiv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in 2019.

Under the repression status, those domestic groups are forced to bypass their own country and go for the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allies to exert pressure on their own country, the influence of Boomerang Patten emerges.

National Opposition Groups, NGOs, and Social Movements link up with Transnational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NGOs to persuad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Donation Agencies, and Influential Large Countries to pressure countries that violate basic norms of human rights.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is so as to provide access, influence,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struggling domestic groups.

International linkages across borders could amplify the requirements of domestic groups, connecting from within to outside and from outside to inside to exert pressure on regimes that violate human rights. So as to provide new topic to further discussion and reverberate the needs back to their own countries.

From the outbreak of the large-scale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succeeding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It has caught the eyes and suppor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The attitude of Hong Kong government was also changed from repression and denial, to compromise. Following up with the quick passage of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 by the United State.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are proved to be effective that the linkage of own country w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jointly exerting pressure on the regime that violates human right.

Taiwan, owing to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is however regarded to some extent as being oppressed by the same international power as Hong Kong. Under such a context, the collaboration of Taiwanese and Hong Kong people to some extent has given Hong Kong people some psychological and human rights assistance. Through such cross-border interac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we believe there will be more vitalities injected into the future Democratic Movement.

Keywords : Hong Kong, Democratic Movement, Spiral Model, Boomerang Patten, 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

助人的方式與原因？從社工和實業家們的個人觀點出發，
了解「後復仇之都」的臺北市無家者服務，
如何在後新冠肺炎時代的三尺度空間動態中，不斷的產生與再造。

裴浩哲 (Hao-Che Pei)

鑲嵌在地方脈絡的「無家可歸」社會問題，正持續在全球惡化。基於西方的發展經驗，地理學者勤用「後復仇之都 (post-punitive city)」的框架，來探討無家可歸的社會現象。學者們以此框架窺探那些深藏在空間中的不均衡發展動態，如何與無家可歸的貧窮現象交織並再造。然而，雖然無家者地理研究的焦點，正逐漸移向東亞的發展脈絡，但是，後新冠的臺北無家可歸發展脈絡，仍存缺發學術證據來了解其樣貌。更者，東亞的地理學研究，幾乎沒有任何以實業家個人觀點出發的經驗證據，來探究個體日常實踐中產生的工作經驗與情緒，以及經驗與情緒兩者之間如何在宏觀尺度下的發展福利政體、中觀尺度的公部門與第三部門之間的組織互動，以及微觀尺度的無家者社會工作人員的多重空間尺度中的互動與再現。本研究將以半結構式訪談作為主要研究方法，向 60 位無家者社會工作人員收集充足的質性經驗證據，透過受訪者本身對於工作的見解與反思，去深度了解上述多尺度的空間互動。我的研究將會以台北市為個案，透過此都市空間來將「後復仇之都」的概念與「危殆工作」融會貫通，創造出極具原創的個案研究，以此對無家者的第三部門研究做出重要的學術貢獻。

Homelessness is exacerbated within local contexts in the Global North and South. Particularly, geographers use the framework of a post-punitive city to probe the development of homelessness intersecting with spatial inequality based on Western experiences. Whilst there is a growing interest in East Asian contexts, there is a large gap in the urban governance of homelessnes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including Taiwan during the post-pandemic era. Moreover, there is an almost complete absence of empirical evidence on a practitioner's everyday emotional and affective experiences within the three-level spatial dynamics of the 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 public and third-sector agencies, and homeless support workers. I will draw on 60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se spatial dynamics through individual insight and reflections on work. Potentially, My case study will contribute to third-sector research on homeless support workers and build our understanding of precarious work within a post-revanchist city in an East Asian state.

跳島效應：
脆弱家庭兒童的社會空間習得經驗

林秉賢*

脆弱係一跨尺度與維度的多面項交錯概念,從國家層級的政治、經濟與環境條件與治理之脆弱國家 (Fragile States) 概念乃至公民本身條件置於社會運行的風險回應能力不足的脆弱性 (Vulnerability) 交構而成。本文旨在探討臺灣 2018 年頒佈執行的社會安全網計畫,針對年齡、經濟暨社會文化條件不利之人口施行脆弱家庭服務方案,將強調風險因子檢核、通報以致國家系統早期介入的「風險家庭」概念,改以「脆弱家庭」施以社區支持系統與個人能力條件發展之實務變革下,諸些因為經濟、家庭狀態與年齡條件被標籤為「脆弱者」的兒童如何從中發展社會空間,獲得個人社會適應發展的契機歷程。研究者採以案例研究針對台中后里的偏鄉脆弱家庭社區據點,採用社會空間度量法透過參與觀察、文本分析與訪談,於田野探索研究中發現,臺灣特殊的數位普及條件與公民社會發展脈絡中,諸些 α 世代的兒童在客觀與個人主觀意識中,產生重新評價自身「脆弱」的狀態,於社區衛星據點中交織於傳統實體的生態網絡,交錯著跳躍於實體與虛擬社會單位的資源獲取行為,形成利基於社區安全據點中的跳島模式。本文目的於描繪此一突破傳統生態觀點之現象,並勾勒一線實務的社區據點工作者與脆弱家庭兒童如何藉此增能抗壓的歷程。

關鍵字：島嶼模式、脆弱家庭、社會空間度量、社會空間習得、社會工作實務模型

*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地址:407224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社科院社會工作學系。
電話:(04)04-23590121 轉 36517。E-mail:max1028@thu.edu.tw。

Vulnerability is a multifaceted concept that spans scales and dimensions, from the concept of fragile state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governance at the national level to the vulnerability of citizens' own conditions to the lack of risk response capabiliti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ocial safety net plan promulgated and implemented in Taiwan in 2018, which implements vulnerable family service plans for populations with disadvantaged ag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The concept of "vulnerable families" was shifted from crisis inventorying to systematic community support and individual capacity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ers used a case study to focus on the base of the rural community of vulnerable families in Houli, Taichung, and adopted the socio-spatial approach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document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In the premiere field engaged, we found that Taiwan's special digital popular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civil society, led the a generation to re-evaluate their own "vulnerability" state and intertwined with the ecological network amid the island model which jumps between physical and virtual social agents to generate their won socio-spatial.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scribe this phenomenon that breaks with tradition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to outline the journey of how community social workers and children work through vulnerable families to be empowered to have their own socio-spatial acquirement.

**Keywords: Island model, Vulnerable family, Socio-spatial approach,
Socio-spatial acquirement, Social work practice model**

從豐腴之島到邊陲離島- 近代蘭嶼發展歷程的政治經濟分析

林嘉男

近代一百年來，蘭嶼發展歷經日本政府的差異統治作為，以及中華民國政府的異化治理手段，使得蘭嶼社會在不同政權統治時期，皆呈現出有別於台灣社會的獨特樣貌。

日本政府對蘭嶼採行差異統治作為，使蘭嶼有別於台灣原住民社會，不受森林計畫事業、理蕃與授產政策、蕃人所要地政策的直接影響，造就蘭嶼與台灣原住民族在近代發展狀態上的本質性差異。

而中華民國政府對蘭嶼施行的異化治理手段，使得蘭嶼急劇地接受多重治理機關的國家政策實驗，包含做為離島重刑犯監獄、國家公園政策、核能廢料貯存政策、國宅改造政策等，造就蘭嶼成為推動國家目標下的附屬場域，更與台灣社會發展產生迥然的偏異樣貌。

本研究關注為蘭嶼達悟族社會如何從固有的原初豐腴社會，在兩個接續政權的統治過程中歷經差異統治作為，使得原住民主體的原初豐腴社會被建構為國家附庸的邊陲離島。本研究分析蘭嶼在日治時期遭受的差異統治作為，以及中華民國時期遭遇的異化治理手段，逐一分析各統治/治理政策對蘭嶼社會的政治經濟影響，以及對蘭嶼社會的建構轉變。

最後，蘭嶼近代社會發展歷程從豐腴之島到邊陲離島的建構，反映國家與達悟社會在近代發展的權力狀態改變。而自解嚴以後，晚近政府與達悟族社會的交織狀態，更進一步模糊了國家與達悟社會的邊界，過往異化建構下的邊陲離島屬性越趨模糊，而蘭嶼邊陲特性的消失，伴隨著並不是過往達悟豐腴之島的再現，而是逐漸與台灣本島的妥協與一致，在在突顯出蘭嶼達悟族社會有別於國家運作所擁有的自主權力逐漸消失。

關鍵字：蘭嶼、國家、邊陲、離島

是轉變還是消逝：
工業化及都會區擴張下的當代都市客庄*

蔡侑霖**

位於新竹縣竹東鎮外五里地區的 Erzong 聚落，正是深受新竹科學園區科影響的代表性客庄，此一地區可能為考察當代客家都市生活上提供一個饒富意涵的案例。在客家研究上，文獻上持續認為客家族群與農村的關係相較於其他漢人深厚，研究者亦強調客家族群「耕讀傳家」的重農文化觀以及不輕易出售農地與相關的道德規約，在這樣的研究傳統下，當代客家人群似乎主要在農村現身，至於都市生活的部分則被放置在城鄉移民脈絡中加以理解，易言之，當代客家人群的都市生活是移民至都會區後才發生的。再者，在城鄉移民的研究架構下，學者們關心的是客家族群認同與語言傳承的問題。然而，以城鄉移民為基調的分析忽略許多住居及生活在都會區的客家人並非透過遷移歷程，而是工業化及都會區擴張的結果，也假定當代客家族群具有同質性。Erzhong 聚落正提供一個在地客家聚落面對快速都市化與大量外來人口移入的案例，展現原本以傳統客家聚落血緣及地緣網絡人群為主的在地組織，如何經驗都市的擴張以及新都市計畫，並透過文化再創造的實作，包含創意花鼓隊、山歌班等客家文化活動，以及轉化伯公信仰，在社區營造開展的脈絡下，結合社區營造及客委會的政策與資源，並逐漸融入一些在竹科早期遷入並已經在地化的人群，嘗試都市化變遷與在大量人群湧入的情境下，以利客家文化之維繫。

關鍵字：都市客家、當代客庄、客家、社區

* 本文資料蒐集受國科會與客委會補助，特此感謝，也一併致謝參與研究的田野報導人。本文為論文初稿，請勿引用。

**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



♡ 感謝您的參與 ♡

♡ Thank you for being here ♡

